

思源

CAPASUS JOURNAL
Summer, 2024



■ 會長寄語	01	會長幾句話/李偉欽
■ 思源傳承	02	《思源》歷史/何婉麗整理
■ 政經論衡	06	當民主的潘朵拉之盒被開啟時：解密檔案中的蔣經國晚年 /林孝庭
	11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US-China Relations/ Dalton Lin
	20	美國對臺策略：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辯論 /吳冠昇
	23	淺談 AI 與政治 /黎建彬
	25	淺談幾項投資決策的心理陷阱 /鄭義為
■ 健康守護	30	從卡繆的「瘟疫」回顧個人醫學生涯 /謝文儒
	34	四年一覺安平夢，贏得魚塭藥師名 /蔡山慶
	42	有夢最美，築夢踏實：改變孕產婦和兒童健康 /張靜宜
	48	Blue Zones and the Lessons We can Learn from Them / Alice Stanley
■ 癌症探究	53	The State of Childhood Cancer in the United States / Richard Ho
	58	《人生的縫隙》：如蝴蝶般破繭而出的台灣血癌男孩 /李維儀
■ 日月星辰	63	月亮與地球 /饒惟君
	67	星星、月亮、太陽 /黃耀文
■ 藝術視界	70	世界名畫欣賞 /羅漢中
	75	李國鼎先生故居繪圖比賽 /王泰安
■ 文化足跡	79	率美國女學生回國參訪記 /老夫子
	85	我回到上海外灘 /楊乃莊
■ 行旅見聞	90	我的非洲奇遇記 /丘引
	94	哥斯大黎加生態旅遊記 /何婉麗

『點擊目錄中的文章標題，即可跳轉至該文章的首頁』



會長幾句話

李偉欽

Professor,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Wake
Forest University, Winston-Salem, NC 27109.

當初《思源》之創刊，應是源於一人之起心動念，而後眾多會員相繼呼應，筆耕不輟，並有各任編輯邀稿、校稿的心力投入，讀者們的喝采回饋，更是對《思源》最大的支持與鼓勵。三十多年來，不論是涓涓細流般的細緻流露，或是濤濤洶湧的澎湃展現，歲月有情，《思源》也累積成源遠流長的非凡成果。若將歷年來所有出版的作品，羅列擺置桌上或排列架上，也有「數大便是美」的堂堂風貌，不可小覷。

誠然，主編在《思源》中身居中樞地位，運籌帷幄。為了確保年刊順利出版，主編精心籌劃，無懼挫折，透過多方邀稿、施展出溫柔婉約式的催稿、輔以火眼金睛的校稿、加上字字行行的排稿，確保一切無誤。承擔這項重則大任要有熱心、細心和耐心，在此特別感謝婉麗主編，文編游維真及美編樂瓊的勞心勞力，經由她們的宏觀構思與精細調整，讓每一部佳作得以盡善盡美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當然，若無諸位作者嘔心瀝血之大作，巧編也難為無米之炊。在此，謹向這期所有友情贊助和呼朋引伴而來的作者們，致以深切的感謝。各位的作品剖析人事主題或有不同，構思架構也許相異，卻都是生活中吉光片羽的即景展現。無論是大小人情世故、政事曲折之演變，抑或是人生在而立、不惑、天命、耳順、不逾矩各年華階段的深刻體會，皆令人拍案叫絕。他們有「逝者如斯」的時光感悟，也有「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的赤壁情懷。這些作品均能讓讀者細嚼甘苦，共情回味。

最後還要感謝讀者們。創作需要讀者的共賞、共鳴與共響，否則佳作私藏自賞無人知。讀者們的不吝分享與按讚，就是作者創作耕耘的持續動力，同時也是《思源》年刊源源不絕的活水源泉。

在此，謹向所有《思源》年刊的讀者、作者、編者致上最崇高的敬意及謝意！

李偉欽會長 2023-2024
美東南區中華學人協會

《思源》歷史

何婉麗整理

溯源—思源歷史中的重要貢獻人物事項記錄

1. 1991~1992 第十六屆會長施敏男，副會長：何智達，祕書：孫智燊。創辦《思源》會刊：由祕書孫智燊擔任首任主編。孫智燊以「飲水思源」為義，提議會刊取名為「思源」，進一步期許協會成為新思想、新概念的源頭。（美東南區中華學人協會簡史）
2. 創辦《思源》會刊——當時 1991 年本會成立已十有六年，迄無一份綜合性、一般性之代表刊物，同仁等多引為憾事。故本屆第一次幹部會議決議創辦會刊，暫定為半年刊，每年春秋季出版。良以我東南之美，所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相信此夢，不難成真。但先決條件，端賴會友愛護支持，賜稿賜教，眾志成城。決議交由區區負責，擔任首任主編。會中論及會刊名稱，雖有數位選項，並無決定。當天下午我由洽市(Chattanooga, TN) 飛往莫比爾 (Mobile, AL)，仰視藍天，朵朵白雲，若有神助，脫口而出《思源》！

1991 - 1992 會長: 施敏男
副會長: 何智達 祕書: 孫智燊

創辦《思源》會刊:

... 故本屆第一次幹部會議決議創辦會刊:

1. 暫定為半年刊，每年春秋季出版。
2. 決議交由智燊負責，擔任首任主編。
3. 會中論及會刊名稱，雖有數位選項，並無決定。當天下午，我由洽市飛返莫比爾，仰視藍天，朵朵白雲，若有神助，脫口而出《思源》！當晚電告會長，他聞訊大喜，諮詢多位幹部會友高見，一致通過。足見「飲水思源」的確是大家心目中的最大公約數，故最容易引起共鳴 ...

- “思源·憶往·話當年” 孫智燊

(孫智燊於本會三十週年特刊追述「思源」源起，感謝蔡山慶會長提供這張寶貴的投影片)

當晚電告會長，他聞訊大喜，諮詢多位幹部會友高見，一致通過。足見「飲水思源」，的確是大家心目中的最大公約數，故最容易引起共鳴。會長特別致書，表示肯定與嘉勉：

“刊物指定名「思源」，全體一致認為最好，《世界日報》余俐俐記者亦選「思源」。這名字謙虛高雅，所以我們就取名為「思源」。盼廿年後兄能繼續看到兄命名之「思源」，進一步，「思源」能廣結國內外之善緣。”（引自孫智燊之文「思源·憶往·話當年一祝本會卅週年慶」，重刊於本會四十週年特刊）

3. 1994~1995 第十九屆會長：楊乃莊，副會長：殷清峰，秘書：蔡山慶。當一九九五年元月份美國東南區中華學人協會簡訊推出之後，蒙前會長施敏男來信，謂協會簡訊內容實已超過「簡訊」二字所能包容，並建議更名為「思源」以作為本會之會刊。於是《思源》第一卷第一期乃於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二日出刊。（美東南區中華學人協會簡史）

楊乃莊會長在「思源」發刊辭上引申宋代朱熹的《觀書有感二首·其一》

半畝方塘一鑿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那通：哪）

期盼本會學人，思如源泉，滔滔不絕，永遠清新。

4. 1996~1997 第二十一屆會長蔡山慶：那時我擔任本會新聞信主編，施敏男告訴我新聞信已經生長成熟，可以進階成為「思源」會刊，所以我就順著施敏男會長的意思訂為第一卷第一號，把當期新聞信當作思源的創刊號。（雖然有元老指出以前曾經發行過，我沒有看到紙版思源，孫智燊也很低調，有一段時間沒有參與會務，無法核實。）

因為當時沒有及時收到孫智燊送來的歷代名家書寫的「思源」二字。施會長叫我找在地書法家高優鏗書寫「思源」刊物名稱在封面上。以後由詹歷堅親筆畫插圖。直到後來歐晉義接棒。編輯時，進步到電腦插圖。（學人協會 Line 群組 9/14/2023）

5. 2006~2007 第三十一屆會長洪金城為思源雜誌換上全新面貌，第一次使用全彩印刷思源並分發給所有會員，並藉此機會在書法大家王羲之集字中借用「思源」書法字形沿用至今，並賦予豐富、優美、多彩的內容。同時，目前協會的 Logo 也是在其任內，委請會員李家賢設計師設計使用至今。（學人協會 Line 群組 9/15/2023）

6. 2010~2011 第三十五屆會長鄭義為，為思源英文命名 “The CAPASUS Journal”，最為稱許，沿用至今。（學人協會 Line 群組 9/14,2023）

以上均根據本會刊物或 Line 群組裡的資料引述而來。感謝陳英偉醫師的提議，使得《思源》歷史得以整理，讓後人不忘這段創刊的珍貴歷史；同時感謝蔡山慶會長提供多方面的資料。如果未來有更多資料能豐富《思源》史料的保存，誠摯邀請各界賢達協助提供。

如果您有興趣回顧《思源》的過往，請參閱《思源》網站：

<https://www.capasus.org/elementor-page-2973/>。在此網站上，您可以找到每年各期的《思源》內容，甚至可以追溯到第 30 屆年會（2006 年）時所刊發的《思源》期刊，非常有意義。《思源》的歷史歷歷在目，令人感動，願《思源》繼續茁壯進步。

致謝與展望—本期《思源》的新歷史

1. 當前會刊的發展與變革

過去三年，《思源》每期都涵蓋多個分類主題，而第一個分類主題總是與當年度會長的專業領域相關。今年，會長李偉欽的專業領域是政治，所以《思源》首個分類主題為「政經論衡」，包括有五篇關於政治、經濟的佳作，在《思源》稿件中實屬難得，請莫錯過。在此特別感謝今年年會講員之一，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林孝庭博士，拔得頭籌，他的大作成為《思源》收到的第一篇稿件。

2. 傑出會員的成就與貢獻

2013 年，Dr. Richard Ho 榮獲美國白宮授予的「早期生涯的科學和工程專業人士獨立研究」的最高榮譽。

2014 年，謝文儒博士榮獲馬英九總統頒贈國家「紫色大綬景星勳章」，以表彰其對我國疾病防制方面的卓越貢獻。

他們兩位都是學人協會的會員，我們與有榮焉，並感謝他們在本期《思源》中貢獻了有關健康的專題文章。

謝文儒博士、蔡山慶博士與張靜宜博士均任職於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在
本期《思源》中，他們探討了各自在公眾健康領域的專長研究及其應用。他們的貢獻不僅豐
富了我們的知識視野，我們也引以為榮。

3. 新進會員的參與藝術作品

新進會員羅漢中為本期《思源》撰寫了文稿，並貢獻了畫作《失根的蘭花》作為本期的
封面。這幅畫作完成於 2023 年，被 Charlotte Art League in North Carolina 評審入圍冬季展；此
畫寬 54 公分，長 49 公分，用 wax-based colored pencil 完成。（作者也同時畫出雙胞胎的另一
幅畫，相同主題，但以粉彩表達，而此畫在今年 4 月 20 日，獲美國東南區粉彩學會（SPS）
Artists Choice 獎，這個獎項是由在場畫會的所有畫家投票，票選出他們認為最好的畫！）
《思源》有此封面，至感慶幸。

4. 人才濟濟、才華橫溢的作者群

《思源》的作者主要來自於學人協會的會員，少數則是年會的講員。本期《思源》雜誌
有一半以上的作者是首次供稿，其中許多還是剛剛加入學會的新會員，如林坤達教授
（Dalton Lin）、吳冠昇教授、知名作家丘引，以及羅漢中教授。另外，搬至德州的長期會員
黎建彬教授，也在百忙之中為《思源》撰稿。他們的才華都令人矚目，他們的熱情更讓我們
無比感激。

本期文章篇篇精彩，每一篇都充滿了智慧與洞見，值得讀者細細品味。期盼大家閱讀
《思源》的過程中，不僅收穫豐富的知識，也能享受愉悅的心情！

當民主的潘朵拉之盒被開啟時：解密檔案中的蔣經國晚年

林孝庭

早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與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班
2003 年取得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部博士學位
自 2004 年起服務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擔任研究員
2010 年起兼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

以檔案史料為基礎的研究之美，在於能夠透過一段較長的時空距離，擺脫主觀情緒的干擾，從而更加理性客觀地回顧過去一段歷史，並賦予其意義。筆者近年來透過日本外務省檔案館、英國國家圖書館與美國不同政府機構的解密檔案，得以重新檢視蔣經國晚年臺灣邁向民主化的重要轉折。本文將以這些史料中所透露的訊息，帶領讀者重新回顧這一段歷史性的關鍵時刻。

關鍵年代的啟示：蔣經國的維穩與變革

對臺灣而言，1986 年是一個關鍵年份，2 月間，南鄰菲律賓掀起「人民力量」革命風潮，最終將執政長達二十一年之久的獨裁者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趕下台，任其流亡夏威夷。菲律賓的民主運動立即激勵北鄰南韓，該國反抗威權統治的民主運動人士發起千萬人修憲運動，要求總統全面直選。南韓政府雖派出軍警鎮壓，仍無法遏止，迫使全斗煥總統讓步，於該年 4 月間展開修憲諮商。菲、韓兩國的民主運動，當地百姓赤手空拳走上街頭爭取民主並導致政局發生突變，給臺灣社會帶來極大震撼，不但鼓舞黨外運動，也讓執政國民黨高層心生警惕，中央黨部為此數度召開會議並商討因應之道。蔣經國從整個「中國」的框架看待臺灣所應佔有的地位，以及島上正風起雲湧的民主化進程，最初反應仍堅持內部穩定勝於一切，認為解除戒嚴將「動搖國本」，然而迫於形勢，他逐漸同意採取緩步放手策略，意圖在維持舊法統與順應民主潮流之間求取平衡。該年 2 月 7 日農曆除夕前一天，蔣召見副手李登輝，囑咐他過完年之後要多參與黨外人士的溝通工作。3 月底，蔣指示在「動員戡亂」體制下推動「以黨務革新帶動政治革新」，並將六項改革議程交付黨內研究，包括充實中央民意機構、地方自治法制化、國家安全法令、民間社團組織、社會風氣與黨的中心任務等，作為應對國會改選、解除戒嚴、黨外組黨等重大挑戰，國民黨內還成

立「十二人工作小組」，由前總統嚴家淦擔任召集人，李登輝擔任副召集人。

國民黨似乎展現了推動政治改革決心，然而此刻蔣經國內心依然在掙扎，他心裡明白，一旦政府解除戒嚴，全面實行民主化，臺灣這塊土地的一切政治活動必將更加走向在地化，國府宣稱代表全中國的法統也將進一步遭到弱化，甚至在他身後兩岸將再無統一之可能。該年夏天蔣與監察委員陶百川晤談時表示，他雖已下令研究政治革新的六大議題，但對於臺灣究竟能否推行政黨政治，他不表樂觀，只不過蔣也承認這是「大勢所趨」，因此只能「因勢利導」、「循序漸進」。如果三、四年內行之有效，他便準備制訂政黨法，實行政黨政治。當陶百川建議蔣經國適度調整與放寬大陸「三不政策」時，蔣回稱「有幾個『不』並不重要，最重要的乃是必須反對共產主義，它是禍根，不可妥協。」他這番話其實有更深刻的意涵，該年初，蔣接獲來自大陸情報，元旦假期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去了一趟浙江省奉化溪口兩蔣父子故鄉，而且特地按照 1949 年蔣介石離開大陸時所走的路線，此種統戰策略，著實令蔣經國心生警惕。

蔣、陶晤談的時間點前後，警備總部正不斷在臺北市區進行鎮暴操演，以便因應全臺各地黨外運動愈來愈多的集會人潮；而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8 月 1 日華府眾議院通過眾議員索拉茲（Stephen Solarz）第二三三號決議案，敦促臺灣開放黨禁、保障人權與推動民主，給予臺北極大壓力。此時中華民國駐美代表錢復，在華府收到來自副總統辦公室秘書蘇志誠的一則訊息，得知臺北高層正在積極處理一些敏感政治問題，其中最有可能解決的將是「戒嚴」問題，錢復自認他聽聞之後，半信半疑，半年前他曾在臺北勸蔣總統應儘速解除戒嚴，然遭到蔣以「動搖國本」而拒絕，錢不太相信此刻蔣會改變心意。9 月 16 日，錢復又接到蔣經國三子蔣孝勇自臺北打來的長途電話，轉告他父親一段話：「我想了很久，認為君復（錢復）的意見對。」

民進黨的崛起與兩岸局勢的微妙變化

可以想見，當時間來到 1986 年的 9 月中旬，蔣經國對於開啟臺灣民主化的立場已經鬆動，不論其動機是受外界沉重壓力而不得不妥協，還是真心認同政黨政治的那一套遊戲規則，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9 月 28 日，當黨外人士於圓山飯店集會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而國民黨上下都在屏息等待蔣經國反應之時，他選擇克制，沒有下令早已在市區演練多時的警備總部進場抓人；並且在 10 月 7 日接受《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專訪時，宣布臺灣即將解嚴，接著又在訪談一星期過後的中常會上通過兩項革新議題，作為解除戒嚴與開放黨禁的規範與配套措施。也許臺灣民主之路前景依然佈滿荊棘，也許看在許多反威權民主運動人士眼裡，國民黨邁出的步伐仍不夠大，然而最艱鉅的門檻已經跨過去，此後再無回頭路。此時北京領導人對於臺灣新局面不會

不理解，1986年4月下旬，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與美國學者哈里遜（Seling Harrison）對談時，脫口說出國民黨是一個「合法政權」，領導臺灣具有民意基礎，國共之間如展開談判，意義重大，此番表述隨後在中、英文媒體上刊登，引人注目，李登輝甚至主動向蔣經國報告此事。該年初夏，中共高層展開新一輪國際社會的遊說工作，積極向美、英、澳洲等國高層政要表明，如果能夠向臺北施加一些壓力，促成兩岸三通，對臺灣並無害，而且將可贏得廣大中國百姓對這些國家的深厚友誼。北京對於臺灣政治走向的焦慮，不言可喻。

1986年11月10日，民進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黨章、黨綱與黨旗圖樣，同時選舉黨主席與重要幹部，翌日，剛當選為民進黨中常委的臺北市議員謝長廷，與日本交流協會駐台北事務所官員以及另一位自香港來臺的日本外務省官員秘密晤面時，有這麼一段有趣的談話：謝長廷告訴日人，蔣經國對於黨外籌組政黨一事曾提出三項條件：第一，必須遵守中華民國憲法；第二，必須反共；第三，必須同意未來光復大陸的國策。謝表示難以想像蔣經國身為國民黨主席，竟然對另一個政黨提出要求與指令。他接著說，這三項條件之中，民進黨其實已實現了「一點五項」，因為遵守中華民國憲法沒有問題，有問題的其實是國民黨，長期以來其透過動員戡亂體制治理臺灣，根本已違反憲法精神；至於反共，民進黨只能滿足蔣經國所提的一半條件，因為國民黨的反共基於意識形態，而民進黨所反對者並非在於意識形態，而是中共專政以及不放棄以武力犯臺；最後有關光復大陸的目標，謝長廷稱民進黨認為現實上臺灣與大陸已是兩個不同政治實體，長期而言，民進黨不能放棄民族自決的主張，即便國際社會無法立即承認臺灣獨立，民進黨仍應堅持此一理想，同時努力謀求國際社會的諒解與支持。

該（1986）年底的增額立委選舉，民進黨表現不俗，一舉選上十二席立委，整體得票率也來到百分之二十五，對於此一結果，蔣經國曾召見李登輝詢問其感想。李認為此結果雖然對國民黨有些不利情況，需加以檢討；但也表示國際媒體對此次選舉進行了廣泛的報導，同時稱許臺灣民主政治進步，李相信這對中共將是一種威脅。私底下，李登輝對於選舉結果極感欣慰，在與來訪的日本第一勸業銀行顧問宮崎弘道（Miyazaki Hiromichi）晤談時，他表示民進黨席次的躍進，是臺灣政治民主化跨出的第一步，意義重大。李也談到改革過程勢必引發國民黨保守派頑強抵抗，彼此之間進行一番角力，將無可避免，當局只能一步一步引導政治革新，繼續不斷向前行。

蔣經國晚年的政治挑戰

1987年的蔣經國，健康情況每況愈下，可謂風中殘燭，在他生命的這最後一年裡，臺灣島內各種新舊政治力量、思維與觀點交光互影，令人目不暇給。該年7月15日，國府正式宣告解除長

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成為黨國體制之下第一道棄守的防線。蔣經國又在公開場合宣稱自己也是臺灣人，並以「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來要求國民黨推動改革。與此同時，為了延續大陸時期傳承下來的法統，蔣依然頑固堅持必須在不變更動員戡亂體制的基礎上來推動革新，設法抗拒臺灣政體發生結構性轉變。另一方面，為了不引起對岸疑慮臺灣是否走向臺獨，國民黨於該（1987）年秋天宣布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一舉打開 1949 年以來兩岸交流之窗。此時輾轉於病榻與輪椅之間的蔣經國，有如掙扎於政治天秤上的兩端，努力求取平衡，然而動員戡亂黨國體制尚能維持多久時間，恐怕連他本人也無法預測。

蔣經國生前最後一段時日所作所為，引來各方不同看法與評價，北京當局分析國民黨如此劇烈改變政策的原因，在於四十年來臺灣經濟結構已發生極大轉變，從原本的農業經濟轉型成為工商業經濟，社會階級也有顯著變化，中產階級成了社會結構的主幹，連國民黨本身也出現質變，從蔣介石時代的強人政治格局，逐漸演進成為保守、開明與地方派系三大勢力鼎足而立的局面。當臺灣社會變得更加多元，各種政治勢力與利益團體風起雲湧，紛紛提出新的權利要求，矛盾檯面化之後形成巨大衝擊，讓國民黨不得不啟動政治革新。面對民進黨主張「臺灣住民自決」，中共內部也不乏出現批判國民黨的聲音，認為長期以來各種政策僵化，導致民進黨的訴求得到不少本土百姓支持，甚至到蔣經國去世之前數日，部份焦慮兩岸統一遙遙無期的解放軍鷹派人士，甚至公然主張封鎖臺灣港口，達到以戰逼和目的。

自 1986 年民進黨初創之始，雖有部分中共外交系統開明人士不排除與這股新的政治勢力接觸與對話，然北京主流觀點基本上已將其定位為「臺灣島內臺獨力量」，並將其主張視為「分裂國土行徑」。然而民進黨要員本身又是如何看待臺獨、本土認同與政治路線等重要議題呢？謝長廷曾向日本外務省官員透露，民進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新組成的黨中央對於未來前景曾有一番嚴肅討論。他以當時正準備從海外闖關返臺的許信良為例，指出大多數黨內幹部對於流亡海外的黑名單份子皆持謹慎態度，深怕這群人一旦加入民進黨，恐怕會讓整個黨趨向極端與激進化。許信良的支持者雖主張應在中常會保留十個席次給海外獨派人士，但此議並未獲得採納。首任主席江鵬堅私下向日本駐臺北外交官透露，允許公開討論臺獨議題，乃是言論思想自由的展現。江表示對於臺獨議題，他自然會從各方面現實來深思熟慮，傾向於將臺獨視為「最後武器」，一旦中共武力犯臺或者國共準備談判統一時，此一主張將可作為臺灣人民意志，與之對抗。江鵬堅務實地認定民進黨當前重要目標，在於推動立法機構全面改選，並爭取黨候選人能有好成績；言下之意，於體制內推動改革，顯然是眼下的主要策略。時任民進黨副秘書長的邱義仁，面對臺獨議題時更是單刀直入詢問日人，究竟要如何定義「臺獨」？蔣介石時代任何主張不同意見者，不論是

否真主張臺獨，也不論是本省籍或外省人，都可能被冠上臺獨罪名；而邱稱他所屬的「新潮流」派系對於臺獨主張，乃是以臺灣整體安全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安定發展為前提，同時兼顧國際現實，作出對臺灣最有利的選擇。

民主化的潘朵拉盒一旦被開啟，連國民黨內部對於中華民國的定義與認同，也開始悄悄發生質變。自認是黨內開明派的立委黃主文在與日本外交官私下晤談時，堅信維持臺海現狀並鼓勵兩岸交流，乃是對臺最有利的策略，他一方面批評民進黨主張臺獨將引來禍端，犧牲掉臺灣得來不易的經濟發展成果，另一方面又大膽批判國民黨諸多政策過於保守迂腐。黃舉例說明稱，兩年前當中華民國新任駐日代表毛松年前往東京履任時，面對媒體竟然侃侃大談《論語》與孔孟之道，在他看來，這簡直是時代的錯亂，如果外交政策再不改弦更張，臺灣的國際處境只會更加艱困。同樣把自己視為改革派的立委趙少康則私下向日人強調，民主化既然已經動啟，國民黨就不應再墨守成規，未來新任黨主席的產生與提名機制運作，都必須按照民主程序來走，如此方能消除威權時代黑箱作業陋習，讓所有決策過程透明化，全部攤開在百姓面前。1987年的秋天，國民黨中央特地舉辦黨籍立法委員同志茶會，聽取意見，當萬年資深立委發言堅決反對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並主張嚴懲民進黨違法行徑之時，增額黨籍立委卻高聲疾呼黨中央應儘速制訂中央民代退休辦法，以及與不同政黨勢力對話的交往準則。國民黨內老、新世代之間對於政治改革議題的態度，已出現嚴重分歧。

蔣經國的辭世與新時代的來臨

就在不同意見與觀點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之時，蔣經國於1988年1月13日下午於七海官邸因大量吐血、急救無效而撒手人寰。消息傳出後，美、英兩國政府不約而同評論稱，蔣的辭世標誌著一個「時代」(era)與「朝代」(dynasty)的終結，紛紛預言國民黨未來的權力結構將發生重大改變，並且在民意趨使之下蛻變成一個本土性政黨，強化對臺灣自身的認同。就在蔣去世之前的一個星期，在一份他尚未來得及批閱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呈交文件裡，黨部高級幹部力陳，在即將於該年夏天召開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海內外輿論強烈建議選舉黨代表的方式應力求民主化，應繼續推動各項政治革新，起用新幹部，建立新觀念，同時對解嚴後各種情勢擬定新的政策方針。臺灣政治演變至此，民主化改革潮流顯然已無回頭路。政治強人已遠離，時空環境已出現劇變，從大陸來到臺灣的中華民國法統與國民黨權力正當性，此後也邁入一個新境地，逐漸被重新賦予不同定義，並深刻影響著邁入後威權時代臺灣的政治、外交與兩岸關係。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US-China Relations

Dalton Lin
Sam Nun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alton Lin is a tenure-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Sam Nun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 earned his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 Before joining Georgia Tech, he was a research associate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with the Princeton-Harvard China and the World Program.

US President Joe Biden described US-China relations as “[extreme competition](#)” in his first virtual meeting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2021. Since then, the competition has flared up in places from the Taiwan Strait to Africa and in areas from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o other civil-military dual-use technology. Political scientists John Mearsheimer and Aaron Friedberg have warned that China’s expanding ambitions inevitably encroach on US geopolitical interests. Harvard University Professor Graham Allison has brought this expectation of conflict to fashion by coining the term “Thucydides Trap.” This article aims to help readers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evolution of this pair of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at observers ask with handwringing: Are they destined for war?¹

- **1949-1950: The formation of the East Asian Cold War**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hina was soon engulfed in a civil war between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uomintang, KM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his moment was also the dawn of the Cold War. After the CCP gained the upper hand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and surged to power,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China leaned towards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CCP and the newly establishe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aiming to break the alignment between the CCP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minimize Soviet influence in East Asia. American policymakers believed that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outweighed thos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fter all, the Soviet Union maintained its special privileges in northeastern China and Xinjiang, which the Russian Empire had acquired during the decline of China’s Qing Dynasty. Consequently, America’s China policy became what was known as “waiting for the dust to settle.” The United States ended its involvement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ceased support for Chiang Kai-shek, the KMT regime, and the KMT’s new stronghold, Taiwan, to avoid becoming an enemy of the new China under the CCP’s rule and buy time for the emergence of Sino-Soviet conflicts.

¹ An earlier Chinese version of the article appeared in Dalton Lin, “Zhuding yizhan? Meizhong Guanxi [Destined for War? U.S.-China Relations],” in Benjamin Ho (eds.), *Jiegou Meiguo: Shijie Baquan de Guoqv, Xianzai yu Weilai* [Deconstructing America: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World Hegemon] (Taipei: Wu-Nan Book Inc., 2024).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failed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RC or even ease tensions with the new China. For the CCP, the United States was the leader of the capitalist camp. The United States had initially supported the KMT against the CCP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When the KMT lost power and control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approaching the CCP. Therefore, the CCP saw the shift in US attitude as merely a strategy aimed at dividing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camp led by the CCP and supporting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against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To counter the perceived American disruption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or aggression against the new China, CCP leaders found that Soviet support and assistance became even more crucial. On June 30, 1949, Mao Zedong announced that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were the goal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He declared that for the new China to achieve and consolidate victory, it must align itself solely with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so-called “leaning to one side” policy. On February 14, 1950,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signed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lliance, and Mutual Assistance.

Meanwhile,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was also forced to abandon its preferred China policy: reconciliation with the PRC to promote Sino-Soviet conflicts. Internationally, faced with the emerging Cold War, the US priority was in Western Europe—Western Europe was an industrial center. If the Soviet Union controlled Europe,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 US and the USSR would significantly favor the Soviet Union. As political scientist Thomas Christensen argues, to mobilize the American people, who wanted financial austerit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who were also firmly against communism, Truman had to appeal to the strong anti-communist sentiments among the American public to rally their support for the enormous aid to Western Europe. This need forced President Truman to oppose communist China and support anti-communist KMT to send a consistent anti-communist message to the American public.

Then, the Korean War broke out on June 25, 1950. Subsequentl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General MacArthur, the United States-led United Nations forces landed at Inchon on September 15 and intervened in the Korean War.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under the guis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 Army, crossed the Yalu River and entered the war on October 19, leading to direct armed conflic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hen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was signed on July 27, 1953, over 400,000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s and over 36,000 American soldiers had died. China’s “leaning to one side” policy, coupled with the Korean War, established 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 for the next 20 years and ma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chenemies of each other.

- **1951-1969: The Formation of US East Asian Military Alliances and Containment of China**

To contain communist expansion centered around China in East Asia,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organizing hub-and-spoke military alliances, with the US as the hub and radiating to individual allied countries around China. The US-Philippine Mutual Defense Treaty was signed in August 1951. In September, it was the US-Japan Security Treaty and the ANZUS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Treaty. In October 1953,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signed their mutual defense treaty. In September 1954,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 New Zealand, France, the Philippines, Thailand, and Pakistan formed the 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 in Decemb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signed their mutual defense treaty. The US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East Asia after World War II was thus established.

The CCP perceived the series of US-centered defense treaties as an attempt to contain and exert security pressures on China. In particular, the US-Republic of China Mutual Defense Treaty, which incorporated Taiwan into the US East Asian military alliances, signified a reverse of US policy and a deepening and prolonged US involvement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CCP considered the US re-engagement a long-term security threat to its regime and negatively impacted PRC-US relations, exemplified by the two Taiwan Strait crises in 1954-55 and 1958.

Sino-US tensions heightened dramatically again whe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vened in the Vietnam War in 1965. China believed the US deployment of troops to its southern doorstep was aimed at encircling China, thus actively supporting North Vietnam. However,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Korean War,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exercised restraint to avoid direct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US ground forces did not cross the 17th parallel into North Vietnam, and China's assistance to Vietnam mainly consisted of logistics, supplies, and anti-aircraft units. Therefore, although the two sides were sharply hostile, their restraint prevented another direct bloodshed.

On the communist side, Sino-Soviet relations began to deteriorate noticeably no later than 1959, leading to the Soviet Union's decision in July 1960 to withdraw all Soviet advisors stationed in China. However, the Western power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not confirm and exploit the Sino-Soviet split then. By the late 1960s, China's strategic environment underwent a dramatic change. Firstly, in August 1968, the Soviet Union invaded Czechoslovakia to crush the Prague Spring and announced that the Soviet Union reserved the right to use force to intervene in any socialist country that tried to leave the bloc in the so-called "Brezhnev Doctrine." These developments made China deeply uneasy: China feared it would be the next Czechoslovakia. In March 1969, Sino-Soviet clashes occurred on the Zhenbao Island, almost pushing the two countries to the brink of war and exposing the split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world. In August of the same year, border clashes broke out again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Xinjiang, and there were rumors that the Soviet Union might launch a preemptive nuclear attack on China. Suddenly,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shifted from ideological division to security threats, forcing Mao Zedong to consider major strategic adjustments.

Meanwhile, US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who took office in 1969, expressed his desire to enhance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an article in *Foreign Affairs* in 1967. In his inaugural address, he reiterated his intention to develop relations with "all countries." After the Sino-Soviet split became public, he instructed the US Ambassador to Poland to reach out to Chinese diplomats to resume the Warsaw ambassadorial-level talks that had been on hold since 1955. China promptly agreed. Ambassadorial-level talk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resumed in January 1970. In 1969, Nixon's plan to gradually withdraw US troops from Indochina and Mao Zedong's aspiration to adjust China's policies towards the US to counter Soviet security threats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US-China reconciliation.

- **1970-1978 Rapproch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the Issues Involving Japan and Taiwan**

In 1970 and 1971,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embarked on a series of small diplomatic steps to signal their intentions of mutual reconciliation. In February 1970,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released the "President's Foreign Policy Report." The report stated that stable international order could not be achieved without China's contribu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United States no longer view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as a single enemy but treated them separately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policie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July, China responded with goodwill by releasing the American Catholic bishop, James Walsh, who had been imprisoned since 1958. In July and August, the United States responded to China's actions by lifting some trade restrictions on China. On October 1, Mao Zedong invited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Edgar Snow to join him at the Tiananmen Gate to review the PRC National Day parade. In October and November, the United States expressed its willingness to send a high-level delegation to Beijing through channels in Pakistan and Romania. Zhou Enlai welcomed this. In December,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Edgar Snow, Mao Zedong expressed his willingness to receive Nixon in Beijing. In April 1971,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of the World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s in Nagoya, Japan, China invited the American table tennis team to visit China, and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quickly agreed, leading to the dramatic "ping-pong diplomacy." Before the visit of the American table tennis team ended,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the complete lifting of the 22-year-long trade embargo against China. Suddenly,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versed from hostility, opening up imaginations about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ollowing the successful "ping-pong diplomacy," on April 21, 1971, China, through channels in Pakistan, expressed in the name of Zhou Enlai its intention to "directly discuss" improving U.S.-China relations and its willingness to publicly receive a special envoy of the US president (such as Henry Kissinger) or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in Beijing, or even the US president himself. Washington replied on May 10, stating that Nixon accepted Zhou Enlai's invitation to visit Beijing for "direct dialogue" with Chinese leaders and proposed a preparatory visit by Kissinger to arrange Nixon's schedule. Kissinger secretly visited Beijing from July 9 to 11. From February 21 to 28, 1972, Nixon visited China, materializing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most difficult geopolitical obstacles encountered in the rapproch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ere the issues of Japan and Taiwan. On Japan, China's biggest concern was that, as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ew from East Asia, Japan would rise again and support Taiwan's independence, incorporating Taiwan into Japan's sphere of influence. To alleviate China's concerns about the US-Japan alliance, Kissinger claimed that strengthening the US-Japan alliance was not only the best way to counter the Soviet Union but also to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Japanese extremism, militarism, and independent actions.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forming a united fro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o counter the Soviet Union, accepting the US-Japan alliance became China's lesser of two evils.

Taiwan was another primary obstacle to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gain, under the grand strategy of cooperating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issued at the end of Nixon's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dopted an "agree to disagree" approach. The communique highlighted the common interest of both sides in opposing Soviet

hegemony and allowed both countries to express sharply different views on Taiwan's sovereignty. In the Shanghai Communiqué,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d"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challenge" this.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recogniz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sovereignty claim over Taiw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s legal status remained undetermined (although at China's request, the US no longer openly mentioned Taiwan's undetermined status and merely passed over it with the vague US "one China policy"), and as long as the differenc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could be peacefully resolved, the United States took no position on Taiwan's ultimate political status.

- **1979-1988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Engagements**

After reconciliation, the ongoing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over Taiwan's sovereignty continued to hinder the establishment of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stalemate took a different turn in 1978. Deng Xiaoping, who returned to power in the CCP, wanted to push forward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us needed a peaceful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s a superpower in the capitalist camp, could both balance the security pressure from the Soviet Union and provide the capital and technology needed for China's four modernizations, making it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 to obtain diplomatic recogni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nsolidate Sino-US relations. Therefore, while Deng Xiaoping demanded the United States sever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withdraw its troops stationed in Taiwan, and abrogate the US-ROC Mutual Defense Treaty, he temporarily tabled the issue of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which China considered as infringing on its sovereignty over the island,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for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agreed to the three conditions of severing diplomatic ties, withdrawing troops, and abrogating the treaty. On December 15, 1978, the two countries signed the "Joint Communiqué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establishing their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on January 1, 1979.

After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submitted legislation to Congress in January 1979 to maintain unofficial ties with Taiwan. However, Congress rejected this proposal and instead enacte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states several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that "any effort to determine Taiwan's future by other than peaceful means, including boycotts or embargoes, is a threat to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the Western Pacific area and of grave concern to the United States"; "providing Taiwan with defensive weapons"; and "maintaining the capac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resist any resort to force or other forms of coercion that would jeopardize the security or the social or economic system of the people on Taiwan." President Carter signe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on April 10, 1979, marking the first time the United States used domestic law to regulate its foreign relations.

China believed that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violated the US-China Joint Communiqué and that arms sales to Taiwan encroached upon China's sovereignt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lso mentioned that the US decision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was "based on the expectation that the future of Taiwan would be determined by peaceful means." However,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for diplomatic recognition in 1978, China repeatedly refused to link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Taiwan issue explicitly. The issue of arms sales subsequently became a controversy that significantly strained US-China

diplomatic relations. As a result, on August 17, 1982, the US and China signed their third communiqué specifically addressing the arms sales issue, known as the "August 17 Communiqué." In the "August 17 Communiqué,"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expressed its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China's policy of peacefully resolving the Taiwan issue, followed by a declara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seek to implement long-term arms sales to Taiwan, that its arms sales to Taiwan would not exceed the level quantitatively and qualitatively provided in the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that it intended to gradually reduce arms sales to Taiwan to achieve a final resolution over a period of time. However, the "August 17 Communiqué" failed to eliminate the diverge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s the two sides interpreted the document differently: The United States emphasized that the reduction of arms sales to Taiwan was linked to China's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Taiwan issue, while China emphasized the US commitment to respecting China's sovereignty and gradually reducing arms sales to the island.

The "August 17 Communiqué" did not resolv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ut was sufficient to trigger anxiety in Taiwan. To assure Taiwan, President Reagan sent a special envoy to Taiwan to convey the "Six Assurances," namel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d not agreed to set a date to end arms sales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d not agreed to consult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dvance on arms sales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would not mediate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would not ame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had not changed its position on Taiwan's sovereignty; and would not exert pressure 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negotiat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is da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Six Assurances," and the three US-China communiqués constitute the foundation of the US "One China Policy." From this context, we can also understand that the US "One China Policy" and China's "One China Principle," which states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in the world,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C i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representing the whole of China,"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concepts.

Despite the strain mentioned abov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uccessfully avoided letting the Taiwan issue affect their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With hindsight, the United State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subsequent rise. It maintained a quasi-ally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1972 to around 1988 and continued its policy of "engagement" with China from around 1989 to 2016. This enabled China, after 1978, to utilize the capital and technology of advanced countri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for modernization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leading to China's subsequent rise.

- **1989-2010 A New Framework for Post-Cold War US-China Relations**

Although the overall US policy towards China from 1972 to 2017 was one of "engagement," the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 in 1989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Berlin Wall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rought another qualitative change in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1980s, 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lites, along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rked to shape an image of the PRC in the mind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China was changing and the CCP was different from other communist parties to rationalize the US engagement policy towards China. However, the crackdown at Tiananmen Square showed that the CCP was no different, at least no less brutal.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communist bloc in Eastern Europe diminished the need for a US-China

alliance. American society could no longer accept the pre-Tiananmen logic of maintaining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China.

As a result, the Bush Senior administration needed to present new reasons to maintain engagement with China. On February 7, 1990,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Lawrence Eagleburger testified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outlining the new China policy of the US government. Eagleburger acknowledged that the need to counter the Soviet Union had disappeared, but he argued that the strategic value of engaging with China stemmed from China's importance in addressing international issues, such as missile an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proliferation, where the interests of the two countries often diverged. This argument set the tone for US policy towards China in the 1990s and 2000s. As James Mann put it,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now lay not in the value it could provide but in the harm it could cause. The new US China policy created a paradoxical situation: China could successfully demonstrate its importa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threatening US interests, or at least being in a position to do so in the near future.

In addition, during the US-China reconciliation, Nixon and Kissinger told China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nly cared about China's behavior abroad, not domestically. However, after the Tiananmen incident, this approach of ignoring China's domestic politics was no longer acceptable to American society. The new argument of the US government was that if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d to engage with China, in the long run, these efforts would bring about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China. In other words, before the Tiananmen incident, the American people were told that China was undergoing reform and becoming more tolerant. After the Tiananmen incident, they were told that if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d to engage with China (perhaps with a little push), China would become more tolerant, free, and democratic in the future. However, whenever US leaders made such statements, they only reinforced China's concerns about US attempts to undermine or overthrow the CCP regime through "peaceful evolution" and moderate means such as economic,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 **Reflection and Reversal of US China Policy After 2010**

In 2008,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d 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which evolved into a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For China, its once esteemed "mentor" made mistakes, and the American model was no longer an unquestionable modernization paradigm. In contrast, China weathered the crisis more smoothly than most other countries worldwide,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confidence in its own system. In the aftermath, China became noticeably more willing to assert its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strength to uphold or expand its interests. Such assertiveness included asserting its sovereignty claim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challenging US treaty allies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S security commitment to Taiwan, thereby challenging America's security architecture and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China's foreign policy shift towards a more assertive, unilateral stance threatened US interests, prompting reflections and debates on China policy in the 2010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ainstream conclusion was that the US engagement policy towards China was wishful thinking and had utterly failed. Engagement policy believe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on various policy issues would strengthen reformist or liberal forces within China, aligning Chinese thinking more

closely with the West and guiding China's interests to converge with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these did not materialize. Engagement policy also believed that China, as the greatest beneficiary of the US-led international order, would be motivated to uphold this order.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Jr'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Robert Zoellick once called for China to become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a product of this idea. However, China sought a world order that served its own interests. When asked if China would accept its place in the US-led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late Prime Minister of Singapore, Lee Kuan Yew, told Harvard University Professor Graham Allison unequivocally, "No," because "China wants to be China and not an honorary member of the West."² Engagement policy also believed that China was fragile and facing many domestic challenges, so putting too much pressure on China would lead to its collapse and regional chaos. At the same time,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market could induce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China and lead to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gain, none of these materialized. Instead, as China became wealthier and more powerful, it moved towards a more authoritarian form of state capitalism.

The reflection on the engagement policy led to a significant reversal of US-China relations. In December 2017,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explicitly rejected the engagement policy and positioned China as a strategic competitor seeking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This rejection marked a significant shift in US-China relations. In response to China's "whole-of-nation" challenge to US values and interests,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roposed a "whole-of-government" competition strategy, which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ontinued and expanded to include joint actions with allied countries. The "whole-of-government" competition strategy has been manifested in the phenomenon of "securitization"—those traditionally non-security issues such as trade now raise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As a result, in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efficiency and profitability are no longer the priority, but national security is. Moreover, US departments that were not involved in China policy under the engagement policy, such as the Commerce and the Treasury, are now playing a prominent role in US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new "strategic competition" policy notably focuses on technological and security races with China. Regarding technology, the United States seeks to trade with trusted partners through US regulations and allied cooperation while excluding China through export controls and limiting China's access to advanced technology to secure the technology supply chain and maintain US 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 These measures have primarily targeted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cluding the Chip 4 chip supply chain allia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and joint controls o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exports to China by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Netherland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extended similar restrictions to investment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quantum technology in China. Compared to the engagement policy, which emphasized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new strategy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emphasizes "de-risking," leading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toward what China calls "decoupling" and "disconnection."

²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 Sept. 24, 2015,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

Regarding securit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essentially compete over power projection capabilitie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In response to China's challenges to the US East Asi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e United States is actively strengthening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gainst China's anti-access/area denial capabilities. On the one h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countering China through small-scale, dispersed, and flexible force deployments (such as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US bases in the Philippines but rotating rather than permanently stationing troops).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ited States enhances the capabilities of regional countries to counter China's threats by providing weapons, equipment, and intelligence to allies (such as the Philippines) and security partners (such as Taiwan). In addition, the United States is forming new alliances in the region. Washington has revitalized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India, and Australia, established a new US-UK-Australia alliance (AUKUS), urged Japan to increase military investment and autonomy, and encouraged regional allies to cooperate (such as intelligence sharing between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between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America's long-term global interests remain to prevent any country from dominating Asia or Europe.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need to prevent Soviet domination of Eurasia pushed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 China. Today, under America's new strategy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some observers argue that a new Cold War has begun, with China, once an ally against Soviet hegemony, now becoming the hegemon to be countered.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mo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engagement policies may be the change in America's mindset: the United States no longer chooses to appease China for fear that a tit-for-tat policy will anger China. A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stated when announc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China policy in 2022,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operate with China wherever possible but compete confrontationally wherever necessary, and the two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Commerce Secretary Gina Raimondo perfectly interpreted this attitude during her 2023 visit to China. She stated that 99% of US-China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national security, so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seek to decouple from China. Still, in matters involving national security,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ever loosen its economic and trade restrictions on China.

To conclude, the US-China "extreme competition" that President Biden expected results from several factors. First, as China's national strength grows, it wants to carve out a security buffer zone around its territory that deni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great powers' military presence, just like w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However, such a Chinese buffer zone will cast doubts on US security commitments in the region and lead the US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East Asia to crumble. Second, as China's global prominence grows, it wants to revise the rules of the current US-led international order to fit China's interests better. However, such adjustments unavoidably will encroach on the extant US interests. Third, the United States promulgates liberal values worldwide as Washington believes democracies are more reliable partners than non-democracies. However, China perceives such value-based promulgation as threatening the CCP's regime's survival. Since these factors are difficult to alter in the short term, one should brace for tens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美國對臺策略：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辯論

吳冠昇

美國南阿拉巴馬州立大學政治與犯罪學系助理教授，普度大學政治學博士

碩士與學士學位分別在哥倫比亞大學以及成功大學完成
主要研究興趣包含國際關係、民意調查、研究方法與美中臺關係

隨著美國總統大選逐漸臨近，許多人開始關注美國下屆政府的對臺政策是否會有重大的改變。誠然，在現在這個時間點預測下屆政權的對臺政策，言之過早。但這幾年，在華府，政治圈以及美國學界如火如荼熱烈討論的一項政策辯論問題，就是「美國是否需要大幅修改已經採用數十載的戰略模糊政策（policy of strategic ambiguity）」。

包含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以及最近來臺訪問的美國前國務卿龐培歐等許多人，都認為美國應該採用戰略清晰政策（policy of strategic clarity），來取代現行政策。在這篇短文中，我將淺談這兩種政策的不同之處。

戰略模糊政策

所謂的戰略模糊政策，旨在讓海峽兩岸的任何一方，在考慮脫離目前的現況（status quo）時，都無法確定美國將如何回應。具體來說，假設臺灣政府脫離現況宣布獨立，臺灣將無法確定兩岸可能開戰的情況下，美國是否會以軍事力量馳援臺灣。反之，一旦中國政府脫離現況攻擊臺灣，中國也無法確定，美國是否會以兵力來介入戰爭。因此，戰略

模糊政策本質上的功能是對於海峽兩岸的政府進行雙重嚇阻（dual deterrence），讓雙方得知貿然離開現況的後果，都不會比維持現況來的理想。以結果來說，戰略模糊近幾十年來很大程度的維持兩岸的和平，讓武裝衝突並未升高。這對於冷戰時期的美國而言，已及臺海雙方都是好事，更符合美國國家利益。

然而，原本立意良善的「戰略模糊政策」，近幾年來因為種種原因，讓越來越多人認為應該要被「戰略清晰政策」來取代。戰略清晰政策的支持者認為美國應該要明確地讓臺海雙方知道，如果中國在臺灣未主動偏離現況而採取攻擊的話，美國將出兵協防臺灣。有些人甚至認為美國應該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主動協防臺灣。會造成這樣想法的轉變，最主要原因與中國的軍事實力成長有關。首先，在近幾十年的努力之下，中國已經在兩千年出逆轉臺灣曾有的軍事優勢。除了擴大與臺灣的軍事差距之外，近幾年，中國在造艦等許多方面，也大幅縮小了與美國的軍事能力差距。

中、美軍事實力的消長，意味著原本模糊政策中的「雙重嚇阻機制」可能會開始失靈。隨著中國在臺灣周邊海域的軍事部署以

及頻繁演習，可以想見的，美軍對中國的牽制力量會逐漸降低。如果此情況繼續發展，中方有一天將會對美軍的軍事牽制無所忌憚。這也代表戰略模糊所仰賴的嚇阻機制正式失效。戰略模糊政策的另一個問題是，在臺灣方面，美國早已不需仰賴戰略模糊來說服臺灣維持現況。越來越多臺灣人認為臺灣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同時間他們也務實的了解，貿然地在國際上尋求法理獨立（de jure independence）會導致兩岸開戰，（註 1）所以戰略模糊對於維護臺灣使其停留在現況，可以說是多此一舉。

其實，部分的學者認為戰略模糊政策對臺灣的安全，在某些部分是有害的。雖然美國從未公開聲明會軍援臺灣，但歷史上的三次臺海危機，很大程度上都是仰賴的美軍的介入，才獲得和平解決。對於臺灣人民而言，他們從美軍屢次的軍事介入所學到的經驗就是，美國幾乎百分百肯定會介入臺灣的戰爭。這與戰略模糊政策的想法是背道而馳。也因為認為美軍肯定會馳援臺灣，臺灣在近幾十年以來，在軍事以及國防準備方面，可以說是未盡心盡力，從役期的縮短，軍購的延宕，以及社會對軍人的觀感等議題，都可以看出民眾對這些議題的不重視，反正美國會來幫助臺灣。當然，上述的問題，在中國對臺灣這幾年的軍事威脅之下，已有很大的轉變。但可見的，戰略模糊對於臺灣的軍事準備，很弔詭地反而造成反效果。（註 2）

戰略清晰策略

由於上述原因，許多人認為美國應該揚棄戰略模糊而轉向戰略清晰策略，來補強現有的缺點。首先，趁美國對中國還擁有可見

以及明顯的軍事優勢，美國應該主動表達會在臺海衝突中協防臺灣的意願，以強力嚇阻中國，並削減其願意入侵臺灣的意願。因為中、美兩國都擁有核武，只要美國明確表達協防臺灣的決心，最終的核武威脅可以讓中、美雙方達到一個恐怖平衡，而不至於讓衝突發生。戰略清晰策略有助於顯著降低雙方談判的風險。

為了避免臺灣在獲得保障之後，單方面推動理獨立，美國可以在推行新政策之前，先與臺灣政府達成協議，要求臺灣承諾永遠不推動行法理獨立，並主動加強軍事準備，例如逐步增加軍事預算和向美購買武器等。這樣的倡議是有研究支持的，我的研究團隊在今年發表了一篇論文，通過實驗問卷法，我們發現臺灣群眾在面對上述的談判情形時，會明顯降低了他們對於臺灣尋求獨立的支持。換句話說，美方可以拿戰略清晰來要求臺灣承諾不會尋求獨立，這樣的結果對臺灣人民而言是可以接受，對美方也是一種保障，更重要的是，這樣做消除了戰略模糊策略的風險。（註 3）

雖然降低了戰略模糊策略其中的部分問題，但近幾年來戰略清晰也遭遇到許多批評。最主要的論點是戰略清晰反而會更加速了將臺、中、美三方推向戰爭。雖然新政策消除了原本美、中關係中間的不確定性，但一旦美國給出承諾要保衛臺灣，在中、美固有的軍事能力差距下，這代表著中國更不可能在未來，甚至像其所言 2027 年光復臺灣，因為中方屆時也無法在軍事上佔上風。所以，批評戰略清晰的學者認為，此項重大的策略改變也有可能點醒中方，必須在美國做好軍事準備安排，例如派大批兵力到臺灣之前，抓緊機會提前入侵臺灣。現在貿然的改變政

策，反而可能會給中國開啟戰爭一個合理的藉口（Casus Belli）。

這個論點是立基於兩個考量，首先，根據中國的軍事戰略研究，如果中方得知美方將介入且決定率先發起攻擊，中國的軍力和武器將受到重創，在首波的攻擊中喪失先機。這將導致中方在接下來的戰事中，無法扭轉局勢而吞下敗仗。所以，一旦中方確定美國必然會介入臺海戰事，那麼中方提前發起攻擊的機率將會大大提升。（註 4）其二，近年來，收復臺灣幾乎已經成為習近平維繫其政權以及歷史定位很重要的一部分。一旦美國改變對臺策略，甚至主動公開駐兵在臺的消息，這將對習政權造成巨大挑戰。如果習近平未做出強硬的回應，極有可能會引起國內群眾的不滿，進而威脅其政權的穩定性。因此，即使習近平本人可能不願意出兵臺灣，但在這個節骨眼上，因為政策的貿然更改，反而迫使他不得不與美國對峙。（註 5）

結論

美國對臺政策的討論，很多時候都集中在非常有限的網絡裡面討論。然而，這項攸關整體臺灣人民安全的辯論，必須讓更多人了解各項政策的論點及其優缺點。本篇文章正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寫。由於篇幅有限，本篇文章對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的討論，可以說僅觸及到冰山一角，希望對此議題感興趣的讀者，能夠進一步尋求其他渠道來獲取更多資訊。最後，由於今年美國即將迎來總統大選，因此如果真的要改變現有政策，採用戰略清晰政策，那麼最快也要等到明年新政府上台後才能做出決定。即便如此，我們也不應該等到新政府上台才思考這個問題，畢竟中國對臺的軍事打壓與武力威脅天天存在。我們對此議題了解的越深，對臺灣的安全越能做出貢獻。

【註釋】

（註 1）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從九零年代開始，就針對台灣人的政治態度做了調查，結果請見 <https://esc.nccu.edu.tw/PageDoc/Detail?fid=7804&id=6960>

（註 2）針對戰略模糊政策的限制，請參閱 <https://www.thedefensepost.com/2022/03/22/us-taiwan-dual-clarity/>

（註 3）欲看此篇學術論文，請至 <https://academic.oup.com/fpa/article-abstract/20/3/orae010/7658910>

（註 4）<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modernizing-deterrence-how-china-coerces-compels-and-deters/>

（註 5）對戰略清晰更完整的批評，請見 <https://academic.oup.com/ia/article-abstract/100/3/1171/7663884>

淺談 AI 與政治

黎建彬

美國德州山姆休士頓州立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
院院長和政治學教授

在人類的歷史上，科技發展一向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斷地影響我們的工作方式、人際關係與消費習慣。從 1990 年代起，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漸漸興起，不僅加速了數位經濟的變革，也使科技與人類社會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多樣複雜。

早期的 AI，透過機器學習，運用演算法在資料中尋找並提取其間的關係與模式。這些演算法嘗試不同的方法，在最低程度的人工干預的情況下，藉由持續的預測、比對和修正的反饋過程，不斷地改進其策略。像 Amazon 和 YouTube 等網站，根據我們的瀏覽歷史提供各種推薦選項，都是這種單向提供數據和分析結果的「預測式 AI」的作用。直到近年來生成式 AI 的興起，開始具備推理、理解和架構能力，能與人進行雙向互動，AI 也將會更深刻地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與工作流程中。

雖然 AI 仍處於發展初期，其對社會各個層面的衝擊和影響，目前尚難有定論。不過，從美國所公佈的幾項民意調查看來，一般社會大眾對 AI 在政治上的影響，抱有很大的疑慮。比如說，展望今年秋天的美國選舉，有一半的美國人認為在選舉上使用 AI，將會使各項競選活動變得更加負面與惡質化，而只有 20% 的人認為 AI 會讓選舉變得更好。

這種悲觀的看法，其來有自。從過去幾次選舉看來，候選人的競選團隊，有時為了勝選，不惜透過網站或社群媒體發送假新聞、假訊息，來影響選民的投票態度與行為。AI 科技的出現，為選舉宣傳的製作與傳遞，提供了更新、更有效的工具。實驗顯示，多達一半的受訪者無法區分真實視頻和被深度偽造（deepfake）技術變造的假視頻，而在年長的族群中，這個比例更高。競選團隊可以在關鍵時間，製造散發真假難辨的圖像和影片來攻擊對手。在對手還來不及出面澄清、解釋之前，透過不同的平臺迅速大量地轉發，推波助瀾，造成風潮。在社會越來越對立分化的情況下，只要有少數中間選民因此改變他們的投票意向，就可能使整個選舉翻盤，在很短的時間裡，為對手帶來難以挽救的傷害。

另一方面，AI 也可能把傳統的「網軍」運作，推向一個新的境界。競選團隊可以微調機器學習的參數，從而打造出許多具有不同特質的「人造網軍」。相較於傳統的網軍部

隊，他們可以展現出更多樣的應變方式，借助這些差異性來掩人耳目，提高可信度，隱藏他們真實的身份。AI 創造的網軍，更可以全天無休地監測、掃描新聞事件，在網路上不斷地炒作事前設定的議題，或藉製造爭議，或藉傳播假消息，來達到宣傳或攻擊的效果。

負面選舉的手段，一直存在，只是在新科技的幫助下，可能更容易被操作。這不僅對競選活動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也可能激化社會對立，降低互信。此外，目前政府立法的速度，遠遠趕不上這些新科技發展的趨勢。在缺乏保護選民免受假新聞、假資訊侵害的法律框架被建立起來之前，選民只能自求多福，保持警覺。這也是大部分人悲觀的原因。

然而，如果我們僅僅注意 AI 在選舉中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則可能忽略了它在其他方面可能作出的貢獻。如前所述，AI 的有效操作，有賴於持續的回饋和不斷的學習。而這正是政治系統的運作方式。政治系統也是一個反饋系統。政黨和候選人在選舉中提出解決問題的政見和政策，經過立法的過程，轉化成法律和公共政策。政策是否有效，是否需要修正，常常是執政黨和反對黨辯論的重心，也成為雙方下一輪選舉角力的焦點。

只是政治系統的運作和回饋，常常因為利益團體的介入和遊說，使政策評估失真或失焦。利益團體間互相競爭，除了資助候選人以外，也提供相關的資訊給立法或行政部門參考。不過，利益團體向立法部門所提供的資料，通常只是片面的，只呈現出問題或解答的某個部分，鮮少會對資訊進行全面的整合。另一方面，不同利益團體所提的政策選項，其間的選擇與取捨，通常只是透過行政或立法部門內部的協調談判，在衝突的利益中找出折衷的方案。妥協下的安排，其利弊得失，也並不一定經過適切的評估。而 AI 的強項正在資訊的整合與評估，如果善加利用，可以有效地幫助公益與公民團體，減小他們在訊息不對稱上的劣勢。

當然，AI 最大的貢獻不是在代替人來作決定，而是減少決策的盲點，提高政策的質量和效能。從宏觀的角度而言，行政與立法部門，特別是公民團體，都可以借助 AI 對公共政策作更有效的研究和評估，透過 AI 類比某個政策在不同情況下的基線，權衡其間的利弊得失，或找出可行的修正路徑。從微觀的角度而言，研究顯示，許多利益團體是透過提出修正案的方式，將有利於自己的提案夾帶過關。公民團體可以使用 AI 技術，比對監測各個修正案，建立動態的預警系統，促使立法過程更加透明。

AI 浪潮的出現，肯定會對社會的各個層面，帶來不同程度的衝擊；既有風險，也有機會。新科技的出現，不會改變人性，也很難保證不被誤用，但是我們也同樣期盼它可以為有志者與有識者提供工具，協助重塑政治環境，提高公共治理的能力，使公共政策達到造福更多人的目的。



淺談幾項投資決策的心理陷阱

鄭義為

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經濟學博士，阿拉巴馬州特洛伊大學商學院教授（退休）

前言

傳統投資理論的核心基礎是，人們通常會以理性行動來追求符合他們最佳利益的結果。然而，從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開始，心理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的研究發現，理性並不總是在投資決策上佔主導地位。也許是因為人類大腦難以準確評估風險和機率，或許是因為情緒強烈影響我們的思維方式，人們在投資決策中往往並不全然合理，且經常犯下認知和情緒的偏差（cognitive and emotional biases）。而行為金融學（Behavioral Finance）正是用來描述研究和解釋分析這些金融和投資互動的新學科。

本文旨在闡明幾項行為金融學上對投資行為偏差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並建議投資者可以採取哪些行動步驟來改善結果，確保更好的投資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謹就教於學會先進。

一、厭惡損失（Loss Aversion）

行為金融和經濟學中最早也是最具說服力的見解之一是，投資者對於損失所產生的

痛苦，遠超過獲利帶來的快樂。事實上，行為金融之父之一，也是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n）發現，損失帶來的心理傷害相當於同等收益的 2.25 倍。換句話說，投資者需要從 1 美元的投資中獲得至少 2.25 美元的收益，才能彌補失去該美元的情緒成本（emotional cost）。

對於投資者來說，這一發現具有重要含義。大多數被金融顧問用於衡量或評估風險容忍度（risk tolerance）的工具並非百分之百的正確。儘管人們可能在風險容忍度調查問卷中誠實回答問題，但經驗顯示，當實際市場波動發生且持股價值下降時，投資者的行為和感受往往與調查分析的結果截然不同。例如，市場急劇下跌時，投資者可能非常害怕，以至於因恐懼而決定出售全部或大部分持股。當然，這可能意味著賣家錯過了歷史上股市不可避免的回升和反彈機會。換言之，虧損厭惡的心理陷阱，可能導致投資者對風險評估的不合理，進而導致投資上的虧損。

克服厭惡損失並非像認知和改變思維那樣簡單。由於厭惡損失與我們的情緒密切相關，因此在尋找解決方案時必須非常小心。

減少厭惡損失影響的一個方法是改變大腦對情況的分析方式。投資收益和損失應被視為一場長期的馬拉松大賽，而不是一個時間點上的短跑。投資者過度依賴短期指標來衡量長期投資的表現，這會進一步加劇厭惡損失的影響。雖然大多數投資者都具有長遠的時間視野，但他們往往更偏好在極短時間內，對他們的業績進行微觀管理。

你必須了解在投資上有一個永遠存在的風險那就是：市場價格一定會有波動（stock market fluctuates）。這也是金融泰斗 J. P. Morgan 的名言。你必須不斷提醒自己，無論經濟或市場預測者的預測如何，股票價格都會波動，可能會下跌，也可能會上漲。

你應該專注於投資的長期目標，遠離短期的波動。當投資者能夠實現這些目標時，任何短期的下跌都更有可能被視為預期的修正，而不是災難。記得，風險是投資的一部分，就像開車到停車場時必須支付的停車費用，而不是罰款。

二、錨定（Anchoring）

錨定現象描述了人們對於一條資訊的過度依賴，下意識地使用與實際情況無關的資訊，如證券的購買價格，作為對該證券後續決定的固定參考點（或錨）。

舉例來說，假設 XYZ 股票幾個月一直在 30-35 美元之間交易。當一位投資者考慮購買股票時，可能會將「32 美元的股票」視為 XYZ 股票的「正常價格」，這就是所謂的「錨定」效應。如果股票隨後跌至每股 27 美元，錨定可能會導致潛在買家相信該股票很便宜。反之，如果該股票隨後漲至每股 35 美元，錨定可能會導致潛在買家相信該股票太貴了！

錨定還會影響投資者的投資組合，因為他們往往傾向於將購入證券的價格作為未來決策的錨。例如，如果一位投資者以每股 32 美元的價格購入了 XYZ 股票，「32 美元」成為投資者的錨。投資者非常不願意以 27 美元的價格出售股票，因為在他們看來，該股票每股「價值」32 美元。

避免錨定問題的關鍵是將購買證券與明確的投資目標聯結起來。例如，如果購買股票是為了其穩定的股息收益，股票價格的短期波動不會影響到發行公司支付股息的能力。此外，該股票仍有繼續履行其預期在投資組合分散風險的目的。同樣地，如果是為了執行資產配置計劃而購買的共同基金的情況下，則在決定購買或出售時，的應該更多地考慮如何符合長期資產配置計劃目標，而不是受到短期價格波動的影響，不得不出售投資者可能認為「暫時」遠離他們的證券真正的價值。

另一種避免錨定效應的方法是設定預先確定的買賣目標。透過在購買時共同確定預

先設定的銷售價格目標（高於和低於購買價格），投資者有效地提前自動做出了出售決定，從而削弱了因賣出贏家（winning stocks）太快和賣出輸家（losing stocks）太慢而導致的錨定和由此產生錯誤的影響。

三、熟悉性偏見（Familiarity Bias）

熟悉性偏見是一種認知偏見，人們在做決定時傾向於依賴他們已經熟悉的資訊。這意味著他們更傾向於喜歡已經熟悉的想法、概念和人。當面對新情況或一系列事實時，我們的頭腦會爭相尋找與過去事件的相似之處，然後對當前情況得出結論或評估，而這種熟悉性偏見會把我們誤入歧途。

在投資時，投資者在幾個方面表現出熟悉性偏見，美國投資人表現的尤其顯著。除了購買或不購買特定證券的所有合理理由外，美國投資人往往在其投資組合中，超乎常理的將投資比重大部分放在美國股市中的美國公司，因為他們熟悉這些公司。簡而言之，其他外國投資者對本國的證券的投資也相對比較多，但由於他們的國內金融市場比美國金融市場小得多，所以非美國投資人對非本國股票和債券的投資比例，要遠比美國投資人更高。

其次，許多投資者傾向於投資較穩當的固定收益證券或能源股票，而不是科技股，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對當前的選擇感到滿意，並發現對陌生的科技股投資，令他們感到不安。

研究發現，美國投資基金和金融機構在投資時，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其他發達國家及開發中國家的潛在獲利機會，換言之，美國許多號稱國際或全球基金，其實絕大部份投資仍聚焦在美國市場中的大公司，但因為美國大公司均為跨國公司，所以對資產的國際風險分散化（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的衝擊相對較小。

要解決熟悉性偏見的方法之一便是要更熟悉及了解不同型別的投資。擔心股票風險的固定收益投資者也應該了解，優質股息支付的股票和固定收益一樣安全可靠，而其回報模式非常類似債券。同樣，願意承擔投資風險的成長型股票投資者可能希望更多地瞭解某些高收益和不良債務（junk or high yield bonds）投資，這些投資可能會表現出增長股票的高波動性和高回報率。

四、心理會計（Mental Accounting）

行為金融領域的先驅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將心理會計描述為我們用來組織、評估和跟蹤金融活動的認知操作。從本質上講，我們以分門別類的方式思考金錢，這影響了我們的行為。

換言之，心理會計是我們在精神上將資金分類成單獨的「帳戶」的傾向，這影響了我們對支出的看法。心理會計使我們看到金錢不可替代（non-fungible），並使我們容易受到沉沒成本謬誤（sunk cost bias）等偏見的影響。

例如，許多人傾向於將工資部分視為支付租金、食物、汽車帳單和其他費用的帳戶，而獎金帳戶則用於旅行、揮霍或一次性儲蓄。從本質上講，由於我們傾向於從事心理會計，我們認為同樣的一塊錢，在一種情況下會比在另一種情況下是不同的，可能更有價值，或更具風險性等等。

如何打破心理會計陷阱？首先，無論金錢來自哪裡，也無論你計劃如何使用，都要以同樣的謹慎考慮對待它。其次，看看你的整體財務狀況，利用來自金融機構的工具，提供您各種帳戶的全面檢視。再者，不要透過改變基於一個，「帳戶」短期業績的支出習慣來打斷或是影響你的財務進程。「帳戶」，注意小事很重要，但不要讓這些小事情讓你忽視了整體，而影響實現長期財務的目標。

五、賭徒的謬誤 (Gambler's Fallacy)

假設你扔硬幣，連續六次出現正面 (head)，是否會認為第七次扔幣得到正面的機率會減小？如果你相信這一點，那你已經陷入賭徒的謬誤之中，也被稱為蒙特卡洛謬誤。

賭徒的謬誤指的是過去的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未來的賠率。由於人類難以理解概率的數學，我們常常在隨機事件中看到模式，然後在假設模式後，假設它不能繼續。那些認為「這只股票下跌得如此之多，註定要上漲」的人正在表達此一謬誤。

解決賭徒謬誤的最佳方法是，不斷提醒自己，在市場上，每一天都是嶄新的一天，短期內定價方向基本上是隨機的。同樣有效的是讓投資者專注於長期投資，並討論如何朝著目標取得進展。這些是有助於防止短期市場波動而不使其計劃脫軌的最好方法。

如果你無法抗拒在市場上玩弄點機智，進行短期投機的衝動，便容易成為賭徒謬誤的受害者。那麼最謹慎的做法是，僅留出一小部分投資組合譬如說少於 10%用於短線投機。

六、羊羣行為 (Herd Behavior)

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有市場存在，就會有羊群行為。從 1720 年的南海泡沫 (South China Bubble) 到在上個世紀末的網際網路泡沫 (Dot Com Bubble)。許多投資者都曾因陷入泡沫的欣喜若狂之中而付出巨大而沉重的代價。

當然，很少有投資者能意識到泡沫正在發生。大多數時候，投機泡沫都是從理性開始的。以網際網路泡沫為例，網際網路確實是一個將改變我們生活和經營方式的發展，許多新公司正在利用這趨勢成長。但當社會壓力越來越大，大眾瘋狂加入並獲利成為主流時，股市的全面上漲將股價推入了泡沫領域，「每個人都在這樣做並且賺錢，所以這決策一定是正確的」，而最終當每個人都集體清醒，並意識到股價的暴漲背離了基本面，且不太現實時，價格就會崩潰。

避開羊群效應的最佳方式就是，時刻提醒自己，股價有其基本面（獲利能力和成長潛力），一定要瞭解估值（valuation）的原則，即基於價值的證券支付能力，去評估該證券的合理價格，這無疑是長期以來，最有可能成為投資者成功的最佳途徑。在買入或賣出前確定股票的公平價值倍數，有助於加強投資者在面對羊群效應時的決心和定力。

如果你的幾個好朋友正在購買或談論熱門證券時，你應該在做出任何購買決定之前冷靜一會，或者和配偶商量研究一下，方可避免因頭腦過熱而成為那個最後跳上車的跟風傻瓜，最終與瘋狂的羊群一起衝下懸崖。

七、過度自信（Overconfidence）

最後談一下過度自信。讓我先問你幾個問題；你認為自己是個好司機嗎？與其他司機相比，你認為自己是高於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還是低於平均水平？如果過度自信心不是你答案的刺激因素，那麼大約三分之一的人會自詡高於平均水平，三分之一會自認是平均水平，而另外三分之一會選擇低於平均水平。然而，事實上過度自信通常是一種刺激。在一項研究顯示，當向參與者提出這些問題時，高達 82% 的人將自己評為高於平均水平的司機。顯然，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錯誤的。這正是過度自信的定義；誇大一個人執行某項任務的能力。學者對交易者行為的研究中發現，過於自信的交易者比不那麼自信的交易者，交易更頻繁。過度自信的人認為他們比其他人更有能力挑選股票，並且知

道進入和退出市場的最佳時機。然而，哥倫比亞大學金融學教授 Terrence Odean 在他的研究中證明，過度自信的交易者產生的收益率反而低於市場平均水平。另外研究也發現，過度自信投資人的特徵包括：男性（女性相對保守），高學歷，以及高所得。

練習自我意識（self-awareness），且定期評估你的信心水準，質疑和反省你的信念、假設和偏見，可以控制和防止過度自信影響你的決策。另外，你應該專注於管理投資策略中的風險，而不是試圖實現回報的最大化。

結論

在學者研究發現上述行為金融學中認知和情緒的偏差之前，華爾街的交易員早就知悉且意識到股市投資者的決策並不總是表現得很理性，反之經常受到貪婪和恐懼心理的影響。

然而，擁有一個明確且合理的長期目標，並把握住衡量實現這些目標的方法之投資計劃，有助於投資者專注於長期投資績效，使他們更不容易受到許多行為金融專家發現的非理性投資心理陷阱的影響。憑藉著對行為金融學中關於投資者如何以及為什麼實際做出決策的見解，佐以上述避免陷入心理偏差的建議，應可以幫助投資人做出更好的選擇，從而更有效地達成長期投資的目標。



從卡繆的《瘟疫》回顧個人醫學生涯

謝文儒

畢業於臺北醫學大學，在臺灣完成內科與感染症專科醫師訓練
赴美後，先後取得公共衛生碩士、微生物免疫學博士，以及病理專科醫師資格
1995 年開始在美國聯邦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擔任病理醫官，2020 年自 CDC 退休

序章：從卡繆的《瘟疫》汲取人生智慧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伯特卡繆（Albert Camus）1947 年的作品「瘟疫」（法文 La Peste, 英文 The Plague, 中文「黑死病」或「鼠疫」），描述一個二十世紀中期的小城鎮，居住著一群忙碌的人們，每天除了維持生活所須的商業行為外，所有的同情、憐憫、憂傷等情思，都不過是虛應故事的短暫心靈悸動。當早已絕跡的黑死病，死神式的降臨這個都市時，現代機械文明如何來應付呢？這本存在主義的小說，筆者在過去的半個世紀當中，總共閱讀了五次。第一次是在高中的時候，衝著史上最年輕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光環，買了一本新潮文庫的中譯本，在懵懵懂懂的情況之下，勉強讀完全書，當時只覺得枯燥沉悶，完全無法了解作者想表達的理念，畢竟十多歲的年紀對「生命的意義」和「人性的善惡」等概念是沒有什麼成熟的認知和思考能力的。第二次閱讀是在醫學院五年級的時候，因為開始接觸到醫學院的人文和公共衛生教育，多少能夠感受到書中所描寫的情境。後來還在學校的校刊—北醫人報，寫了一個專欄系列：「小說中的醫生」，包括卡繆的《瘟疫》，嘗試著從一個醫學生的角度來探討書中傳達的訊息。第三次拜讀該書，是在接受臨床感染症專科醫師訓練的時候，因為和本身專業相關，更進一步了解到在瘟疫中臨床醫師扮演的角色，但只是停留在一種模擬式的臆想。第四次閱讀是在進入美國 CDC 工作數年後，這一次細嚼慢嚥，感同身受，因為已經親身經歷過幾次的重大疫情調查。最後一次是在退休前兩年，閱讀的版本是英譯的電子版，這一次的感觸更是深刻，因為個人已累積了 20 多年的工作經驗，特別是在大規模的疫情當中所見識到的生命尊嚴和人性表現，竟然和這本在七十多年前的小說裡描繪的情境相去不遠，不得不佩服文學大師敏銳的觀察力和分析力。這些文學家對周遭環境的刺激，往往較常人敏感；他們對人類心靈的探討，也比一般人深入。尤其重要的是他們富有透徹的反應力和表達力，能將觀察與剖析所得，用敏銳的文詞陳述出來，

因此他們可以說是人類靈性的揭示者、道德觀念的標注者。從許多文學作品中，我們往往可以穿透自己的矇昧而洞悉清澈的人生大道。

心路歷程：從臨床醫學到公共衛生

回顧筆者的醫學生涯和心路歷程，四十多年來從臨床進入公共衛生的領域，歷經數個不同的階段，雖然最後選擇的路線並非在年輕時的生涯規劃之中，但「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數十年後回溯不同階段閱讀《瘟疫》這本書的心得，從其中似乎隱約有軌跡可尋。1986年筆者在臺灣完成內科和感染症專科醫師訓練後，前往哈佛大學攻讀公共衛生碩士，第一次到 CDC 是在 1987 年參加一個流行病學的課程，其中包括到 CDC 做三天的參訪。當時和幾位流行病學醫師面談後，對 CDC 的一個特別訓練班 EIS (Epidemiology Intelligence Service) 產生很大的興趣，要不是後來因為幸運申請到范德堡大學 (Vanderbilt University) 的微生物免疫博士班全額獎學金，筆者非常有可能在完成碩士學位後，會以 EIS 和流行病學做為赴美後專業發展的主要方向。人生的際遇有很多事情是難以預料的；筆者在范德堡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後，為了取得美國的醫師執照，因緣際會進入該校醫學中心的病理部門接受臨床和解剖病理醫師的訓練，成為當時病理部門年紀最大的住院醫師。常言「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病理原非我當年進入臨床工作的選擇，卻似乎在冥冥之中走向這條原本並沒有特殊興趣的道路，而且很幸運地能夠在 1995 年完成住院醫師訓練後，進入 CDC 的病理部門工作，主要負責各種新興感染症的病理診斷和重大疫情的病原調查，特別是須要在疫情前線做高風險的病理解剖來釐清疫情的來源時。CDC 的工作讓我得以結合臨床感染症、公共衛生、流行病學、微生物免疫學和病理學的訓練，在從事疫情調查時能夠學以致用，這是個人醫學生涯最大的收穫。年輕時，總天真地以為一旦進入醫學院，以後呈現在面前的，必定是一條平坦的康莊大道。畢業迄今，不知不覺地在醫學之途步履蹣跚的走了半個世紀。這一路行來，才瞭解即便是大道也得跋山涉水，披荊斬棘，才能達到當初立志行醫的目的，而絕無一蹴而就的捷徑。

回饋桑梓：返臺服務

筆者在職業生涯中，另一件感到非常欣慰的事情，就是能夠有機會以自己的專長返鄉服務。1998 年臺灣發生大規模的腸病毒 71 型疫情，筆者和另外兩位 CDC 流行病學醫師，被派遣到臺灣協助疫情的調查和控制。疫情結束後，為了提高疾病監控的效率，我們建議臺灣衛生署整合三個和疫病防檢有關的單位：防疫處、檢疫總所和預防醫學研究所，以避免再度發生重大疫情時所產生的混亂現象。翌年臺灣衛生署採納我們的建議，整合三個單

位，正式成立臺灣衛生署疾病管制局（Taiwan CDC，2013 年改制成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迄今一直保持和美國 CDC 密切的合作關係。

瘟疫戰士：面對 SARS 的挑戰

2003 年發生了一場無國界的瘟疫戰爭——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這個疾病是由一種以前所不知道的冠狀病毒所引起。2003 年 2 月起在中國大陸、香港、越南、加拿大、新加坡和臺灣等地區陸續出現嚴重疫情。美國 CDC 因為長期在美國本土和全世界各地從事各種疫情的調查，在流行病學和實驗診斷方面累積了豐富的經驗，因此很早期便接受世界衛生組織（WHO）的邀請，一起在疫區展開調查工作。由於政治因素，當時 WHO 無法直接介入臺灣的疫情調查。美國 CDC 在沒有任何政治因素的干預之下，接受中華民國政府的邀請，從 2003 年 3 月到 7 月，派遣了一個最大的團隊——先後三十多名相關專家，前往臺灣協助疫情的調查、預防和控制。筆者在疫情初期，和另外三位 CDC 的同事前往越南河內，加入 WHO 主導的國際合作團隊，協助疫情調查和收集病理解剖檢體。經過幾個星期夙夜匪懈的實驗室工作，CDC 和合作團隊終於確定病原是以前從來沒有發現過的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後來定名為 SARS 冠狀病毒。筆者後來在六月中旬也加入派遣到臺灣的團隊，協助臺灣的疫情控制。在臺期間有機會和兩位臺大的病理醫師做了一例疑似 SARS 感染的死亡病例解剖，並從病理診斷的角度釐清了其他幾個病例。疫情過後，當時的臺北市馬英九市長，衛生署陳建仁署長和疾管局蘇益仁局長，均特別前來亞特蘭大參觀美國 CDC，並且交換從疫情當中獲取的經驗和心得。翌年，臺灣疾管局開始招募防疫醫師，迄今已延攬數十位熱情的年輕醫師，投入臺灣公共衛生和防疫的重要工作。這批防疫醫師在日後臺灣的疫情調查和疾病控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 2010 年的 H1N1 流感、2013 年的颶獵狂犬病、2015 年的登革熱和 2020 年的 COVID-19 等等。

人性觀照：醫者仁心

在幾次重大疫情當中，筆者深刻體驗到《瘟疫》一書中所描述的個人心理反應和社會群體現象。瘟疫初期，居民們所表現的是懷疑和愚蠢，沒有人相信這個消失已久的隱形殺手已經光臨他們生活著的城市。書中的主人翁，伯納盧克斯醫生，由於職業上的敏感性，首先大聲疾呼檢疫措施的重要，但却未被接納，因此他不禁感嘆：「如果我們不是常常把自己隱蔽在幻想中，愚蠢就不會那樣地無往不利了。」盧克斯醫生並非什麼聖賢先知，他的心中祇有一個理念：「這是我的專業職責，我應該保護我的同胞病人。」由於死亡人數的激增，現代文明的優越感不得不在黑死病的權威下屈服。除了死亡以外，黑死病帶給人們的第一個感覺是「放逐」；都市被迫和外界斷絕聯絡、交通；人們被迫和自己的親屬、愛人隔

離；而由於職責所在，醫生成了檢疫和隔離的執行人員。盧克斯從未想到，他的職業對他自己竟是如此沉重的一個負擔。以上的這些情景，在幾次的重大全球疫情中，包括 2003 年的 SARS 和前幾年發生的 COVID-19，一再重複出現。筆者只能感嘆在人類的文明史上，雖然科技日新月異，不斷地在進步；但是有些負面的基本人性卻從來未曾改變過，譬如在疫情期間特別彰顯的冷漠無情、偏見歧視、自我防衛、互相猜忌。不過人性當然也有光明善良的一面，包括許多在疫情前線工作的醫護人員和公衛專家，正如雷克斯醫生心中的理念，為了保護同胞病人而與致命的病毒搏鬥，甚至不惜犧牲生命；2003 年 WHO 派往河內調查 SARS 疫情的厄巴尼醫師（Dr. Carlo Urbani）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厄巴尼醫師首先觀察到病人的臨床症狀以發燒和急性呼吸衰竭為主要表徵，雖然當時不知道感染來源是什麼微生物，但是從流行病學的觀點來看，非常可能是一種具有高度傳染性的呼吸道疾患，所以他以「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來描述這個不明原因的疫情。很不幸的，他在疫情前線得到感染，最終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厄巴尼醫師當時的理念想必和雷克斯醫生相仿，其實這也是每一個醫師都宣讀過的希波克拉底誓詞中的一部分：「我願盡余之能力與判斷力所及，遵守為病家謀利益之信條。」

筆者雖然已從職場退休，但仍積極的參與相關的學術活動，希望能夠利用殘存的剩餘價值，做一些薪火傳承的教育工作，特別是闡述新興感染症對全球健康的影響以及在疫情當中的人文應變和心理建設。在本文的最後以卡繆發人深省的名言作為結尾：「在疫情中不再有所謂的個人命運，只有瘟疫和眾人共同情感所構成的集體命運。」這也是回顧個人醫學生涯的一個整體感想。

【作者註】：本文部分內容截取自作者過去發表的文章：〈小說中的醫生專欄系列—生命的鬥士〉、〈一場無國界的瘟疫戰爭〉、〈防疫雙城記—從公共衛生的角度回顧臺北和亞特蘭大的合作情誼〉



四年一覺安平夢，贏得魚塭藥師名

蔡山慶

台大農化系及農化研究所畢業，威士康辛大學博士，加州大學博士後
美國能源部橡樹嶺國家實驗室以及美國衛生部CDC/ATSDR 毒物學家

《思源》主編何婉麗教授請我寫一篇蚊蟲的故事，我將繞過咬人的病蚊，只談臺南安平那批草蚊大軍的老故事。草蚊生長在虱目魚塭，昔日安平有成千累萬的草蚊棲息在堤岸的青草上（圖 1）。幼蟲則躲在水底，佔領覆蓋著底泥的藻床，和虱目魚搶食底藻，大幅降低虱目魚的產量。本文記載我用農藥防治紅筋蟲，保住底藻飼料，增產虱目魚的一些野史軼事，為臺灣從當年貧乏走向富足的這條來時路上，留下一點雪泥鴻爪。



圖 1：成群的草蚊，聚集在池岸的青草葉片上。

初入農藥研究的日子

我從 1963 年開始在臺大農化研究所農藥講座跟隨業師陳玉麟教授三年，替農復會研究防治柑橘園害蟲，東方果蠅，的方法。精煉了一百多種薄荷油（甲基丁香油）之類的香水，選取其中強力的引誘劑，和殺蟲劑混合，讓果園的雄性東方果蠅聞香而至，觸毒身亡，協助農復會預防東方果蠅搭乘臺灣的外銷柑橘入侵日本。

我在 1966 年從農藥化學研究室畢業後，到農復會漁業組當研究員（fellow），擔任虱目魚養殖研究小組的小隊長（Team lead）。當時美國洛氏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贈送六十萬美金給農復會漁業組，用來發展臺灣的養殖漁業。我被派遣到安平海邊的臺灣水產試驗所臺南分所上班。臨行之前，計劃主持人林書顏技正簡單交代任務：「去那裡看看有什麼事情可做，我派兩個人跟你一起去，合作單位那邊的重要人員都接受了我們給予的任務與津貼，你會得到適當的協助。」就這樣我前往安平，度過了四年愉快的年輕歲月。

安平夢的開始

這時期，我也在臺大兼職，教了兩門課：農用藥劑和農藥化學。週五下班後坐夜車到臺北車站，隔天早上轉乘計程車趕到臺大，講課三小時後，再乘車回南部。那時候師父陳玉麟教授休假兩年，赴加州大學 Berkeley 進修，徒弟就要代班，不負師徒一場的情義。師父是經過臺北帝國大學時代的師祖山本亮推薦，去美國農藥學界泰斗 John J. Casida 的研究室充電，繼續研究他最擅長的除蟲菊精的改良工作。

1960 年代的安平海濱，空氣清新，山明水秀，魚躍清波（圖 2），那裡有荷蘭人建造的安平古堡，有沈葆楨建造的二鯤鯓礮臺（億載金城），還有安平港口的燈塔。在水產試驗所南側，也有一座太子間，這座白色的日式建築，當年在一日之間，拔地而起，是日本皇太子（後來的昭和天皇）研究海洋生物學的地方。



圖 2：收穫虱目魚現場，高山清，池水藍，虱目魚飛躍出水。

在 1960 年代，太子間的周邊環繞著一棟小圖書館、十幾口兩公尺直徑的圓形水泥池、十來個十公尺見方的水泥池、一座溫室、以及數個一甲地以下的小型試驗池。當然還有五十公頃的政府魚塢以及一千公頃左右的的民間魚塢。

安平港自荷蘭人開埠以來就和世界通商，輸出了臺灣茶葉、樟腦與赤糖。許多外商在安平生活，與當地人一起工作，自然發生了跨越種族和文化的淒美愛情故事。在 1930 年代，臺灣本土音樂開始蓬勃發展，在地作曲家許石譜出了著名的「安平追想曲」，並由陳達儒填詞，以臺語描述混血少女期盼遠渡重洋的情郎回歸安平港，哀愁的思念心緒，溢於言表，傳唱至今。開頭的歌詞描寫了港邊的少女：「身穿花紅長洋裝，風吹金髮思情郎…」

增產虱目魚與鹹水試驗場地

我在安平魚塢的任務是增產虱目魚，來充實膳食中的動物性蛋白質。我使用農藥來重組魚塢內各種動物的數量，用選擇性農藥清除了魚塢中的昆蟲和下雜魚，防止它們搶奪虱目魚的飼料。虱目魚獨享底藻飼料後，產量倍增。結果，養殖漁民和洛氏基金會感到高興，氰胺農藥公司更熱心支持後續的研究工作，慷慨贊助測定農藥在魚體殘留量的工作，以保障海鮮食品的安全。

我在二鯤鯓可以動用廣大的鹹水試驗場地，西起安平燈塔，經過舊礮臺和水產試驗所，東達邱連生管理的道東塹，也包括南方接鄰的協安塹（臺南首富侯雨利的家產），由西向東綿延三公里（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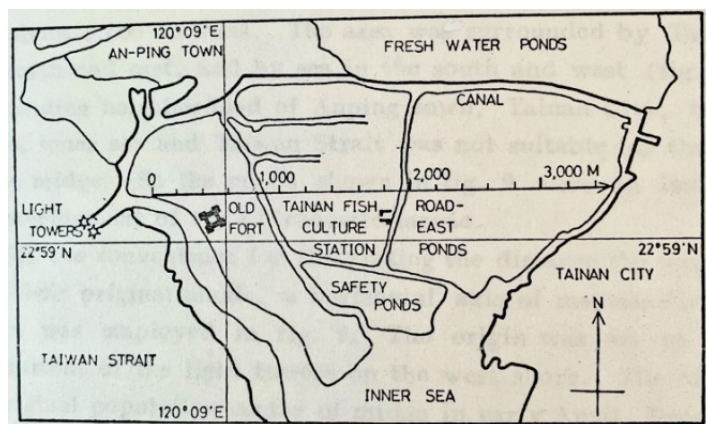


圖 3：安平虱目魚塹分佈圖
由西向東綿延三公里，包括：燈塔，舊礮臺，水產試驗所，道東塹，與協安塹。

在安平，我也有合作的散戶，像鯤鯓的張老山和安平的許考，他們凡事親力親為。當年臺南市長的家族也在這片土地上擁有魚塹，可惜沒有加入我的合作夥伴群。當時，蘇南成市長就有抽沙填池造陸的想法。

在臺南安平試驗區之外，水產試驗所在七股海埔新生地也有五十公頃左右的魚塹。岡山的林英國省議員也是跟我合作的一家魚塹大戶。同事廖一久院士建議我要與林議員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因為他能夠在省議會替水產試驗所發聲。總計我可以使用的魚塹有三百公頃左右，足夠進行大規模的田間試驗。

自創機車手工噴霧

夏日，魚塹堤岸上有成千上萬的草蚊擠滿青草地，一旦有人靠近堤岸，草蚊群飛，鋪天蓋地迎面襲來，甚至鑽入耳朵、眼睛和鼻孔，讓人寸步難行。還有那些躲在水底的幼蟲，跟虱目魚爭食底藻，讓虱目魚欠缺食物，降低產量。

魚塹之間的堤岸非常狹窄難行，某次臺灣氰胺公司的經理游仲雄來訪，我騎著光陽小機車載他巡視魚塹現場。一路緩慢前行，繞行一大圈之後，回到辦公室，游經理建議以後不必再前往田間視察。在狹窄的堤岸行車，實在令人緊張。

當時，我在小巧的光陽機車上，以手工裝上了汽油動力噴霧設備，這樣就可以在堤岸上騎車前行，有效地將農藥噴灑到草地上，消除草蚊（圖 4）。



圖 4：從機車上噴灑農藥，清除堤岸上的草蚊

如果堤岸太窄不能開機車噴藥除蟲，就要撐竹筏從水面上把殺蟲劑往上噴灑到堤岸的草地上，消除草蚊。我們選擇使用

對魚毒性低了6倍的進口貨DDD替代國產貨DDT殺蟲劑。

雖然 Lindane（靈丹，致死中量LC50 1.29 ppm）對魚毒性比DDT低了 184 倍，相對安全，但是並不耐用。我使用了臺糖農化廠的Lindane，噴在草地上面除蟲，結果在一週之內，Lindane 就消失無蹤。原來Lindane的揮發性強大（蒸氣壓 0.00042 mmHg），是DDD的 30 倍，DDT 的 280 倍。在安平炎熱的夏天，Lindane 迅速從草葉蒸發，散入空中。

記趣一二

安平海濱有一座古蹟「億載金城」，它是清朝沈葆楨建造的防禦工事，使用了從安平古堡回收的磚頭。城門上跨越護城河的活動木橋已改裝成固定的水泥橋。城內本來有一座小型的馬雅式金字塔，應該是守護城門的防禦設施。近年，金字塔已被夷平，變成遊客休息的青草地。

二鯤鯓礮臺的大門上方刻有建造人沈葆楨手題的「億載金城」四個大字。他是清廷名臣林則徐的女婿。林則徐的孫輩林紹文博士，當年任職聯合國糧農組織，長駐泰國，常常訪問臺南和東港兩個水產試驗分所。他喜歡替年輕同事證婚，戲稱自己是牽紅線專家，像徵著熟蝦長長的紅色觸鬚。

停止DDT生產的決策

臺灣在 1969 年左右停止生產DDT殺蟲劑，這是經濟部植物保護審核委員會作

出的決定。這個議案由農復會洪維懷技正提出，說明美國希望臺灣也禁用DDT。會場上，臺灣農藥公會理事長陳松前輩反對這個提案，他說DDT影響白頭鷹繁殖後代，所以美國要禁用DDT來保護他們的國鳥，臺灣無須跟進。臺灣需要長效性的DDT來防治水稻害蟲，保障稻米豐收。

那時我剛好參與會議，說服了大會通過了好必定（Abate）殺蟲劑的註冊案，用來防治虱目魚塢的紅筋蟲。我站在水產界的立場，贊成禁用DDT，因為農田的DDT流入河海之後，不但殺死魚蝦，而且還會污染魚貨，影響消費者的健康。

那一場會議由我的業師陳玉麟教授主持，他也是委員會中綜合組的組長，他說有充足的證據，證明DDT殺死魚蝦，裁定停止生產DDT。還好兩條生產線都是公營事業，容易處理。一條是在高雄的國營臺糖農化廠，另一條是在霧峰的國民黨營興農廠。至於庫存的DDT則由經濟部轉移到衛生處保存，以備遇到衛生健康危機時，緊急使用。

草蚊與紅筋蟲的防治法

除了陸上草蚊大軍，水下也擠滿草蚊的幼蟲，顏色血紅，外殼堅韌，俗稱紅筋蟲。它們躲在覆蓋著底泥的一層藍綠藻裡面，全面佔領魚塢藻床，和虱目魚爭食底藻。由於DDD不可以直接灑入池水，它會長期毒害並污染池魚。所以，要消除幼

蟲，需要使用安全的短效性有機磷殺蟲劑，注入水底消除幼蟲。

我打造了一條 30 呎長的塑膠注藥管，在管底下面，鑽了 30 個注藥孔，打橫固定在竹筏上，用一部汽油發動機帶動 pump，把稀釋後的殺蟲劑加壓噴射到水底，消除幼蟲。只須一人撐篙操控竹筏，就可以輕易施藥（圖 5）。



圖 5：從竹筏上噴灑殺蟲劑到水底，消除紅筋蟲

我使用了三十多口公家和私人的魚塢，進行好必定殺蟲劑的田間試驗，一共二百多甲。在大部份魚塢內，使用高藥量除蟲，以確保防治效果，維持虱目魚的最高產量。少數公家的試驗池，可以使用各種不同藥量，觀察不同的防治效果，以明瞭藥量和效果之間的關係，確立最適當的農藥使用量。

好必定的適當使用量，必須有效除蟲，但不傷害虱目魚，更要乾淨安全，不污染虱目魚魚肉。好必定在一年內，連續施用了七次之後，檢驗收獲的虱目魚體內的農藥殘留量，發現魚肉只殘留 0.02 PPM

的好必定，比 WHO 設定的容許量（1 PPM）低了 50 倍，不會影響消費者的健康。

臺美合作與研究成果

好必定在魚體殘留量的試驗，是我離臺赴美之後，由美國氰胺公司總部發起補辦的，我一直不知情。直到 1978 年我要投稿美國水產學會的會誌之前，把草稿寄給美國氰胺過目，氰胺公司主動把殘留量的分析結果加入我的草稿內。

投稿時，我在論文內只感謝了美國氰胺公司支持殘留量的試驗，並不知道其他人員的投入。雖然 1970 年我剛到來到美國時，氰胺公司就邀請我去新澤西總部訪問，我一時事忙，未能應邀前往會面。直到四十八年後，我在加州和臺灣氰胺的前經理游仲雄重逢，才知道師父陳玉麟教授和水試所的老同事們參與了殘留量試驗，執行施藥和採集虱目魚樣品的作業。最後，樣品從台灣送到英國完成化學分析。我後知後覺，未能在論文中感謝師長和同事，是美中不足的一個遺憾。

美國氰胺公司早在 1969 年就從我的報告中知道好必定可以安全地消除 copepod 水蚤。好必定防治紅筋蟲的中文報告於 1969 年底發表在農復會內部刊物（JCRR fisheries series, No 8, pp118-122.），1978 年，我再把英文版發表在《美國水產協會會誌》（*Tran. Am. Fish. Soc.* 107 [3] 493-499）。這應該是第一篇發表在該

會誌的臺灣論文。我報告了好必定對魚塢內 copepods（橈腳類水蚤）的毒性和有效防治這種水蚤的藥量。

當亞城的 Carter Center（卡特中心）在 1983 年推動了消滅非洲 Guinea worm disease（龍線蟲病）計劃時，氰胺公司就捐贈好必定殺蟲劑，用來清除疫區水源地的水蚤。失去了水蚤這個中間寄主後，水源中的龍線蟲數量大幅減少。杜邦公司也捐贈細密的尼龍布，協助卡特中心，把殘留在水裡的水蚤和細小的幼年龍線蟲過濾掉，讓池水變成了無蟲的安全飲水。小學生不再感染龍線蟲病，能夠走路去上學。後來，卡特前總統和夫人去非洲訪問時，學生夾道歡迎，高舉著「No Worm」的標語。感謝前總統解除了他們嚴重的腳病，得以重返校園。

世界衛生組織 WHO 也在 1986 年啟動消滅龍線蟲計劃，強力動員，深入基層推廣卡特中心的技術。30 年來，已經消滅了 99% 的龍線蟲病。

殺蟲劑的試驗與應用

我在安平四年，測試了將近一百種農藥，尋求防治紅筋蟲最安全有效的藥物。除了好必定之外，福賜滅（Phosvel, leptophos）也受到詳細的檢驗，發現它特別有效。各國農藥公司很樂意提供農藥樣品給我測試。尤其是 1968 年，聯合報的一名記者（邱鎮容？）為了慶祝光輝十月，他耐心寫了一篇長文，介紹我的化學

防蟲工作。他和我斷斷續續地聯絡了半年之久，完成那篇報導。經過這個免費廣告，我源源不斷地收到各國農藥廠商的樣品。

使用福賜滅來防治紅筋蟲比好必定更加有效。增加藥量後，又可以安全有效地殺死下雜魚（rough fish 如：吳郭魚），一箭雙雕，因此，在日本的總經銷建議我投稿「日本應用動物昆蟲會誌」。可是他們後來發現此議不可行，原來福賜滅是根據它對金魚的較低毒性在日本註冊販賣，如果我發表了它對吳郭魚的高度毒性，恐怕會影響他們當時在日本合法販賣福賜滅的權益。

1978 年，我準備投稿美國水產協會的會誌，報導臺灣使用好必定和福賜滅來消除魚塢中的紅筋蟲和吳郭魚，讓虱目魚獨享充足的底藻飼料，產量倍增（圖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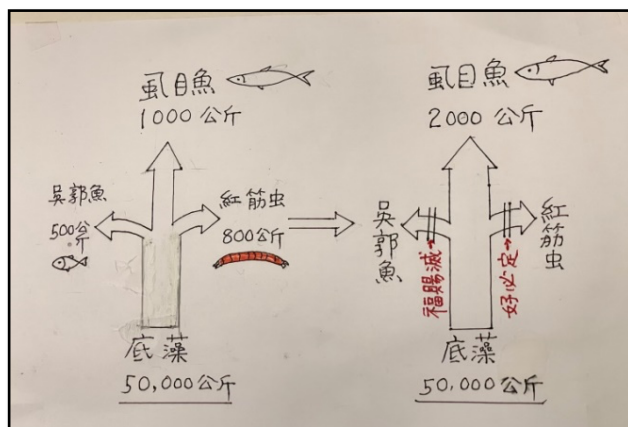


圖 6：農藥消除了下雜魚和昆蟲，增產虱目魚

我在投稿前送草稿給美國氰胺公司過目，徵求意見，他們建議我刪除福賜滅的

部份，因為福賜滅工廠發生了嚴重的工人中毒事故，並登上了美國報紙的頭條新聞，氰胺公司擔心把好必定和福賜滅放在同一篇論文中，讀者可能誤認好必定和福賜滅有關連，影響商譽。我依囑刪除有關福賜滅的部份，只發表了好必定的內容。事實上，福賜滅從來沒有取得美國的內銷許可，美國也在 1981 年取銷了它的外銷許可。

1970 年夏天，我剛剛來到美國留學時，福賜滅製造商邀請我到芝加哥總部演講。我指出該農藥有效，但需防止消費者誤食病魚。後來，出乎意料，福賜滅因為工地安全事故停產，臺灣的分裝廠也隨之歇業。

跨越海洋的國際經歷

我在安平魚塢工作四年，以農藥消除害蟲，保留足夠底藻給虱目魚食用，讓虱目魚產量增加一倍，完成了階段性任務。下一個工作目標是開發海水魚塢的施肥技術，培養底藻，充實飼料，期望更進一步提高虱目魚產量。計劃主持人林書顏教授告訴我，農復會秘書長蔣彥士已經同意使用我們自己的資金來進行這項工作。漁業組陳同白組長也請我接任分所長，前任分所長連俊國已經離職，去聯合國糧農組織工作了。

就在我準備迎接下一個任務時，即將加入糧農組織的 Ziad H. Shehadeh 來臺考查養殖漁業，他推薦我去威士康辛大學

Madison 攻讀博士學位。於是，我選擇赴美留學，不捨地離開了安平海濱和友人。

從威士康辛大學畢業後，我在加州大學及橡樹嶺國家實驗室任職，並一直與我的老東家保持聯繫。在我畢業前，我的副科指導教授、魚類學家 John J. Magnuson 要前往夏威夷州召開臺美漁業會議，他表示要幫我尋找在臺灣的工作機會，並告訴我兩位臺灣領隊的姓名。我告訴教授：中研院的蘇仲卿教授是我的老師，農復會的陳同白組長是我的老闆。於是，我傻傻地去大學書店買了兩件笨重的陶瓷禮物，請教授遠途帶去夏威夷，轉交給兩位師長跨海帶回臺灣。其實，我應該選擇輕巧的小禮物才適宜。

漁業組的前輩，在我赴美留學後，根據我的書面報告（Aquiculture, Vol. 1, No. 1, pp. 9-30, 1970），在七股海埔新生地的魚塢越冬溝上面增設禦寒設施，加蓋了透明塑膠皮的屋頂來保溫，防止魚苗被寒流凍死。漁業組袁柏偉技正（後來擔任農委會漁業處長）也曾經專程到加州大學來看我，並且在 1979 年 11 月增開的國建會期間，一路陪同我拜訪了全臺灣漁業界的主要機構和領導人士。

1979 年初，美國斷絕和臺灣的外交關係，美軍撤離臺灣；蘇聯艦隊則南下越南的金蘭灣，臺灣情勢緊張。行政院特別在年底加開一次國建會，討論應變之道。農復會（斷交後改組為農發會）負責供應軍民糧食，要設法維持糧食自給自足，萬

一臺灣被封鎖，才能固守待變。除了農民種稻，臺糖種黃豆之外，水產養殖業界要生產魚貨，充實蛋白食物的來源。漁業小組會議討論了生產魚貨的工作計劃，我擔任了海外的共同主席，國內的共同主席是國立臺灣海洋學院的謝君韜校長，一同主持小組會議。這次國建會是最後一次替老東家農復會漁業組所做的工作，也是我和 CAPASUS 結緣的源頭。袁柏偉先輩在會後告訴我，我的「人二」（安全）資料檔案已經從水產試驗所轉移到農發會存檔保管，以待不時之需。

展望

回顧一甲子的前塵往事，見證了臺灣從貧乏走向富足的漫長旅程，滿心歡喜。

如今，大家豐衣足食，不必再為了溫飽，想方設法，去增產虱目魚貨，內心滿是安慰。

從明鄭開始四百年來，安平虱目魚塢的國姓魚一直滋養著一方人民，如今，魚塢已完成它的歷史使命，功成身退，並且順應潮流，化身成為繁華的商圈。今年春節還有象徵光明前景的璀璨燈光秀，輝映在這一片新生土地的上空（圖 7）。當年「大頭仔市長」蘇南成抽沙填池造陸的美夢，終於真實地展現在眼前。安平加油！臺南加油！臺灣加油！



圖 7：昔日安平的虱目魚塢，今日變身成為繁華商圈。
這張 2024 年春節在安平二鯤鯓的燈光秀，璨爛輝煌

有夢最美，築夢踏實—改變孕產婦和兒童健康

張靜宜 (Fashionqueen Jeani)

退而不休的 Epidemiologist，愛時尚，愛美食，愛旅行的 Fashionqueen

遇見了貴人

自從開始攻讀公衛碩士學位以來後，我心裡的夢想工作便是加入美國聯邦政府的疾管中心 (CDC) 從事研究。然而，在碩士畢業後，我結了婚，並因為先生陳英偉醫生的工作，我們遷移到了 KY 州。兩年後，我們迎來了一對雙胞胎兒子。我的生活變化迅速，但我從未放棄做研究的夢想。

當小孩大約一歲左右，雖然我離 CDC 非常的遙遠，但還是在 Louisville 的 VA 醫院找了一份負責 phase III 臨床試驗的工作。雖然只是兼職，但我做得非常的開心。隨著先生完成四年的住院醫師，他決定再做一年的角膜專科培訓，我們因此又搬到了德州，當先生專科訓練即將結束時，我們討論了未來的定居計劃。此時，我非常的興奮告知先生我想在美國聯邦政府的 CDC 尋找工作，而亞特蘭大正是 CDC 總部，正好我的弟弟張宏安醫生和父母也在亞特蘭大。先生同意如果我申請到 CDC 的工作，我們就搬到亞特蘭大，他會配合我在那裡開業。

我的心情又興奮又緊張，既期待能夠在 CDC 工作，但也聽說 CDC 的工作競爭激烈，不易申請。我認真地撰寫了 CV，申請表也填寫好，並寄出申請。心中默默祈禱，隨緣而行，就聽天由命吧！大約三星期過後，我接到一通電話，邀請我去亞特蘭大 CDC 面試。面試我的女士，Lisa K 是我生命中的貴人。她當時正在亞特蘭大市中心開會，便約



2004 年得到月度最佳員工獎

我在一家餐廳碰面，我們邊吃飯邊聊天，順利完成了面試。就這樣，我順利地進入了 CDC 從事公共衛生科學研究工作（epidemiologist）。

CDC 職業生涯的開始

自從進入 CDC 的第一天開始，我便在生殖健康部門（Division of Reproductive Health or DRH）工作，直到退休。在 DRH，我有幸參與了多個全國性的監測系統（National Surveillance System）。眾所周知，美國聯邦的 CDC 研究大多依賴全國性的數據，無論研究題目為何，都能得到充足的大數據支持。

在這 22 年來，我負責了多個全國偵測系統，包括孕產婦死亡監測系統（PMSS）、墮胎監測系統，和輔助生殖技術監測系統（NASS）。由於墮胎檢測系統是相對敏感的話題，所以此處我將介紹另外兩個偵測系統（PMSS & NASS），並分享一些具有代表性及影響力的論文。

我對 CDC 的第一個重大貢獻

大多數關於孕產婦死亡原因的研究，都集中在臨床因素或併發症上。在如此先進的美國，照理說不應該有高的孕產婦死亡率，但是每年發表的文章顯示，死亡率與種族及年齡有很大的關聯，譬如，黑人女性的死亡率比白人女性高出三到四倍，而 35 歲以上的高齡產婦的死亡率也顯著高於 35 歲以下的女性。有趣的是，在死亡證明書上除了臨床死亡原因外，還包括自殺或他殺（謀殺）。以前從未有人研究或探討過有多少孕婦死亡是由於謀殺或自殺引起的。因此，我和幾位資深的同事們決定研究非生產相關的死亡原因，特別是針對謀殺來做研究。

這篇文章研究了 1991 年至 1999 年間美國孕產婦被謀殺的情況，使用了孕產婦死亡監測系統（PMSS）的數據。PMSS 收集了與出生或死胎證書相關聯的死亡證書數據，以識別孕產婦死亡，包括謀殺。主要發現包括：

1. 謀殺是孕產婦和產後期間的重要傷害死亡原因。在所有 15 至 44 歲的女性中，謀殺是第三大造成傷害死亡的原因，僅次於交通事故和自殺，在 15 至 24 歲的黑人女性中，謀殺是第二大傷害死亡原因。
2. 人口統計差異：與白人女性相比，黑人女性的孕產婦謀殺率顯著更高。黑人女性的謀殺率（每 10 萬活產）約為 6.4，是白人女性（每 10 萬活產 0.9）的七倍左右。
3. 時間分佈：超過一半（52.7%）的孕產婦謀殺發生在產後期間，尤其是在生產活嬰或死胎後的前三個月內。

4. 風險因素：年輕女性，特別是 20 歲以下的女性和黑人女性，面臨著更高的孕產婦謀殺風險。隨著年齡增長，風險降低，但黑人女性在所有年齡段的謀殺率仍顯著高於白人女性。
5. 產前護理和婚姻狀況：雖然許多受害者已開始產前護理（49%在第一孕期），但未接受任何產前護理的人謀殺率顯著更高。婚姻狀況也影響風險，黑人已婚女性的謀殺率高於白人已婚女性。
6. 謀殺機制和背景：槍支是孕產婦謀殺的主要方式（56.6%），其次是刺傷和勒頸。研究指出，親密伴侶暴力可能是一個重要因素。

總體而言，這項研究強調了針對性干預和改進監測的緊迫性，以應對年輕和黑人女性等易受傷害人群孕產婦謀殺率驚人的現實。

為了報導這篇文章，我生平以來第一次參加聯邦政府媒體中心的訓練，學習如何在被採訪時應對問題。正如 CDC 的預測，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引起了全世界媒體的關注，包括美國所有的主要媒體如 CNN、Washington Post、NBC、英國的 BBC，及中東國家的 Aljazeera。甚至臺灣的新聞也報導了這篇文章，我實在太開心了。

CDC 的媒體中心還特別替我收集了這些報導讓我展示給父母看，但他們把我的英文名字翻譯成了張珍妮，所以我的父母起初不知道是我寫的，後來我告訴了他們。更讓我驚訝的是 Good Morning America 也打電話到 CDC 媒體中心，想要採訪我，甚至邀請我乘坐他們的私人飛機到紐約的工作室，還有 Oprah 的脫口秀節目也邀請我參加。但是 CDC 的媒體中心會嚴格過濾這些邀請，了解他們的問題後才會讓我們接受採訪。最終，他們認為不適合，因此所有邀請都被拒絕了。

NASS—胚胎植入前遺傳診斷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PGD]的有效性

PGD 是一種在體外受精（IVF）過程中用來識別卵子或胚胎中基因或染色體異常的技術，最初於 1980 年代末引入。其主要目的是幫助避免因遺傳疾病而終止妊娠，隨著技術的進步，PGD 的應用範圍不斷擴大，包括亨廷頓舞蹈症、血友病和囊性纖維化（Cystic Fibrosis）等。研究還表明，PGD 可能有助於選擇優質胚胎，提高不孕夫婦懷孕並生育健康嬰兒的機會，尤其是對於高齡女性或之前試管嬰兒失敗或反覆流產的情況。

當初我進行這項研究的動機，是因為我知道 PGD 篩查存在很多爭議，並且在其他國家這個程序不一定合法，特別是當該技術用在於性別篩選時。此外，我們都知道亞洲文化中對男孩比女孩有性別偏好，儘管臺灣不允許進行性別選擇的 PGD，但美國允許為了家

庭平衡的目的，進行性別選擇的 PGD。我想知道，如果提供 PGD 給準父母用來識別可能的基因缺陷或染色體異常，父母會選擇進行診斷嗎？如果他們發現可能存在基因異常，他們會還會進行植入胚胎嗎？

我的論文報告是第一個使用全國數據來評估 PGD 和相關妊娠結果的研究，這些數據涵蓋了美國幾乎所有的輔助生殖技術（ART）週期。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評估在試管嬰兒（IVF）週期中使用 PGD 的特點，並比較使用 PGD 和未使用 PGD 的治療結果，特別是流產和活產情況。研究數據來自美國國家 ART 監測系統（NASS）2011 至 2012 年的數據。主要結果如下：

1. 總共有 97,069 個未使用 PGD 的週期和 9,833 個使用 PGD 的週期，其中 55.6% 用於異倍體篩查（PGD-Aneuploidy），29.1% 用於其他原因（PGD-Other），15.3% 用於遺傳測試（PGD-Genetic）。在週期中 PGD 用於其他原因，僅 2%（68）提供有關使用 PGD 原因的更多資訊，其中主要包括 63 個性別選擇。
2. 治療結果顯示，年齡小於 35 歲女性中，PGD 未顯示出顯著增加臨床妊娠或活產率。與未使用 PGD 的週期相比，PGD-Aneuploidy 週期在 35-37 歲女性中顯示出較低的流產風險（調整後比值比 aOR 0.62），但臨床妊娠和活產率無顯著增加。以及 37 歲以上女性中顯示出更高的臨床妊娠機率（aOR 1.18）、活產率增加（aOR 1.43），和多胞胎活產率（aOR 1.98），以及流產風險降低（aOR 0.55）。

結論：PGD-Aneuploidy 是最常見的 PGD 使用原因；PGD 對於 35 歲以下女性的臨床妊娠或活產率無顯著提升，但對於 35 歲以上女性，特別是進行異倍體篩查的，顯示出降低流產風險並增加活產和多胎分娩的可能性。這項研究提供了有關 PGD 使用的廣泛數據，有助於理解其在不同年齡段女性中的效果，尤其是在提高高齡女性的妊娠和活產機會方面的潛力。

我的博士論文

隨著輔助生殖技術（ART）變得越來越普及並更易於公眾獲取，我對嬰兒的安全性，特別是在分娩期間的安全性感興趣。因此，我選擇了這個題目來寫我的博士論文。這項研究旨在比較使用輔助生殖技術（ART）和未使用輔助生殖技術（non-ART）之間的圍產期死亡率的趨勢和特徵，並評估兩者之間的關聯。



Gynecology 會議上發表的論文獲得獎金

研究使用了 SMART Collaborative 數據庫，該數據庫將 CDC 的國家 ART 監測系統（NASS）與三個州的標準化州級生命記錄（包括出生、胎死和嬰兒死亡證書）連接起來。這項回溯性隊列研究排除了使用代孕母親的週期和懷孕結果不明的懷孕，最終分析了 39,824 個 ART 出生和 2,263,633 個非 ART 出生的胎兒。

研究期間，共記錄到 570 例 ART 孕育的圍產期死亡和 25,158 例非 ART 孕育的圍產期死亡。數據顯示，在妊娠 28 週前，無論是單胎還是多胎，ART 懷孕的圍產期死亡率均低於非 ART 懷孕（調整後風險比為 0.46 和 0.64）。ART 懷孕在 <28 週早產情況下有顯著的保護作用，這可能與 ART 受孕的妊娠中胎兒和母體狀況的早期檢測和管理所上的差異有關。然而，從 28 週後，ART 和非 ART 懷孕的圍產期死亡風險沒有顯著差異。

研究還發現，大部分 ART 圍產期死亡發生在 35 歲以上的女性（41.7%），而非 ART 圍產期死亡則主要發生在 35 歲以下的女性（84.6%）。大部分 ART 圍產期死亡發生在非西班牙裔白人女性（70.9%），而非 ART 圍產期死亡則多見於其他種族/民族的女性（56.1%）。研究結論強調了在早期妊娠管理中的 ART 使用的潛在益處，這些結論為醫療提供者在諮詢考慮 ART 的患者時提供了重要依據，有助於他們了解和評估相關的治療風險。

告別 CDC

一轉眼，我生命中三分之一的時間都投入在 CDC 工作，隨著父母年紀漸長，兩位都 80 幾歲了，想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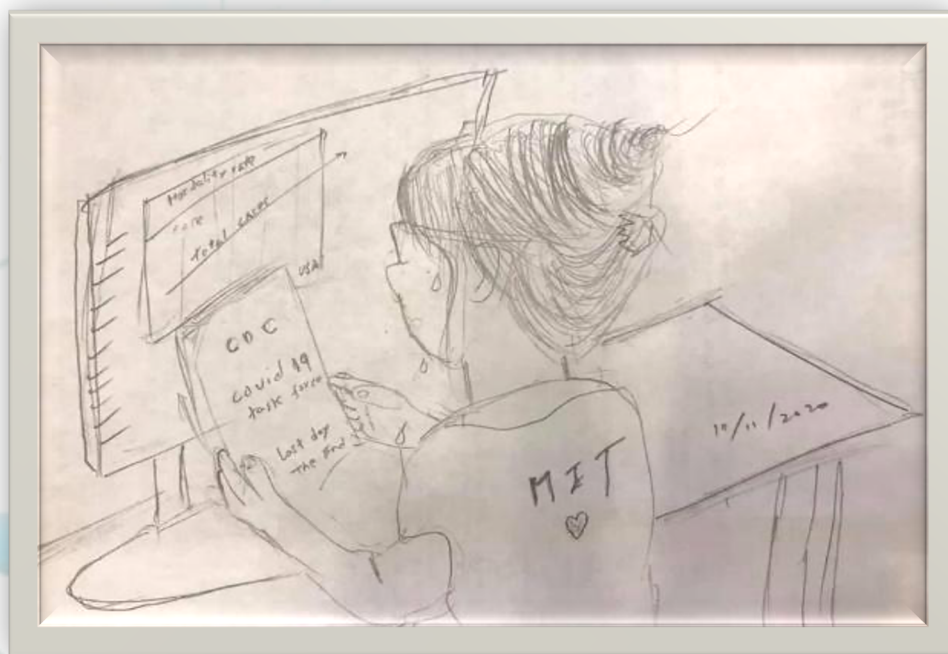


2021 年 CDC 榮退

也是該好好陪他們的時候了。我對於自己在 CDC 的生涯感到非常滿足，所以決定在完成 22 年的工作後退休。

這二十多年在 CDC 的工作給我帶來了寶貴的經驗和學習機會，我認識了許多好朋友，也經歷了許多艱難和挑戰的項目。作為聯邦政府的科學研究人員，每一篇發表的文章都必須經過嚴格的數據分析和驗證過程。有時候，一篇文章從投稿到通過 CDC 內部審查並最終在醫學期刊發表，可能需要一年到兩年的時間。這種嚴格的訓練使我在工作上變得格外謹慎和小心，甚至有時會被先生抱怨我太挑剔了，這也是職業病的影響。

雖然我的工作並非像一般流行疾病那麼的刺激，但我從中獲得了無比的滿足感和成就感。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論文，它們在公共衛生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有些甚至促成了政策的變化。另外，在 CDC 工作期間，我們都有機會參與 CDC emergency operation 的 response（緊急作業）。在 2020 年，我自願參與了 Covid 19 emergency response，雖然只有三個月，但這段經歷非常的艱苦，卻也完全值得。在這三個月中，我的主要工作是每天更新美國 CDC 準確的 Covid19 病例和死亡人數，每天早上醒來，我便開始進行數據分析，這些不僅僅是統計數字，它們代表了人們的生與死。在我 Emergency Response 工作的最後一天，先生 Willie 為我畫了一幅背影肖像，讓我記住我對這項重要公共衛生任務的貢獻。我深感榮幸能夠參與這項艱鉅而重要的工作，也感謝 CDC、感謝家人和朋友對我的支持！



2020 年，CDC Covid response 的最後一天，先生偷偷從我的背影畫出我專注工作的鉛筆素描

Blue Zones and the Lessons We can Learn from Them

Alice Stanley

More than 41 years of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as a special education classroom teacher, special education coordinator, early intervention specialist, and as Director of Georgia Parent Infant Network of Educational Services (GA PINES) under the Georg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TRODUCTION

Being able to live longer, healthier, and happier lives is everyone's wish and the focus of gerontology. Some gerontologists have noticed that there are certain geographic areas or villages where there are particularly high numbers of centenarians. Centenarians are people who live beyond the age of 100. Scientists Michel Poulain and Gianni Pes identified Sardinia, Italy as the region with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male centenarians. They used a blue pen on a map to mark this place. Dan Buettner, a National Geographic Fellow, began to use the term "blue zone" in 2004. He and other longevity researchers started identifying pockets around the world beyond Sardinia where people lived measurably better and longer. He approached National Geographic with the idea of researching longevity hotspots and met with Robert Kane, the director of Center on Ag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who introduced him to demographers and scientists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NIA) in Washington, D. C. He received a grant from the NIA and has made frequent trips to these blue zones since 2003. He formed Blue Zones LLC and started publications on this subject in 2008.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study he published in 2023, *The Blue Zones: Secrets for Living Longer* by National Geographic and *The Blue Zones, 9 Lessons for Living Longer from the People Who've Lived the Longest*, second edition, in 2012. The strategies listed in this article are verbatim from these two books.

Buettner identified 6 Blue Zones in his most recent research publication. These are:

- 1) Sardinia, Italy,
- 2) Nicoya, Costa Rica,
- 3) Loma Linda, California,
- 4) Ikaria, Greece,
- 5) Okinawa, Japan,
- 6) Singapore.



MISGUIDED THINKING ON LIVING LONGER AND HEALTHIER

Many people think that if they get on a diet regimen, join a gym, and take their vitamins, they could live healthier and longer lives. However, Buettner found that Americans spent more than 152 billion on vitamins and supplements, but the biggest and most dependable studies show that people who take supplements live shorter lives than people who do not. Since 1820, Americans developed the concept of exercise and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staying physically active people have about a 30 percent lower chance of dying in any given year than people who are not active. However, despite the 160 billion dollars spent per year on trying to exercise, only a fifth of all adults get the minimum recommended amount of vigorous activity. This means exercise is not working for more than 200 million Americans. Diets are a well-intentioned but colossally ineffective approach to staying healthy and living longer. Instead of looking into research data, researchers started to look for answers in the places and peoples that have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centenarians hoping to gain some knowledge for us to follow.

9 LESSONS FOR LIVING LONGER LEARNED FROM THE PEOPLE IN THE BLUE ZONES

Lesson one: Move Naturally: Be active without having to think about it. Centenarians in blue zones do not run races and/or participate in sports but they engage in regular low-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 often as part of their daily work routine. They are shepherds and gardeners or just daily walker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a moderate, sustained level of exercise yields better results in maintaining health and vitality. Rober Kane M.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on Aging and the Minnesota Geriatric Education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uggests exercising the core muscle groups at least twice a week. Balance is also important since falls are a common cause of injuries and death among seniors. In the U.S.A., about one in three adults over age 65 falls each year. Exercise such as yoga, if done properly, can help increase balance and joint flexibility. In summary, low-intensity activity satisfies all the above, while going easy on the knees and hips. For lesson one, the strategies are:

- a) Inconvenience yourself by using the stairs rather than elevators and parking your car further from your destination so you must walk.
- b) Have fun and keep moving.
- c) Walk and plan to walk with people.
- d) Plant a garden.
- e) Enroll in a yoga class or similar low-intensity exercise group such as a Tai Chi class.

Lesson Two: Hara Hachi bu: Painlessly cut calories by 20%. Okinawan elders often use the Confucian-inspired saying before eating i.e., Stop eating when their stomachs are 80 percent full. Their average daily intake is only about 1900 calories while Sardinians traditionally eat a similarly lean diet of about 2000 calories a day. This caloric restriction practice has been shown in laboratory animals to maintain heart health. People who do not live in the blue zones often use diet to reduce weight, but diet seldom yields long-term success. The secret of eating right can be best practiced

by emula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habits of the world's longest-lived people. Okinawan's elders know when to stop eating regardless of circumstance. Research by Brian Wansink,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shows food display and container size influence food intake. For lesson two, the strategies are:

- a) People who serve themselves at the counter before taking their plate to the table eat about 14 percent less than when they take smaller amounts and go back for seconds and thirds.
- b) Make food look bigger: People who make a quarter-pound hamburger look like a half-pounder with lettuce, tomatoes, and onions feel equally full after eating.
- c) Use small vessels: By just changing the size of the plates or bowls, you can eat significantly less.
- d) Make snacking a hassle- avoid tempting foods and put them where finding and eating them is more of a hassle or better yet choose healthy snacks.
- e) Buy smaller packages.
- f) Give yourself a daily reminder: Put a scale in the bathroom and weigh yourself daily to remind you not to overeat.
- g) Eat more slowly.
- h) Focus on Food: Watching TV or using the computer and eating at the same time will make you eat mindlessly. If you are going to eat, just eat.
- i) Have a seat: Do not eat and run. Making a habit of eating while sitting.
- j) Eat early: In the Blue Zones, the biggest meal of the day is typically eaten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day.

Lesson Three: Plant Slant: Avoid meat and processed foods. Most centenarians in Nicoya, Sardinia, and Okinawa never developed the habit of eating processed foods. Beans (legumes), whole grains, and garden vegetables are the cornerstones of all these longevity diets. Tofu is a daily feature in the Okinawan diet. Tofu is a uniquely perfect food, low in calories, high in protein, rich in minerals, devoid of cholesterol, eco-friendly, and complete in the amino acids necessary for human sustenance. All of which is not to say that people who live a long time do not eat meat: festive meals in Sardinia include lots of meat. Okinawans slaughter pigs during lunar New Year festivals. Nicoyans raise family pigs as well. The key is avoiding extremes. Some vegetarians take in more cholesterol through cheeses, milk, and various other products than they ever would take in eating meat at a modest level. Recent findings from Seventh-day Adventists show that those who ate nuts at least five times a week had a rate of heart disease that was half that of those who rarely ate nuts. For lesson three, the strategies are:

- a) Eat four to six vegetable servings daily.
- b) Limit intake of meat.
- c) Showcase fruits and vegetables.
- d) Load up on beans.
- e) Eat nuts every day.



- f) Stock nuts in your home and in your office, ideally in packages of two ounces or less.

Lesson Four: Grapes of life. Drink red wine in moderation. A daily drink or two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lower rates of heart disease, however alcohol use has also been shown to increase the risk of breast cancer. Red wine offers an extra bonus in that it contains artery scrubbing polyphenols that may help fight arteriosclerosis. If daily consumption of alcohol exceeds a glass or two, be aware of the toxic effect of alcohol on the liver, brain, and other organs along with the increased risk of accidents. Lesson four strategies are:

- a) Buy a case of high-quality red wine.
- b) Treat yourself to a “Happy Hour”: Set up yours to include a glass of wine, nuts as an appetizer, and a gathering of friends or time with a spouse.
- c) Take it easy: a serving or two per day of red wine is the most you need to drink so drink in moderation.

Lesson Five: Purpose Now. Take time to see the big picture. Okinawans call it *ikigai*, and Nicoyans call it *plan de vida*. Both mean “why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The strong sense of a purpose in life has a high correlation with longevity. Dr. Robert Butler and collaborators led an NIH-funded study and found that between ages of 65 to 92, individuals who expressed a clear goal in life lived longer and were sharper than those who did not. A sense of purpose may come from something as simple as seeing that children or grandchildren grow up well. Purpose can come from a job or a hobby. Learning a new thing such as a musical instrument or language can keep your brain sharp and a new purpose in life. The lesson five strategies are:

- a) Craft a personal mission statement.
- b) Find a partner to communicate your life purpose along with a plan for realizing it.
- c) Learn something new.

Lesson Six: Downshift. Take time to relieve stress. Sardinians pour into the streets at 5 p.m. to relax and socialize. People in Blue Zones routinely take a break to be with families and friends or just pause during their routine to stop and smell the roses so to speak. How does slowing down help you live longer? The answer may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chronic inflammation. Inflammation is the body’s reaction to stress. There is a widely accepted theor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onic inflammation and aging. Slowing down ties together so many of the other lessons—eating right, appreciating friends, finding time for spirituality, making family a priority, creating things, and bringing purpose. Lesson six strategies are:

- a) Reduce noise: minimizing the time spent with television, radio, and the internet can help reduce the amount of aural clutter in your life.
- b) Be early and plan to arrive 15 minutes early for every appointment so you can reduce stress.
- c) Meditate: create a space in your home to meditate.

Lesson Seven: Belong. Participate in a spiritual community. Healthy centenarians everywhere have faith. The Sardinians and Nicoyans are mostly Catholic. Okinawans have a blended religion that stresses ancestor worship. Loma Linda centenarians are Seventh-day Adventists. Ikarians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Greek Orthodox. They all belong to strong religious communitie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ttending religious services even as infrequently as once a month may influence how long a person lives. The lesson seven strategies are:

- a) Be more involved. Taking a more active role in a religious organization and getting involved in activities like singing in the choir or volunteering might enhance well-being and reduce mortality.
- b) Explore a new tradition: If you do not have a particular religious faith, commit to trying a new faith community that promotes an ethical way of living.
- c) Just go. Schedule an hour a week for the next eight weeks to attend a religious service. Do not think about it and just go with an open mind. Studies show that people who get involved with the services (singing hymns, participating in prayers or liturgy, volunteering) may find their well-being enhanced.

Lesson Eight: Loved Ones First. Make family a priority. Okinawans over 70 still begin the day by honoring their ancestors' memories. By the time centenarians become centenarians, their lifelong devotion has produced returns: their children reciprocate their love and care. Social connectedness is ingrained into the world's Blue Zones. Even a lack of spouse or significant other would be compensated for by other forms of connection. Lesson eight strategies are:

- a) Get closer: create an environment of togetherness.
- b) Establish rituals: Children thrive on rituals, and they enjoy repetition. Have a meal or visit grandparents and make a point to purposefully celebrate holidays.
- c) Create a family shrine: Get a wall display of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The family shrine serves as a constant reminder that we are not islands but connected to something bigger.
- d) Put family first: Invest your time and energy in your spouse, your children, and your parents.

Lesson Nine: Right Tribe. Be surrounded by those who share Blue Zone values. Social connectedness is ingrained into the world's Blue Zones. Professor Lisa Berkman of Harvard University has investigated social connectedness and longevity and found that higher social connectedness led to greater longevity. The lesson nine strategies are:

- a) Identify your inner circle: Know the people who reinforce the right habits, people who understand or live by Blue Zone secrets.
- b) Be likable: Likable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a social network, frequent visitors, and de facto caregivers. They experience less stress and live purposeful lives.
- c) Create time together: spend time with members of your inner circle. Building a strong friendship requires some effort, but it is an investment that can pay back handsomely down the road.

CONCLUSION:

The choice is up to us. Dan Buettner wrote in concluding his findings, “ To me, they (centenarians he met during this research but passed away before the publishing of the book) offered a lesson about decline. I know that our bones will soften, and our arteries will harden. We will slow down. And finally, our bodies will fail altogether, and we will die. How this decline unfolds is up to us. The calculus of aging offers us two options: We can live a shorter life with more years of disabilities, or we can live the longest possible life with the fewest bad years.”

THE STATE OF CHILDHOOD CANCER IN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H. Ho, MD, MSCI

Richard H. Ho, MD, MSC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ediatrics in the Division of Pediatric Hematology/Oncology at Monroe Carell Jr. Children's Hospital at Vanderbilt in Nashville, Tennessee. Dr. Ho's research is centered in cancer pharmacology with background knowledge in molecular pharmacology, clinical pharmacology and molecular biology. His main areas of research include 1) mechanisms by which drug transporters contribute to overall chemotherapy disposition in pediatric oncology and 2) pharmacogenomics in cancer therapy.

Dr. Ho was elected to the Society for Pediatric Research in 2010 and awarded a Presidential Early Career Award for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PECASE) from NIH and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 2013. This award, established in 1996, is the highest honor bestow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ir independent research careers and reflect the administration's priority " on producing outstanding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o advance the nation's goals, tackle grand challeng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American economy." He joined the faculty at Monroe Carell Jr. Children's Hospital at Vanderbilt in 2003 and is board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of Pediatrics in Pediatric Hematology-Oncology.

Overview of Childhood Cancer

Cancer, a complex group of diseases characterized by abnormal cell growth, affects individuals of all ages, including children. Childhood cancer, although relatively rare compared to adult cancers, poses unique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health. The types of cancers that develop in children are often different from the types that develop in adults. Unlike many cancers in adults, most childhood cancers are not strongly linked to lifestyle or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s. Only a small number of childhood cancers are caused by DNA (gene) changes that are passed from a parent to their child.

About 9,620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age of 15 will be diagnosed with cancer in 2024. Cancer incidence rates in children overall have stabilized since 2015, after increasing since at least 1975. Because of major treatment advances in recent decades, about 85% of children with cancer now live 5 years or more after being diagnosed with cancer. Overall, this is a huge increase since the mid-1970s, when the 5-year survival rate was about 58%. Still, survival rates can vary a great deal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cancer and other factors. After accidents, cancer is the second leading cause of death in children ages 1 to 14. About 1,040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5 are expected to die from cancer in 2024. The cancer death rate has declined by more than half from 1970 to 2021 in bot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largely due to improvements in treatment and high participation in clinical trials.

The most common cancers in children are:

- Leukemia
- Brain and spinal cord tumors
- Neuroblastoma
- Wilms tumor
- Lymphoma (including both Hodgkin and non-Hodgkin)
- Rhabdomyosarcoma
- Retinoblastoma
- Bone cancer (including osteosarcoma and Ewing sarcoma)

Other types of cancers are rare in children, but they do happen sometimes. In very rare cases, children may even develop cancers that are much more common in adults.

Risk Factors and Etiology

Understanding the risk factors and etiology of childhood cancer is essential for developing preventive strategies and targeted interventions. While the majority of childhood cancers occur sporadically, without a clear genetic predisposition, some are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genetic syndromes or familial cancer predisposition syndromes. For example, retinoblastoma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mutations in the RB1 gene, while Li-Fraumeni syndrome is characterized by mutations in the TP53 gene, predisposing individuals to various cancers, including childhood sarcomas and brain tumors.

Environmental exposures to carcinogens, such as ionizing radiation, certain chemicals, and pollutants, have also been implica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hood cancer. Maternal factors during pregnancy, such as maternal age, smoking,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exposure to infectious agents, may influence the risk of childhood cancer in offspring. However, the precis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se associations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and require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 adults, lifestyle-related risk factors, such as smoking, having excess body weight, not getting enough exercise, eating an unhealthy diet, and drinking alcohol play a major role in many types of cancer. But lifestyle factors usually take many years to influence cancer risk, and they are not thought to play much of a role in childhood cancers.

Many cancers in children are found early, either by a child's doctor or by parents or relatives. But cancers in children can be hard to recognize right away because early symptoms are often like those caused by much more common illnesses or injuries. Children often get sick or have bumps or bruises that might mask the early signs of cancer. Cancer in children is not common, but it's important to have your child checked by a doctor if they have unusual signs or symptoms that do not go away, such as:

- An unusual lump or swelling
- Unexplained paleness and loss of energy
- Easy bruising or bleeding
- An ongoing pain in one area of the body
- Limping
- Unexplained fever or illness that doesn't go away
- Frequent headaches, often with vomiting
- Sudden eye or vision changes
- Sudden unexplained weight loss

Most of these symptoms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be caused by something other than cancer, such as an injury or infection. Still, if your child has any of these symptoms, see a doctor so that the cause can be found and treated, if needed.

In recent years, scientists have learned a great deal about how certain changes in the DNA inside our cells can cause them to become cancer cells. DNA is the chemical that makes up our genes, which control nearly everything our cells do. We usually look like our parents because they are the source of our DNA. But DNA affects more than just how we look. It also influences our risks for developing certain diseases, including some kinds of cancer. Some genes control when our cells grow, divide into new cells, fix themselves, or die.

Cancers can be caused by DNA changes (mutations) that affect these kinds of genes. For example, a mutation might keep a gene that normally tells a cell to grow to be turned on all the time. This might lead to the cell growing out of control. But most childhood cancers are not caused by inherited DNA changes. They are the result of DNA changes that happen early in the child's life, sometimes even before birth. Every time a cell divides into 2 cells, it must make a copy of its DNA for the new cell. This process isn't perfect, and errors sometimes occur, especially when the cells are growing quickly. This kind of gene mutation can happen at any time in life and is called an acquired mutation. Acquired mutations are only in the person's cancer cells and will not be passed on to their children.

Sometimes the causes of gene changes in certain adult cancers are known (such as cancer-causing chemicals in cigarette smoke). But the causes of DNA changes in most childhood cancers are not known. Some may have outside causes like radiation exposure, and others may have causes that have not yet been found. But many are likely to be the result of random events that sometimes happen inside a cell, without having an outside cause.

Treatment Modalities

Treatment for childhood cancer is based mainly on the type and stage (extent) of the cancer. The main types of treatment used for childhood cancer are:

- Surgery
- Radiation therapy
- Chemotherapy

Some types of childhood cancers might be treated with high-dose chemo followed by a stem cell transplant. And newer types of treatment, such as targeted therapies and immunotherapy,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reating some types of childhood cancer.

With some exceptions, childhood cancers tend to respond better to certain treatments, such as chemotherapy, than cancers in adults. This might be because most childhood cancers tend to grow quickly (and chemotherapy works better against fast-growing cancers). Children's bodies are also usually better able to recover from higher doses of chemotherapy than are adults'

bodies. Using more intense treatments gives doctors a better chance of treating the cancer effectively, but it can also lead to more short- and long-term side effects.

Unlike chemotherapy, radiation therapy can often cause more serious side effects in children (especially very young children) than in adults, so its use sometimes needs to be limited. Doctors do their best to balance the need for intense treatment with the desire to limit side effects as much as possible.

Children with cancer and their families have special needs that can best be met at children's cancer centers. Treatment of childhood cancer in these centers is coordinated by a team of experts who kn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dult and childhood cancers, as well as the unique needs of children with cancer and their families. This team usually includes:

- **Pediatric oncologists:** doctors who use medicines to treat children with cancer
- **Pediatric surgeons:** doctors who perform surgery in children
- **Radiation oncologists:** doctors who use radiation to treat cancer
- **Pediatric oncology nurses:** nurses who specialize in caring for children with cancer
- **Nurse practitioners (NPs) and physician assistants (PAs):** nurses and other health professionals who are specially trained and licensed to practice medicine alongside doctors

The team can also include many other health professionals. Children's cancer centers have psychologists, social workers, child life specialists, nutritionists, rehabilitation and physical therapists, and educators who can support and care for the entire family.

Clinical Trials and Advancements

Today, most children with cancer are treated at specialized children's cancer centers. These centers are often members of the Children's Oncology Group (COG). Going to a hospital that specializes in treating childhood cancer helps ensure that a child gets the best available cancer treatment. These centers offer the most up-to-date treatment by conducting clinical trials (studies of promising new therapies). Children's cancer centers often have many clinical trials going on at any one time, and in fact most children treated at these centers take part in a clinical trial as part of their treatment.

Clinical trials are one way to get state-of-the-art cancer care for children with cancer. They may be the only way to get access to some newer treatments. They are also the best way for doctors to learn better methods to treat cancer.

During cancer treatment, most families are concerned mainly about the daily aspects of getting through treatment and beating the cancer. After treatment, the concerns tend to shift toward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cancer and its treatment, as well as about the cancer coming back. But it'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close follow-up care is a central part of this process that offers children the best chance for recovery and long-term survival. For many years after treatment,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children have regular follow-up exams with the cancer care team. As time goes by, the risk of the cancer coming back goes down. Doctor visits might be needed less often, but they are still important because some side effects of treatment might not show up until years later.

Because of major advances in treatment, more children treated for cancer now survive into adulthood. But treatments might affect children's health later in life, so watching for health effects as they get older has become more of a concern in recent years. The earlier any problems are recognized, the more likely they can be treated effectively. Childhood cancer survivors are at risk, to some degree, for several possible late and long-term effects of their cancer treatment. The risks for each child depend on a number of factors, such as the type of cancer, the specific cancer treatments used, the doses of cancer treatment, and the child's age at the time of treatment.

Some of the possible late effects of cancer treatment can include:

- Heart or lung problems (due to certain chemotherapy drugs or radiation therapy to the chest area)
- Slowed or delaye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bones or overall)
- Changes in sexual development and ability to have children
- Learning problems
- Increased risk of other cancers later in life

Advancements in childhood cance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have revolutionized the care of children with cancer, leading to improved survival rates and quality of life. Collaborative research efforts, such as the Children's Oncology Group (COG) and international consortia, have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standardized treatment protocols, multicenter clinical trials, and data sharing initiatives. Precision medicine approaches, including targeted therapies and immunotherapies, have emerged as promising strategies for treating refractory or relapsed childhood cancers.

- Furthermore, advances in supportive care have helped mitigate treatment-related morbiditie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well-being of children undergoing cancer treatment. However, challenges remain,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sistance to chemotherapy, the need for more effective targeted therapies, and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treatment on survivors. By fostering collaboration, innovation, and equity in pediatric oncology, we can strive towards a future where every child has the opportunity to thrive free from the burden of cancer.

《人生的縫隙》：如蝴蝶般破繭而出的臺灣血癌男孩

李維儀

美國喬治亞大學語言教育系博士候選人

紀錄片《人生的縫隙》簡介

《人生的縫隙》(2024) 該部臺灣紀錄片分別由《少年報導者》¹ 團隊策劃，導演林佑恩² 拍攝而成，《人生的縫隙》採用年輕血癌患者吳嘉源的視角，刻畫他如何從十七歲診斷罹患血癌以來，堅毅不拔地面對病魔。其中最受人關注的，莫過於他與強烈反對西醫治療的母親不斷地溝通協調的過程，其母護子心切，堅持認為西醫西藥是毒的論點，只希望兒子接受中醫療法，甚至對醫療團隊大舉興訟。當時還未成年，仍是法律上兒少身份的血癌男孩³，只能憑藉自身的生存意志與信念，通過政府機關、社工機構、醫療單位的協助，積極地與其母斡旋。所幸《民法》於 2023 年將成年的年齡下修到十八歲，吳嘉源才得以擺脫母親作為法定代理人的掣肘，捍衛他自身的醫療自主權。儘管三年來經歷化療多次失敗，CAR-T 療法⁴ 重燃起他的希望。CAR-T 療法試圖通過基因工程改造患者的 T 細胞，使其 T 細胞識別並消滅癌細胞；然而，該療法所費不貲，需要新臺幣一千萬元左右。但是，健保署已於 2023 年 11 月通過健保給付 CAR-T 療法，所以，吳嘉源在今年 2 月大學學測成績公佈後，已回醫院完成回輸治療，成為首批健保給付治療的患者。

¹ 《少年報導者》隸屬於臺灣非營利媒體《報導者》，所提供的新聞報導特別為十到十五歲的學生所寫。

² 林佑恩曾任攝影記者，目前為獨立影像工作者，其紀錄短片作品《度日》獲得第五十八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短片、第四十三屆金穗大獎。

³ 紀錄片裡的吳嘉源在十七歲時被確診患有血癌，十七歲時的他，在臺灣法律上被歸類為未成年和青少年。根據臺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指未滿 12 歲的人，少年指滿 12 歲但未滿 18 歲的人。根據臺灣《民法》，未成年指未滿 20 歲的人。然而，在臺灣的兒童保護和福利相關法規中，未滿 18 歲的人一般被視為兒童或青少年。

⁴ 關於 CAR-T 療法簡介，請參考該文〈認識抗血癌新利器，專家詳解 CAR-T 細胞治療〉：
<https://www.ecancer.org.tw/news/index/1/r627g>

為了幫助讀者進一步理解如吳嘉源等的臺灣青少年兒童癌症患者與病魔搏鬥的心路歷程，本文通過影像分析的角度解析《人生的縫隙》。本文選取紀錄片當中的公園場景和蝴蝶意象加以分析。

表達視覺障礙與內心迷茫的公園場景

在紀錄片《人生的縫隙》中，有一段觸動人心的公園場景。在公園裡，血癌復發導致左眼視力受損的吳嘉源，試圖尋找一隻黑貓。這段場景通過巧妙設計的視覺模擬和情感豐富的旁白，成功地刻畫了他在視力受損後面對生活的無奈與迷茫。



截圖一：吳嘉源在公園裡使用復古相機拍照。



截圖二：鏡頭模擬吳嘉源右眼視力受損後的視角環視公園。

血癌男孩在遍尋不著黑貓後，開始拿著一台復古相機拍照，試圖通過拍照的方式捕捉黑貓的身影，如截圖一所示。他的動作和表情展現他對拍照的專注和再遇到黑貓的期望；這種期望源於他懷念過去與小動物相伴、苦中作樂的時光。然而，在場景公園當天，他費勁功夫也找不到黑貓，失落之情在所難免；這種失落之情反映了他在面對病痛折磨之際，對美好事物無法掌控的無奈。

在吳嘉源開始在公園拍攝後，映入觀眾眼簾的是一系列模糊不清的影像，如截圖二所示。這些模糊和搖晃的影像，有如十里大霧瀰漫籠罩，讓人無法看清周遭一切。這一系列在公園拍攝的模糊搖晃影像，捕捉了血癌男孩在左眼受損後的視覺感受；公園原本該是個享受閒暇時光的地方，奈何對因血癌視力受損的他，卻阻礙重重。通過他在公園裡的模擬視覺感受，觀眾深刻體會到視力障礙帶來的不便和困惑。

這樣的模擬視覺感受更一步表達了吳嘉源的內心情感狀態。在模糊影像中，他遭灰白厚霧籠罩，暗指前途茫茫之感，也就是對當下生活和未來發展的不確定。影像的搖晃效果則影射他人生顛簸不已，人生前方的道路崎嶇不平。這種視覺和情感的交融，使得公園場景充滿了張力；通過情感共鳴，觀眾不自覺地感受到他內心對於病痛的無可奈何與對人生旅途的迷茫不已。這些感受不禁讓觀眾反思，遭受病痛折磨時，人們該如何保持對美好事物的渴望和對不確定未來的信心。

貫穿抗癌經歷的蝴蝶意象

紀錄片《人生的縫隙》中有三場蝴蝶場景，第一場和第三場蝴蝶場景出現在吳嘉源的病房天花板上，第二場則是發生在吳嘉源出院回校後，所遇到的真實蝴蝶。通過這三場蝴蝶意象的場景，紀錄片深刻表達了他對自由的嚮往與渴望，以及面對病痛復發的無奈與焦慮。

在第一場蝴蝶場景中，蝴蝶圖案出現在病房的天花板上，固定不動，如截圖三所示。反映了血癌男孩受病魔束縛壓迫，如同無法飛翔的天花板蝴蝶般失去自由。旁白以他的聲音道：「我的病床上是一隻蝴蝶，我好像每天都跟牠四目交接，牠是否跟我一樣被關在醫院？無法自由地飛呢？」自稱與天花板蝴蝶



截圖三：吳嘉源凝視他
病床天花板上的蝴蝶

「四目交接」的他，頗有託物言志之意，暗示他如蝴蝶般被迫困在醫院，無法像常人一樣享受自由生活。他以天花板蝴蝶間接自況深處牢籠之中，意味深長，讓觀眾感受到病痛對



截圖四：吳嘉源回到學校的第一天，一隻蝴蝶飛到他的身上。

當吳嘉源出院回到學校後，遇到了一隻真實的蝴蝶，這隻蝴蝶自由飛翔，甚至停在了他的身上，如截圖四所示。背景是學校的走廊，光線明亮，校園環境相對於病房來說，要自由、開放得太多了。兩相對比下，讓他回想起病房裡的蝴蝶，相較於病房天花板蝴蝶象徵的束縛與困境；學校的真蝴蝶就代表了他對自由的渴望和對未來的憧憬。在許多文化中，蝴蝶都具有重生和變化的意涵。血癌男孩盼望自己就像身上那隻蝴蝶，也能從毛毛蟲蛻變成功，可以從病房困境中破繭而出獲得重生。他深知唯有戰勝病魔，才能像學校蝴蝶那樣地自由飛翔，藉由學校蝴蝶的場景，觀眾體會到他對重生和未來的希望。

然而，造化弄人，回學校不久後，吳嘉源因為突然發高燒，只能再次住院，因此和病房的天花板蝴蝶重逢，如截圖五所示。通過旁白，他說：「今天是十二月的十二月八號，距離大學學測還有四十三天。」天花板蝴蝶再次出現，表示吳嘉源再次如天花板

患者的強烈束縛。蝴蝶也體現了生命的脆弱和短暫。在病房中，他每天望著天花板這隻固定不動的蝴蝶，他的病痛使他感受到自己遭病魔侵襲的脆弱生命，就好比蝴蝶的翅膀那麼纖薄，隨時可能折翼破亡。



截圖五：吳嘉源回校不久後，因高燒再次住院，重見病床天花板的蝴蝶。

蝴蝶般地被困在病房裡，失去了自由的空間，也無法像常人一般生活。天花板蝴蝶的再現，強化放大了他所經歷的苦楚感受，儘管身處絕境，他對大學指考仍然念茲在茲，惦記著大學指考的日期，這說明了他對未來上大學的期望和目標，也傳達了他對求生、求學永不放棄的精神。以上三場蝴蝶場景貫穿了治療過程，以此預示了血癌男孩最終在今年完成大學學測，就像即將破繭而出的蝴蝶，不久後就要回歸校園自由飛翔，追尋自由和理想。

結語

根據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⁵二十多年來的統計，臺灣兒童癌症的發生率與美國的十萬分之八到十差不多，也就是說，臺灣每年約有五百到五百五十名左右的兒童罹患癌症，美國每年則約有一萬兩千多名兒童也罹患癌症。兒童癌症問題在全球都不容忽視，亟需醫療資源的投入與醫療科技的研發。

本文選取青少年癌症紀錄片《人生的縫隙》中的公園場景和蝴蝶意象進行深入分析，公園裡模糊的視野表達了血癌男孩因病情帶來的視力障礙，而蝴蝶意象則巧妙地指涉了他對大學生活與常人生活的渴望。通過這些場景，影片成功地刻畫了主人公，在深陷絕境下，依然保持對生命的期待，觀眾也得以更深刻地理解生命的脆弱與珍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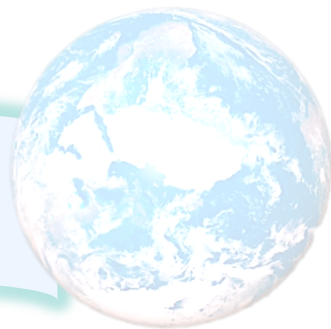
本文拋磚引玉，期待未來有更多的影視作品與相關評論探討臺灣的兒童與青少年癌症議題，進一步幫助社會大眾加強對兒童癌症的知識面理解，並培養對患者和家屬的同理心。



⁵ 關於兒童癌症的數據與資料，請參閱〈常見的兒童癌症與治療近況〉一文：

<https://www.vghtc.gov.tw/UnitPage/RowViewDetail?WebRowsID=bf593a9c-b71d-4573-bea0-5ac433d5589d&UnitID=58875040-4f1e-4ad4-a8ea-9d9c5815b1a4&CompanyID=e8e0488e-54a0-44bf-b10c-d029c423f6e7&UnitDefaultTemplate=1>

月亮與地球



饒惟君

喬治亞州立大學物理及天文系

「今天的月相是什麼？」這樣抬頭仰望天空就能一窺究竟的考題，即使是在修普通天文學的大學生們，也絕大部分答不出來。各位看倌，有人知道月娘今晚以何種姿態見客了嗎？

月球的誕生與成長

月球在所有太陽系衛星中排名第四，也算是大個兒的姑娘吧！話說五十億年前，在太陽系剛形成初期，太空中一個超大隕石跟地球相撞，撞出了月球，我們從此就有了這麼一個好鄰居。不過她以每年三、四公分的移動速度，離我們遠去。雖然越搬越遠，她他還是會繞著地球轉。所謂遠親不如近鄰，我們深深的影響著彼此。

在形成初期，這鄰居還會給我們看不同的面向，也就是說她繞地球的公轉跟自轉不同，我們可以 360 度端詳她，仔細品味。但是由於潮汐力的關係，在形成一億多年後，她就只給我們看正面，也就是我

們平時所看的月亮。這一面的她地表平滑柔順，有些隕石坑。而我們看不到的另外一面，坑坑疤疤，到處都是隕石坑。而唯一用肉眼看過月球另一面的，也就只有那十幾個阿波羅登月計劃的太空人，在繞月飛行時見過那一面。而平滑的這一面也是用潮汐力幾億年拉皮的結果，由於地表平順，所有的阿波羅登月太空人都在此一面著陸。

今人不見古時月 今月曾經照古人

雖然她只用一面會客，但她的繞地公轉和軌道傾角，卻給我們帶來了陰晴圓缺和不同月升和月落的時間。這些變化使得人類自古以來對月亮充滿了興趣，總是對她念念不忘。早期的人類把看到的月相刻在石頭上，記錄生活。這些規律的紀錄成為中西方制定時間曆法的根據，沿用至今。至於那些做官、做皇帝的，用她跟太陽和星象來占卜，求的是長生不老、預知未來、風調雨順和國泰平安。而在中國文學，從詩經、唐詩、宋詞、元曲到近代文

學，即使是現代流行歌曲，總是看得見對月亮的描述，或是用她來代表我們的心。她最近甚至幫我們在漲潮時，排除了那擱淺在蘇伊士運河的長賜號貨輪，也幫了撞上巴爾的摩大橋的達利號貨輪順利脫困。總而言之，月亮跟人類生活是形影不離息息相關，其中月亮給我們帶來最大的視覺效果就是月全蝕和日全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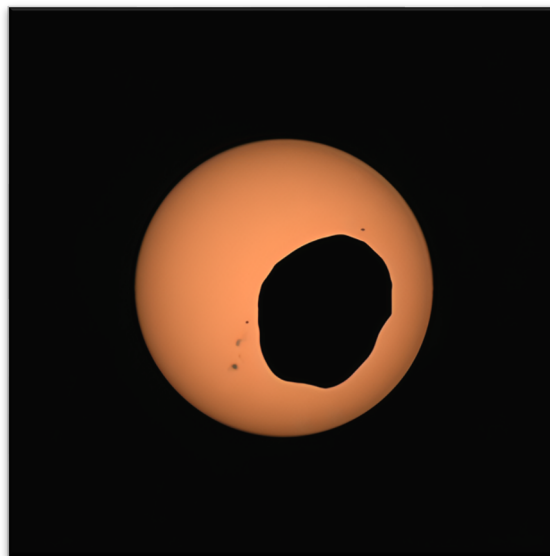
月全蝕：紅色的月亮

月全蝕是太陽、地球和月球在互相繞行時排成一直線，也就是地球夾在兩者中間，而月球進入地球的影子裡。平時，三體如果沒排成一直線，此時的月相應該是新月。但月全蝕時，月亮會整面變成紅色，看起來跟滿月時潔白的月相截然不同。如果地球沒有大氣層，月全蝕時的月亮會是一片漆黑，一點也不特別。月亮在月全蝕時，之所以會變成深紅色，是因為地球的大氣層把太陽光散射到月亮的表面。這就像我們在日出、日落時常會看見紅色的天空美景一樣。看月全蝕比較容易，沒有地區的限制。如果你沒看過月全蝕，下次的機會在 2025 年 3 月。

日全蝕：天狗食日的奇景

日全蝕則是月球夾在太陽和地球兩者中間，這個的視覺震撼就比較大。因為地球有一小部分的表面會落在月球的影子裡，陽光會完全被月球給遮住，白天變成黑夜。由於地表大多數是海洋，能在陸地

上看見日全蝕的機會相對的就小了许多。非得要到陸地上的全蝕帶才看得見。這種三體的巧妙排列已震撼了人類，最早的記錄可追溯到西元前一千三百多年。而這奇觀是『火星人』無法享受到的（如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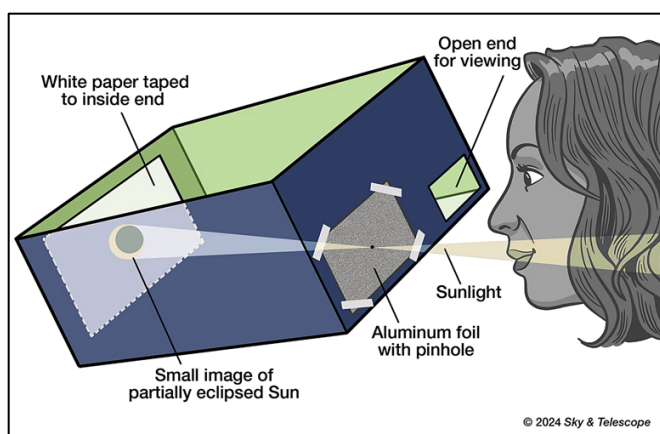


（圖一）毅力號火星探測器（Perseverance Mars Rover）於 2022 年在火星表面所觀測到的日蝕。當時的太陽黑子清晰可見。

住在北美的我們，有幸能在 2017 和 2024 年接連觀賞到這奇景。在媒體和科研單位廣泛的宣導之下，「看日全蝕」已成為一日風潮。民眾早早搶訂日全蝕的沿線的旅館和機票，為了就是要一睹奇景，體驗全蝕。我朋友訂不到旅館，只好訂露營地，一訂就是兩個不同的地方。怕下雨，要有備案，所以看個日蝕還要比鍵盤速度啊。我上回在北喬治亞州看日全蝕的經驗，各位可以參閱我在《思源》2018

年的文章。但是這次的全蝕我就沒跟大家湊熱鬧去外州看，畢竟已經體驗過了。可是我還是裝備齊全在亞特蘭大看偏蝕。

日蝕的前一天，隔壁的鄰居就跑來問要如何看日蝕。他沒日蝕眼鏡，所以教了他做一個簡易的針孔相機（如圖二），這樣就比較安全。當天一早拿一副日蝕眼鏡給太座，這樣她就可以在上班的地方看，跟個流行。我在家也自己做了兩個針孔相機，這樣小孩也可以體驗一下不用日蝕眼鏡看日蝕的效果。畢竟不是全蝕，看歸看，眼睛還是要顧好。



（圖二）簡易針孔相機（從天空和望遠鏡雜誌截圖）

這可巧了，今年在家看日蝕也被雲給攪和了一下。一片一片的層雲可是沒少過，一直飄在頭頂。「雲」是搞天文的頭號敵人，有雲就慘了，每個天文台都是蓋在全年萬里無雲的山上。可是這次的偏蝕多虧了雲，才能好好的看。原因就是這一片片的雲變成了天然的太陽濾鏡，可以把太陽變暗些，反正又不是全蝕，有看到就好！

當太陽被月亮遮住大約一半時，我拿了針孔相機跟小孩在院子裡看，可是我鄰居還是什麼都沒有的在院子講電話，等最大蝕份。結果一問他根本沒做！我只好分一個針孔相機給他，這樣他夫妻倆才可以一同觀賞。雖然在亞特蘭大的蝕分只到八成左右，可是天還是變暗了，溫度也變低了。跟全蝕時類似，也起了一點風。所以看偏蝕也可有全方位的享受！有了這些雲的幫忙，這下用手機就可拍下偏蝕的照片。不然太陽就會太亮，照片會過曝，管你是哀鳳多少，都沒法拍。這時樹下的影子也出現成百有如月眉般的亮光（如圖三），這效果也就是跟針孔相機一樣。太陽透過樹上葉子層層堆疊的洞投影成像，這成了天然的超大型針孔相機。今年是太陽活動的極大期，所以表面的黑子很多，這也就是為什麼今年全蝕時會看見日珥（注 1），非常壯觀。說到今年是太陽活動的極大期，你有在五月時在亞特蘭大看極光嗎？不過這離題了。



(圖三) 樹叢中的偏蝕

後來隔壁的老兄把東西還我，跟我說「怎麼沒有想像的壯觀？」我心想，2017年北喬州有全蝕他沒去看，縱使是2017年在亞特蘭大的偏蝕都還有九成七的蝕份。今年他在家看八成的日蝕，我真的不

清楚他想像中的景象會是什麼？或許是新聞炒的太兇，會以為有一片漆黑的感覺？此時太座捎來簡訊，她那一副日蝕眼鏡造福了全辦公室的同事，大家輪流用一睹奇觀，那紙做的眼鏡也鞠躬盡瘁了。

2024 的日蝕和 2017 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全蝕的持續時間。因為月球在 2024 全蝕時比較靠近地球，所以有去看 2024 全蝕的人可以多享受一分半到兩分鐘的全蝕特效。晚上看了三大無線新聞台的晚間新聞，主播和民眾個個興奮不已。全蝕當下每個人無論黨派和意識形態，抬頭看的是同一個大自然的景象，讚嘆這一生難得的全方位的經驗，也就是說日全蝕把北美的人團結在一起了。如果你錯過了這兩次北美的全蝕，下回要在北美看日全蝕要等到 2044 年，而在臺灣看全蝕則要等到 2070 年。如果不想等這麼久，在 2026 年就得飛去西班牙或格林蘭去體驗。記得我們這個鄰居越搬越遠嗎？五億多年後，月球就會看起來小到遮不住太陽，就再也沒有日全蝕了。

【注釋】

(注 1)：日珥只能在全蝕時在地球上看見，平時只有那些繞太陽飛行的望遠鏡才看得見。顧名思義就是太陽長了個耳朵，這是太陽表面電漿和磁場向外延伸的結果。<https://science.nasa.gov/image-detail/2024-total-solar-eclipse-4/> 這是 2024 全蝕所看見的日珥，下面像三角形的日珥的大小約有三或四個地球那麼大。

星星、月亮、太陽

黃耀文

喬治亞大學食品科技學系名譽教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安研究所榮譽講座教授
一幅圖像勝過千言萬語，何不拿著手機拍下周遭的風景，自娛娛人

《星星月亮太陽》是徐速於 1953 年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並於 1961 年改編成了電影。該書以中國抗日戰爭的前後為背景，描繪了大時代中的兒女情懷。

男主角愛上了三位性格迥異的女主角，故事中用星星、月亮和太陽來象徵這三位女性。

一位幽怨孤淒有如星星、一位莊嚴明朗有如月亮、一位則熱血剛強有如燦爛的太陽，她們就像天空中的星星、月亮和太陽，分別代表了高潔、莊嚴、美麗的人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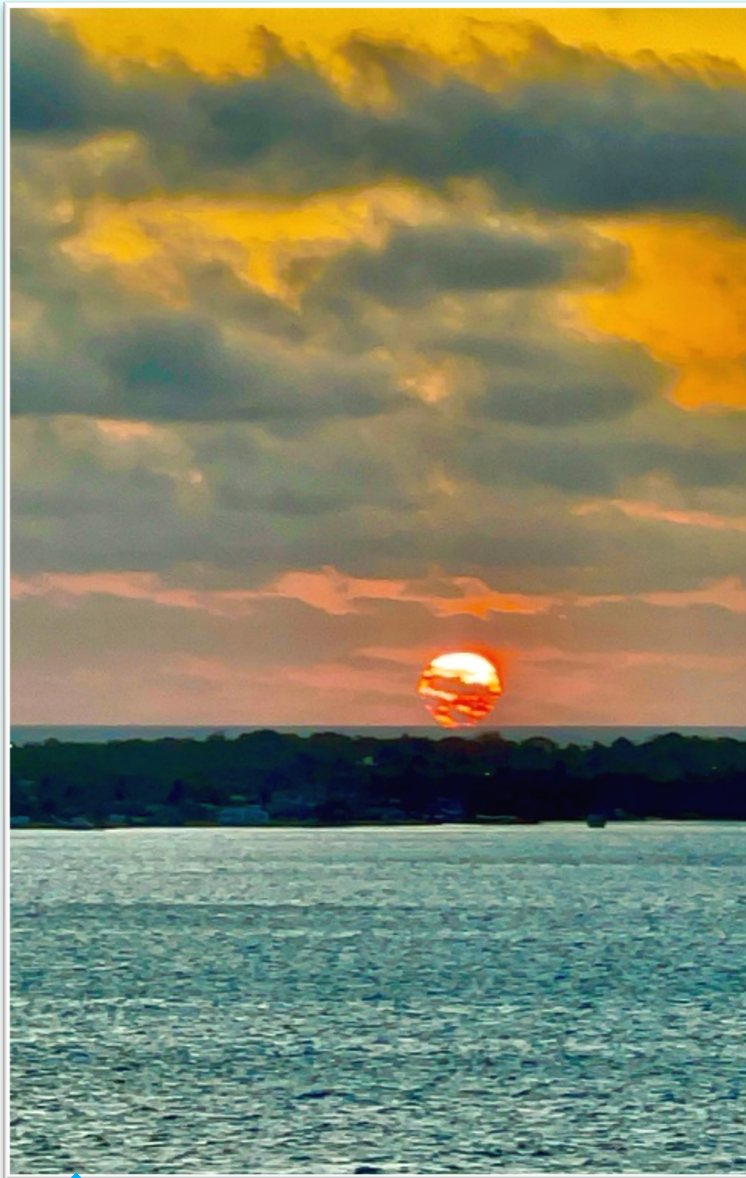
小說以這三位女性與男主角的愛情故事為線索，展開了一個時代的畫卷，表現了人間的「真、善、美」。但是，男主角與三位女子三段愛情，卻是個沒有結果的故事。

書中，作者勾畫出在八年抗戰的歲月裡，開展了三段前後交織、細密層疊的至情史詩。是寫愛情，但也寫出了抗日戰爭帶給中國人的傷痛及無奈。

我之所以將《星星月亮太陽》作為本文主題，實則緣於這部小說及其改編的電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實，自古以來文人墨客常以日月星辰為主題，創作了無數豐富的詩詞。他們以景結情，喚起人們共鳴。

愚不敏，對日月星辰的攝影頗感興趣，拜科技之進步，手機已經取代了沉重的照相機，讓我們更方便地捕捉時光中的剎那，自娛娛人。在此，就教於先進，願與各位分享這份樂趣，期待共襄盛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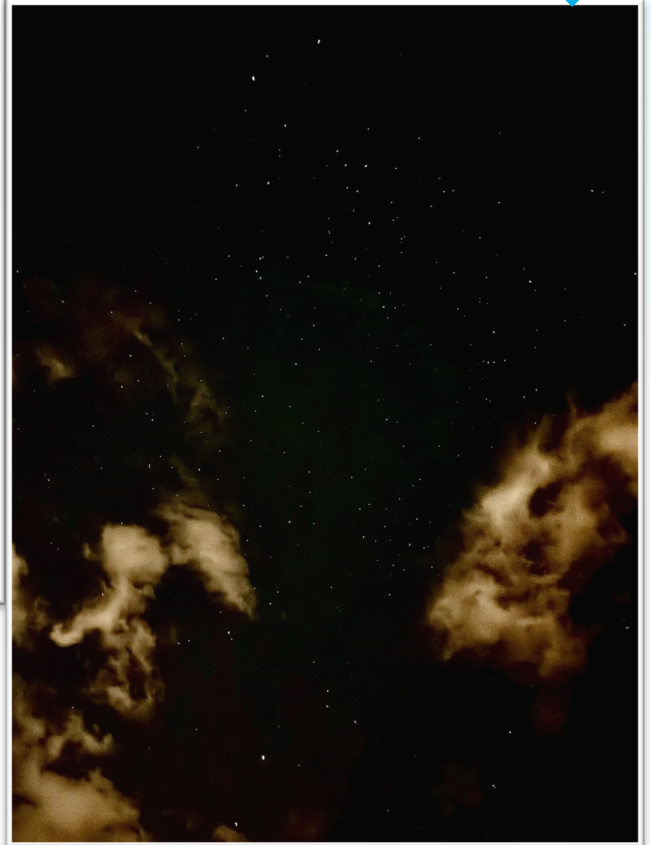


圖一：唐·李商隱〈日日〉：

日日春光鬥日光，山城斜路杏花香。
幾時心緒渾無事，得及遊絲百尺長？

圖二：唐·寒山〈眾星羅列夜明深〉：

眾星羅列夜明深，岩點孤燈月未沉。
圓滿光華不磨瑩，掛在青天是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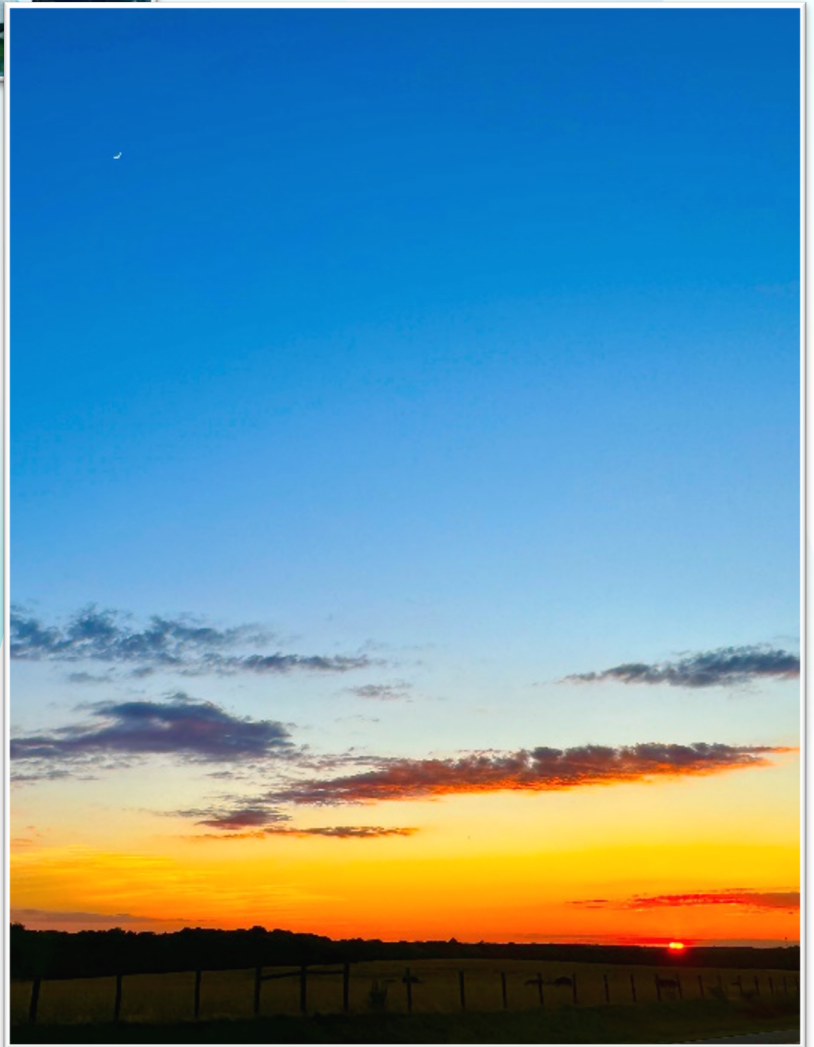
圖四：

日月同輝、天地共彩



圖三：南宋·范成大〈車遥遥篇〉：

車遥遥，馬憧憧。君游東山
東復東，安得奮飛逐西風。
願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
相皎潔。月暫晦，星常明。
留明待月復，三五共盈盈。



世界名畫欣賞

羅漢中

筆者退休前是西維琴利亞州，Bluefield State College and Marshall University 美術系教授
目前全職作畫，參展以及教畫

第一幅：《Narcissus》by Caravaggio (1571-1610)



《Narcissus》（那西索斯），是一幅寬97公分，高113公分的油畫，創作大約在1597-1598年間。這幅畫作出自於義大利 Baroque（巴洛克）時期的大畫師，Michelangelo Merisidetto da Caravaggio，簡稱 Caravaggio（卡拉瓦喬）之手。該畫目前收藏於義大利羅馬的 Galleria Nazionale d'Arte Antica（國立古典藝術館）。

Narcissus（那西索斯）就是畫中的男主角。此畫作的靈感取材於古希臘神話，詩人 Ovid（奧維德）的《Metamorphoses》（蛻變）一書而來的。神話裡的那西索斯，是一位令所有少男少女為之傾倒的俊美少年，但是他對所有愛戀他的男男女女都一律拒絕，特別是對年輕貌美的少女的追求更是不理不睬。這些心靈受到創傷的年少男女心生怨恨，於是決定請求掌管復仇的女神 Nemesis 來懲罰他。復仇女神發誓用法術讓那西索斯永遠不會被他想要愛的人愛上，也讓他嚐到不被愛的痛苦。有一天，那西索斯渴了，來到了一處溪水邊，當他彎著腰雙手伏地趴下去要喝水時，突然發現溪水裡竟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倒影，他當時沒有馬上意識到那倒影就是自己的倒影。他不敢相信這世上還有比他更漂亮的人，這個如大理石般所雕刻出來的倒影讓他立刻愛上了。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最後他得知那倒影就是他自己時，他對水中的倒影就越發迷戀，他愛戀到無法離開這個倒影，也愛戀到無法接受這種沒有回應的愛。他所眷戀的溪水中的倒影使他心中燃起炙熱的火焰，對周遭所發生的一切都無動於衷，他每天在溪水旁看水裡所映出的自己而喃喃自語，最終陷入無法自拔的自戀狀態。久而久之，他不吃不喝，因為得不到他所渴望的愛情，漸漸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為了要捕捉那美麗的倒影，最終他躍進溪裡溺斃身亡。在他死後，他生前曾待過的地方陸陸續續長出無數黃色，白色的花，後人取名為 Narcissus（那西索斯花）。

此畫描繪出一個神情恍惚略帶憂鬱，不快樂的那西索斯，蹲伏在溪畔，完全無視於周遭美麗醉人的景色，只專注定睛於水中這個美麗虛幻的影像。他深愛著這個倒影，他渴望接近它，擁抱它而不得，但他還是如癡如狂地愛到不能自己。直到有一天他終於意識到這一切都不可能實現時，他傷心欲絕地落下淚來，當淚珠一滴滴的落在溪面上時，片片漣漪劃破了這死寂的溪面，同時也永遠地粉碎了他美麗的倒影！

卡拉瓦喬的這幅畫是屬於他在巴洛克藝術風格時期的一幅成熟作品，畫面瀰漫著一層神秘色彩，那西索斯的白衣加上雙臂和深暗的背景，形成極為強烈的對比。從在溪水旁的他，彎著腰變成弧形的真人，到倒映在溪水中另一半虛擬的弧形身軀，卡拉瓦喬慧黠地創造了一個完美的圓：溪旁是一個真實世界的半圓，溪中則是一個扭曲，虛擬的另一個半圓倒影。那西索斯整個身形好似被這個大圓圈給牢牢地困鎖了進去，周圍一片漆黑，他似乎

無法破圍逃出，最終被自己的自戀牢牢束縛。更悲哀的是，當他走向通往冥府的冥河路上時，眼睛仍不時地回頭，留戀的張望著自己美麗的倒影。

根據一些文獻的記載，卡拉瓦喬當時是找了一個年輕俊俏的美男子作模特兒，直接將他畫進畫布上的。他採用了當時頗為流行的一種繪畫技巧，叫 Chiaroscuro 即明暗或光影對比法，如畫中溪水和背景的暗影巧妙地襯托出那西索斯衣服和雙臂的光亮，溪水本身的明與暗則傳達了其深度，甚至那西索斯的膝蓋也呈現出不同層次的明暗。卡拉瓦喬用他的畫筆對光與影，明或暗的無限可能性做了認真而又深入的描繪，不僅突出人物與倒影的對比，同時還強調了前景和背景的對比，更有一個真實與虛幻世界的對比。

那西索斯的神話故事也一直重覆出現在許多西方文學作品中。而由 Narcissus 演變而來的 Narcissism（自戀狂）一詞，更是廣泛地被應用在心理學的領域。它意喻著有一種人有很強的自我為中心的人格傾向，一種精神上患自戀性的疾病。有此癥狀的病患者通常是過度地需要別人的關心或稱讚，而幾乎完全沒有能力去關懷體諒或愛別人，這種極端的自我愛戀，達到自我膨脹的優越感，猶如希臘神話中的 Narcissus（那西索斯），自戀到無法自拔。

後記：


上文寫完後，筆者趁暑假期間走訪上文提到的義大利羅馬的國立古典藝術館，親睹《Narcissus》（那西索斯）這幅原畫，並讀了畫旁印有義大利和英文對照的有關這幅畫的真實作者的爭議性短文。有一批學者認為《那西索斯》是卡拉瓦喬的原作；另有一批則認為此畫的原作應歸功於 Giovanni Antonio Galli（1585-1652）。另一爭議點在於有些人根據 Ovid（奧維德）的《蛻變》一書，對那西索斯主題過份渲染地描繪，畫裡的他是處在一種瀰漫著神祕色彩的暗影中，這層暗影詭譎地表達了以他身份為主的主題，和他到底是可以辨認出來的，或僅是一種幻覺的雙重性。這種普遍的風氣影響到代表自我，個人或一般畫作的本質，它不僅撕裂了人們想嘗試去忠實地複製其真實性的可能性，同時也冒着偽裝或掩飾之險。這一切爭議都反映出 17 世紀人們對 epistemology（知識論）過分的迷戀之故。

第二幅：《Landscape with Narcissus and Echo》by Claude (1604 / 5 ? -1682)



歐遊期間，筆者也順道參觀了位於英國倫敦有兩百年歷史之久的國立畫廊（The National Gallery-NG），巧遇另一幅以那西索斯為題材的畫，在此順便也作個簡單的介紹和分析。

《Landscape with Narcissus and Echo》（那西索斯和回音女神的風景畫），這幅油畫係英國畫家 Claude（克勞得）於 1644 年在他繪畫生涯達到顛峰時的畫作之一，畫寬 118.7 公分，高 94.6 公分。克勞得生於 1604 或 1605？，卒於 1682 年。他擅長畫風景，畫過許多有關宗教或神話故事的風景畫。這幅畫跟 Caravaggio（卡拉瓦喬）畫的《那西索斯》一樣，也是取材於 Ovid（奧維德）的《Metamorphoses》（蛻變）一書，以希臘神話裡的人物為主題。畫中描繪了 Echo（回音女神）愛上了一個拒絕愛她的美少年 Narcissus（那西索斯）。Nemesis（復仇女神）則透過逼迫那西索斯愛上自己倒影的方式來懲罰他。這幅畫的背景裡有一座城堡，但在奧維德的書中並未提到過城堡，這或許跟克勞得花了人生大半時間住在羅馬的鄉間，目睹了許多的廢墟有關。他也擅長畫海港，就像我們在這幅畫的遠



方所看到的一樣。他用樹林，建築物框住這塊遼闊的大地，充分顯示出他巨大無比創造出對光影和一層一層大氣的技巧。相比之下，他的人物畫則略遜於其風景畫。畫中的人物是用一層層薄的油彩加上去的，人物的姿態稍顯死板，而他本人對人體解剖學也沒有太留意，才使得這幅畫中的人物看起來有點生硬不靈活。

我們再來看看樹叢中藏的一上一下兩位小女神：下面的一位是回音女神。按奧維德書中的敘述，她死後就剩下她的聲音了。原本在畫的最下方躺着一位身著藍色袍子蓋住身體的女神，後來有人在重畫時就改為裸體了（我所附的這張相片是筆者在現場拍攝的）。為什麼要在外貌上做這樣的改變呢？無人知曉。有一種說法是克勞得自己塗改的，另一說法是後來的某位畫家替他修改的。回音女神是以水神姿態出現在畫中，她把一個手臂放在一個大罐子上，讓柔和緩慢的溪水從中流過。再看她的臥姿，這姿勢好像是克勞得在模仿羅馬梵蒂岡美術館內一座叫《Cleopatra》（埃及艷后）的古式雕像而來的，原雕像上還裝飾着一座位於羅馬 Belvedere 宮殿內的噴泉。還有一種可能是他的靈感來自於他曾經看過畫家 Titian（提香）在 1523-1526 年間畫的《The Andrians》，畫裡面正好有一位躺臥着的女神。《The Andrians》這幅畫目前收藏在西班牙的 Prado 美術館。

那西索斯和回音女神的故事在 17 世紀是一個熱門的畫題。克勞得的這幅畫是目前唯一已知他嘗試這種題材的作品。

在畫中，我們看到一幅何等悠閒寧靜優美的畫面：遠處有青山，有城堡，有海港，有往來其中的大小船隻，近處有綠水，有樹，有花，有草，有湖，晨光從左邊的樹林中穿透過來，林中躲着兩位貌美的女神，第三位女神-水神則斜躺着享受這美好的大自然，還有一個美少年那西索斯蹲伏在溪邊，正定睛凝視那銀色水面所映照出他美麗臉龐的倒影。

這情景像不像人間仙境？難怪 Claude（克勞得）會成為 17 世紀英國最受人讚賞的畫家和收藏家的寵兒。

李國鼎先生故居繪圖比賽

王泰安

全美 NCCAOM 註冊中醫師（針灸 / 中醫藥）
執業 Atlanta GA，主治痛症、關節炎、中風、婦科
畢業於加州五系中醫藥大學博士，紐約中醫學院碩士
喜愛繪畫、音樂



李國鼎先生故居 / 王泰安繪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Mr. K. T. Lee, painted by Taian Wang

話畫—李國鼎先生故居

2023 年 11 月 23 日李國鼎先生故居繪圖比賽，繪畫作品希望能展現李國鼎先生對中華民國臺灣的發展及貢獻。他對臺灣工業科技的努力絕對是當今放眼望去兩岸三地，甚至擴展到全世界，無可憾動的基礎。

六十年前 1970 的時候，經國先生和國鼎先生坐在故居院子一個角落，談論著如何面對將臺灣從農業轉型升級工業科技產業，所以故居的院子裡還有雞、貓、狗，老腳踏車，故居裡的老電視機及屋頂上的電視天線，桌子的老舊收音機。

然後圖畫的畫面轉入機器貓，電動自行車，再加上太空科技，跟外太空的關係對話，所以右側的天空上有外星飛碟和光束。

經國先生指的石頭，是以李國鼎先生為名的隕石小行星，李國鼎先生則指著天上的飛碟跟經國先生說：那就是我們要去發展的地方……

到今天，我們看到了台積電，電動車，電腦機器人，Space X 商用火箭，我們和太空的關係也越來越近了……國鼎先生不愧是當今科技之父。

補記：參加「李國鼎先生故居繪畫比賽」記趣

2023 年 10 月底，我回到臺灣參與國防醫學院在公館水源地的老舊眷村（學人新村及嘉禾新村）改建為新遊憩社區的計劃與設計，這大概是臺北市碩果僅存最後一個老舊眷村了。學人新村是 1950 年代由美援會支助捐建，供國防醫學院軍醫眷屬使用的；我岳父母是第一批入住學人新村的醫學院教授。

我們帶著當年的資料及照片，參與改建工程的規劃，並介紹學人新村當年的各個老景點、老房子、老倉庫、食堂和幼稚園。改建單位希望能將從前的景象原原本本地重現，同時將倉庫區和教學樓改建為 27 層樓的國民住宅。另外，我還和喜好中醫養生的朋友們探討了八段錦與中醫的關係，大家都對八段錦運動有著很深刻的體會，認為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運動，但能令人身心通體順暢。對我來說，八段錦不僅是於己有益，還是一種值得與人分享的健康運動。

在臺北的某一天，我坐地鐵時，偶然在出口處看到一幅海報，上面寫著「李國鼎故居繪畫比賽徵選活動」，這激發了我的興趣，於是我特意抽出時間前往李國鼎故居一探究竟。我坐地鐵到臺北工業大學（從前的臺北工專）下車，穿過新生南路走進濟南路，這裡還是

老舊公寓和翻修過的日式庭院老屋，中間夾雜著新的住宅高樓，旁邊還是成功高中。慢慢地，我靠近故居的古厝子，轉彎處一眼瞧見了「泰安街」，彷彿一切都殷切般地靜靜等待著我。



故居院中一隅，攝於 10/15/2023

泰安街 2 巷 3 號，這裡是李國鼎先生的故居，目前是紀念館，簽名後，我進入參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日式老房子和小院子，客廳內有老式的沙發和桌椅，還有書架和一台老電視，特別的是，這台電視旁邊居然還有兩台小電視，可以同時觀看台視、中視、華視三台。在書房裡，有一台增理智的短波收音機，那年頭能聽到短波電台的真不簡單啊。在書桌旁有一個展示框，裡面放著一顆黑呼呼的石頭，上面寫著：這個隕石是美國航太工程送給蔣經國先生的禮物，由經國先生以李國鼎之名命名的，看得出來經國先生對李先生的愛戴和寄與厚望。在院子的角落擺設著一張石桌和三張石凳子，還有一輛辦事人員的腳踏車。整個故居就被四周的高樓包圍在中央，要不是幾棵大樹遮蔽，還真的是毫無隱私。



左圖：李國鼎小行星

右圖：李先生有“三快”之稱：講話、做事、走路均快。



看起來這個故居的繪畫比賽，應該不僅僅是要讓大家來看看這個老房子，來畫畫這個老房子的環境。若是要畫出他的功績偉業，非得從臺灣的家庭工廠到光華商場，從大同電視到中興牌電冰箱，從大哥大手機到蘋果電腦，這樣如何可以結合故居的故事呢？我尋思著如何利用故居的事物構出一幅畫來，藉此介紹李先生對臺灣的貢獻，也希望藉由這幅畫，展示臺灣從開發中國家到已開發國家的轉變。從過去家家戶戶養雞下蛋、爬上瓦頂架電視天線的日子，到如今電動車及智慧機械人的時代，進而面對未來飛碟的到來，其實我也相當驚訝主辦單位願意接受我畫的這架飛碟呢。主辦單位告知我將獲得獎金新臺幣五千元及獎品水彩畫具一組，我把第一名的獎金捐給了高雄六龜育幼院，感謝他們培養出如口足畫家楊恩典女士那樣笑容和自信的孩子們。

最後，泰安街 2 巷 3 號，你們有沒有覺得挺有意思的？這不僅是與我同名的街址，還是一段歷史和無數故事的見證。

【附註】：

如果對李國鼎先生的生平或蔣經國與李國鼎之間的故事有興趣的讀者，建議您進一步閱讀以下書籍或文章：

- 1) 《李國鼎先生訪問紀錄：臺灣科技政策發展》，劉素芬、陳怡如、袁經緯、林志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2020。<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51582>
自 1990 年代起，李國鼎（1910-2001）被譽為臺灣的「科技之父」，也是戰後經濟發展重要奠基者之一。在這本回憶錄中，通過李國鼎本人及其團隊對他珍藏的文件、檔案和工作記憶進行的詳細考證，展示了李國鼎對臺灣科技產業難以比擬的影響力。在書中，李國鼎詳細介紹許多重要政策的背景和實施過程，並清晰地解釋這些政策之間的連接和演變。內容涵蓋臺灣政府於 1979 年發布的「科學技術發展方案」、同年在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內成立的由國際專家組成的「科技顧問組」、1980 年創建的「科學園區」（Science Park），以及 1985 年開始籌備設立的台灣積體電路公司（TSMC）等政策和計劃。這些舉措為臺灣自 1980 年代以來的高科技產業奠定堅實的基礎，使臺灣在全球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
- 2) 《學李國鼎做事：推動台灣工業發展的關鍵人與重要事》，王百祿，時報出版，2022。<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42242>；此書記錄了蔣經國與李國鼎 40 年的恩怨情仇。
- 3) 〈李國鼎先生生平〉李國鼎科技基金發展會，<http://www.ktli.org.tw/menu16.php>（摘錄自王昭明先生召集之編審委員會於 2004 年出版《李國鼎的一生》）

率美國女學生回國參訪記

老夫子

老夫子，是大番薯的好友
當了一輩子教書匠，粗通文墨，老氣橫秋，酸氣衝天
對中文教育情有獨鍾
喜歡推動中西文化交流

許多年前，我在美國南方一所著名的女子學院 Agnes Scott College 任教。為擴大學生視野，學校每年暑假組團前往世界各地參訪。我是在 1988 年暑假，學校共組成了五個團：一團往歐洲，一團去中南美，一團去印度，還有一團去紐澳，剩下這一團由我和經濟系教授露絲瑪麗·肯寧漢帶隊，前往遠東。暑期研究標題：「在臺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等三種不同經濟體系下中國人民的經濟生活比較研究」。規定學生於旅途中，須仔細觀察當地人民生活並每天記筆記，旅行完畢須繳報告。

籌備出訪

出發前一年，由我和露絲瑪麗先共擬參訪計劃。批准後，於寒假先行返臺安排參訪項目及食宿。由於得到當時駐亞特蘭大行政院新聞局辦事處主任白雲峰先生之襄助，所以一切順利。在安排旅程之中，有幸拜會了蕭萬長先生，郭婉容女士及名經濟學者蔣碩傑先生等人，皆蒙親切接待。還參觀了中鋼及桃園科學園區。住宿地點安排簽約妥當，萬事俱備，祇待暑假到來。

回校之後，即開始招兵買馬。出發前數週，開始集訓講習，由我簡報臺灣現況、風俗文化及講授簡易華語。學生們皆同意，旅臺期間，為深刻體會當地文化，應每日至少吃中餐一頓。

出發的日子來臨，本人負責財務，手提箱內，裝滿現鈔及旅行支票，在眾多美女的前呼後擁之下，頗有「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之氣慨。前往機場，登上了波音七四七廣體客機，立刻引起了好迷少男們的注意，紛紛想方設法向眾家美女接近。一路上頗不寂



寞，老夫則雙眼微閉，假裝睡覺。露絲瑪麗也睜一眼閉一眼，祇要不太過份，則亦不予干涉。

臺灣初體驗

經過十數小時之飛行，抵達桃園機場。和當年出國時全家相擁而泣的場面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語。少年男女們則依依不捨，相約臺北再見。

抵臺後第一頓晚餐，安排在海霸王餐廳以示隆重。沒想到洋妞們習慣吃炸魚薯條，望著滿桌之清蒸紅燒海鮮，竟然無下箸之處，真是掃興！

第二天開始參觀訪問，我們在臺北主要是拜會政府及學術機構，聽取簡報。那時臺灣十大建設完成不久，一切朝氣蓬勃。郭婉容、蔣碩傑等講員皆非泛泛之輩，學識超群，見解精闢，令小姐們對臺灣建設之印象特佳，紛紛豎起大拇指說 wonderful！老夫亦覺甚有面子。

回想政府自大陸遷臺後，檢討丟失大陸原因，痛定思痛，勵精圖治，大力改革。先是推行「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以發展農業。後來鼓勵地主將資金投入工業。由於政策正確，主政者又清廉幹練，所以經濟得到高速發展。新臺幣幣值穩定，一洗大陸將淪陷時之幣值混亂、通貨膨脹，人心惶惶之亂象。臺灣各地，物阜民豐，繁榮安定。那時臺灣經濟起飛年代，適值蔣經國當政。經國先生氣魄恢宏，主張「開大門，走大路」。用人唯才德，不分省籍。全力推動「十大建設」。政治上則開放黨禁，推動民主化。此時臺灣雖外有中美斷交之阻撓，內部卻是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為不可多得之朝氣蓬勃，欣欣向榮時期（註1）。臺灣因此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和民國38年大陸將淪陷時期之兵慌馬亂，形成鮮明對比。

我們住的地方，是在羅斯福路的一處接待中心。記得寒假訪臺簽約時，經理拍胸脯擔保該建築每晚十時關閉大門，我們覺得甚為安全。可是忘了西諺中有「當上帝關上一扇門時，祂會開一扇窗」，事實確是如此。在那緊閉的大門旁邊一扇窗子大大打開，青年男女整夜在那裡跳進跳出。我和露絲瑪麗雖對學生們一再告誡，並於睡前不時查房。可是到了更深人靜，有沒有「張生踰牆」，與在飛機上認識的男友一起去夜遊逍遙，那就祇有天知道了。



關於吃，我回到臺北是如魚入水。甚麼臭豆腐、牛肉麵，蚵仔煎等吃得不亦樂乎，可苦了那些洋妞，沒有一樣能吃得下。儘管出發前大家都豪氣干雲地應允每天吃一頓中餐，可真等面對一桌中式佳餚，大夥兒都傻了眼。真是愁眉苦臉，食不知味，一再地央求我帶她們去麥當勞、必勝客和其他西餐店。到了那兒，換成她們如魚得水，精神煥發。所以每逢進餐時間，我先把她們送到西餐店，拿些錢給露絲瑪麗付帳，然後就和她們分道揚鑣了。臺北有那麼多好東西可吃，我才不要吃漢堡。由這件事看來，所謂文化交流，是知易行難，尤其關於基本民生問題。幸而時值盛夏，臺灣盛產水果，她們倒是挺喜歡荔枝、芒果、西瓜等水果。

還有一樣她們喜歡的是臺灣啤酒。每當傍晚，參觀完畢，我就帶她們去淡水那邊的啤酒屋，那時夕陽西下，陽台上清風徐來。看到這群洋妞在那兒喜氣洋洋，飲酒談笑，真令人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她們學的幾句中文裡，最喜歡說的是「我喜歡臺灣啤酒！」當然在喝酒之前，我和露絲瑪麗會察看她們的護照，確定她們合法飲酒。她們也都很識趣，從不過量飲酒。

行的方面，行政院新聞局介紹我們包了一部巴士。司機是一位本省年輕小夥子，熱情友善，雖然不大會說英語，可是比手畫腳馬上和洋妞們打成一片。再加上我會說臺語，大家有說有笑，溝通暢通無阻。當時我們這一群人在臺北街上行走是頗為引人注目的，祇見一個中國彪形大漢帶著一群金髮碧眼的洋妞東闖西走。有些本地人大約從沒有見過這許多洋娃娃在一起，眼睛直勾勾地望著她們，所幸這些洋小姐們都很大方，保持微笑，並不在意。我們利用參觀訪問之暇，把臺北市內外各景點及購物中心都逛了個夠，小姐們的箱子裡的內容也越來越充實了。

在臺北的觀光行程中，有幾個地方特別引起她們的興趣。其一是故宮博物院，那裡面的國之瓊寶讓洋妞們體會到中華文化之源遠流長及博大精深。另外龍山寺亦使她們發思古之幽情。至於附近的華西街夜市，亦使她們體會到當地人的生活。祇是看到那些關在鐵籠內等待被宰殺的鹿、穿山甲及蛇等動物，不要說她們，連我都覺得野蠻殘忍。

為介紹中華文化，曾前往國軍藝術中心觀賞國劇，祇見現場秩序不似聽西洋歌劇之鴉雀無聲。交談者有之，半途出入場者有之。我雖事前詳細介紹京劇特色及講解劇情，可是小姐們聽不懂京戲戲文，終是缺乏興趣，大部份人不但睡著了，還睡得東倒西歪，真令老夫吹鬍子瞪眼。



和她們生活在一起，近距離觀察洋妞，發覺她們大多純樸善良。不過人非聖賢，她們之間也因個性喜好形成小圈子，有時也會有矛盾衝突。這時露絲瑪麗往往擔任排難解紛的角色。我則儘量避免介入，以免越幫越忙。她們也都對我很好，把我當作長輩對待。

當臺北行程告一段落時，在南下之前準備先去東部花蓮觀光一番。我於出發之前先以幻燈片將東部美景介紹一遍，大家都很興奮。不料剛出臺北市區，車輪爆胎，露絲瑪麗的臉都嚇白了。幸而很快找到一家車行把輪胎換了，才安然上路。一路上蘇花公路青山隱隱，綠水迢迢，美景如畫，直把這些洋妞看得呆了。大家盛讚臺灣風光之美，皆覺不虛此行。行經太魯閣，大夥皆嘆服大自然之鬼斧神工。車過長春祠，大家倘佯於青山綠水之間，洋妞們牽手在溪流中涉水歡唱，好一幅美人戲水圖。

我們在天祥住了一宿，領略了橫貫公路的絕世美景。第二天觀光花蓮市區，採購紀念品，人人滿載而歸。傍晚回到臺北，準備第二天一早南下。

南下途中經過鶯歌，參觀陶瓷公司，見藝術家在陶胚上繪畫，不用起稿，皆嘆為觀止。洋妞們則慷慨解囊，選購瓷器。行經新竹科學園區，入內參觀，對於臺灣高科技之發展，印象深刻。我們在日月潭住了一宿，湖光山色一洗旅途勞頓。

第二天一早出發前往高雄，途經佛光山，乃上山參訪。這些在基督教國家長大的姑娘們，第一次看到雄偉高大的佛像，皆覺得不可思議，真是少見多怪。這些要來觀察別的家人的宗教信仰的人，她們的反應竟成了被我觀察的最好對象，真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當行近高雄時，有一女生煙癮發作，為免污染車內空氣，把拿著香煙的手伸出車窗。不料車後一個騎機車的少年，加速追趕上來伸手把菸取去。一面回頭得意大笑，我則為我自己的同胞如此不入流之舉動，羞慚得真希望有一個地洞讓我鑽進去。

車抵高雄之後，我們住宿於澄清湖畔之木屋區，每兩位學生分配一間木屋。當行李搬卸已畢，時近傍晚，我和司機站在樹下，閒話家常。忽然聽到有人尖叫，前往察看，乃看到幾個小混混在偷看女生洗澡。見到我和司機趕來，乃倉皇逃去。又一次使我面子上掛不住，無地自容。結果當晚由我和司機一起持棍巡夜，以防不測。由教授而變成守夜，雖可能被人認為斯文掃地，但亦表示在旅途中當能屈能伸，靈活應變。

我們在高雄參觀了中鋼，果然規模宏大。然後一路往南，經恆春抵鵝鑾鼻，飽覽南臺灣風光。女孩子們的心情都很好，一路歌唱舞蹈，充滿青春氣息。我們探訪了墾丁公園，也帶她們去海灘溜達。大家都為南臺灣的迷人風光所陶醉而流連忘返。



北歸途中探訪了小人國及一個美麗的花圃。時值盛夏，花圃中繁花似錦，彩色繽紛，大家乃合影留念。祇見人美花嬌，爭奇鬥豔。

回到臺北後，旅臺行程告一段落，準備次日飛往香港。臨別依依，舉辦隆重晚宴以慶祝旅臺之行圓滿成功，並邀司機參加。此時大家相處多日，情同家人。餐後，司機自告奮勇，欲帶小姐們往夜店觀光，由露絲瑪麗陪同前往。我因連日來責任重大，精神疲乏，乃先回旅館休息。

第二天清晨，大家整裝待發，卻見司機的妻子怒氣沖沖趕來，見到司機不由分說就是一巴掌，然後繞車追打司機，眾位女士看得目瞪口呆。經問之下，乃知司機昨晚送小姐們回旅館後，遇到朋友，再往夜店中狂歡達旦，竟然一夜沒有回家，難怪老婆如此生氣而在大眾之前上演了一幕鬧劇，真令人啼笑皆非。

經過了一番排解和勸說，司機的太太總算平靜下來，答應讓司機先送我們去機場，「有帳回來老娘慢慢算。」在去機場的路上，司機垂頭喪氣，我則好言安慰之，勸他回家和太太陪不是，息事寧人。到了機場才發現了一個大問題：由於有些人採購太多，行李超重，罰款驚人。司機此時發揮作用，幫著大家打開行李，重新分配重量，一番忙亂，幸而順利登機。起飛之後，望著腳下逐漸遠去的臺灣島，心中默默的祝福國家前途光明，社會繁榮康樂。

香港、大陸初體驗

在往香港的飛機上，露絲瑪麗也沒有浪費時光。她讓學生利用時間撰寫旅臺感想。一時機艙成了教室，人人振筆疾書（那時筆記本電腦尚未普及），令一旁的旅客側目而視。

抵港後，居住在新世紀酒店。頭一天下午自由活動，我們去新世紀酒店附設之咖啡廳享受英國下午茶，祇見精美糕點一車車的推出來。新世紀酒店地處維多利亞海峽之旁，坐在咖啡廳落地大窗前，可以見到海峽中帆檣往來，此時夕陽西下，浮光耀金，海闊天空真是美景無限。

第二天我們包了一部旅遊巴士，至尖沙嘴、中環、赤柱、淺水灣、避風塘等處旅遊參觀，考察民情。中午搭小艇往一間停在外海上之海鮮畫舫午餐，進餐之前大家穿上古裝，由我扮成皇帝，露絲瑪麗扮成皇后，眾女生扮成宮女合照了一張相，真是洋相出足。



在香港旅行有幾件事值得一記：一是車靠左駛，和美國完全相反，所以到了十字路口大家都朝相反方向看去，幸而未嘗試在港開車，不然一定出事。其次香港依山傍海，景色秀美，登山而望，祇見海面上漁舟點點，海天一色，令人精神一爽。車行途中司機遙指山區豪宅，見車房中停有勞司萊斯名車，車牌為「8888」，粵語意為「發發發發」（一路發）。

我們也曾去茶樓飲茶，祇見點心精美，樣數眾多，口味地道。茶樓中熙來攘往，熱鬧異常。

香港參觀完畢，包車前往大陸深圳參觀。其時大陸開放不久，深圳遠不如今日之繁榮，有點像經濟起飛初期之臺灣出口加工區。我當時即告訴露絲瑪麗及學生們，大陸人工低廉，不久那些 Made in Taiwan 之產品必將為 Made in China 所取代，其後事實證明果不其然。

自深圳回港後又搭水翼船往澳門參觀大三巴、國父故居及葡京酒店賭場等名勝，盡興而歸。

賦歸

暑假參訪行程至此圓滿完成。（唯一比較可惜的是，隔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變。打斷了我率隊前往中國大陸參訪的計劃。真是「計劃趕不上變化」）在飛回亞城途中，大家都覺得此行增長見聞，擴大視野真不虛此行。尤其對於有些一輩子沒有去過東方的人更是大開眼界。由於她們大多主修與經濟有關學科，此行所獲經驗對她們將來事業有甚大影響，並一致公認中國人民最為吃苦耐勞，無論在任何經濟體系下，假以時日，必能取得傑出偉大的成就。

【註釋】

（註 1）自那以後，二十年間，臺灣經濟衰落。其詳情可參閱：盛華仁財經週報—臺灣經濟大衰敗，這 20 年發生什麼事？（時事短評）

<https://goldensun.get.com.tw/FinanceWeek/detail.aspx?no=410449>



我回到上海外灘



楊乃莊

在中喬治亞州立大學任教化學
一世漂泊，四海為家
惟願見到舉世各國人民豐衣足食，幸福美滿

2012年5月18日，對我來說是個畢生難忘的日子。那天風和日麗，下午五時十五分我來到睽違了六十三年上海外灘。其時夕陽西下，陽光返照在外灘的高樓大廈上，金光閃耀，江邊擠滿了觀光的人羣，涼爽的江風一陣陣的吹拂著。我站在久違的黃浦江邊，望著不斷咆哮奔騰前去的江水，心中百感交集，往事一幕幕的在眼前浮現。「久違了！外灘！久違了！黃浦江！沒想到我在離開六十三年之後還能回來！別來無恙？」

1949 江與海的離散

我記得很清楚 1949 年我們離開上海的那天下午。那天天氣燠熱，我們從外灘上了招商局的一個小火輪「元培輪」。黃昏時分輪船啟碇，帶我們離開居住了三年的上海，前往福州，開始了我家在 1949 年「大江大海」的行程。

我們離開上海後，在福州住了將近半年，那時國軍徐蚌會戰失敗，共軍準備南下，局勢日緊，郊外時時傳來演習的炮聲。家裡大人愁眉不展，商議今後去向。對於臺灣，大家一知半解，都覺得前途茫茫。由於

爸爸在對日抗戰期間曾和共軍打過交道，對他們頗為瞭解，知道留下來絕無活路，所以當朋友勸爸爸、媽媽說「去臺灣，人生地不熟，可能會淪落為乞丐。」爸爸、媽媽卻說：「就是全家討飯也要去臺灣」。後來證明這是真知灼見。我家如果選擇留在大陸，那一定逃不過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大躍進、人民公社、上山下鄉、文化大革命等等，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而家破人亡，我們這群孩子也不知會流落何方？

我家踏上離開大陸前往臺灣這艘不沉寶船之旅，正如舊約聖經中諾亞方舟的故事一樣，當神州大地為紅潮所淹沒時，我家蒙神救護，登上臺灣這艘不沉的方舟，才能休養生息不致沒頂，這是何等的恩典？！感謝上帝！哈利路亞！阿們！當然，我們在臺灣也吃了不少苦，受了許多罪，但比起大陸上幾億的人家破人亡好太多了。感謝神！阿們！

父親的光與影

我們家怎麼會搬到上海去呢？這得話說從頭了。長話短說，中日戰爭期間，父親率軍與日軍交戰。由於戰功卓著，曾獲江蘇省

政府先後委任為淮陰、淮安、寶應、高郵、東台等五縣縣長。他的上司，江蘇省主席曾誇讚他「大將楊昉，英勇無敵」。當然他的戰功也都是九死一生的和敵人拚殺而來。抗戰勝利後，論功行賞，他被任命為江蘇省一等縣南通縣縣長。滿懷壯志的父親戮力於縣政建設。卻不料，他的一位直屬上司，欲走私棉紗去上海賺錢，要求父親的守江部隊放行。父親以職責所在，沒有答應。那時正值抗戰勝利不久，國民政府中央高層官員忙著搞「五子登科」，大撈金條。官大一級壓死人，對於下級可以先斬後奏。為了自身安全，父親祇帶了隨從數人，渡江前往鎮江江蘇省政府去申訴。省政府為了保護父親及調查此案，乃將他暫時安置在安全的地方。後來經過詳細調查，父親明顯受到陷害，清白無辜。為了補償，準備把父親另行任命為靠近上海的江蘇省松江縣縣長。可是父親經此打擊，對於國民政府徹底失望，乃決定急流勇退辭官，同時把家搬到上海，並與幾個朋友合夥做生意。在那個時候，父親事業正值巔峯，「辭官」是件嚴重挫折的事，但這件事，後來竟成了挽救我們全家性命的最重要的轉折點，此所以老子說凡事「禍福相倚」。

童年初見滬上

我家在上海住了三年，那是我和上海的初識。上海是一個國際性大都市，號稱十里洋場，是華洋文化交匯的地方。這是我頭一次和西方文明接觸。那時年紀尚小，祇對電車、電影、冰淇淋、籃球比賽以及秋季菊花

展覽等留有印象。我們剛搬到上海時住在一間旅館裡，我們的房間在二樓，從窗口可以看到下面街道上擠滿了嶄新的汽車，有寶藍色的，紅色和深黑色的，都閃閃發亮。那些1940年代的車。以現在的觀點來看是古董老爺車，那時可是剛出廠的新車。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後來我們搬到南市唐家灣住在一個地方叫榮華村，是租的房子，有二層樓。一樓是廚房和客廳，二樓是臥室和洗手間。我那時剛進小學，常常坐在窗前寫功課，一邊望著天際浮雲，幻想著遠方世界的景象。

我們兄弟姊妹上的小學叫唐灣小學。在小學裡大家都說上海話。我們初到上海的時候，那時國內時局尚好，上海社會尚稱穩定。父親和一些朋友合夥開了一家針織廠，製造洋鷹牌毛襪。那時家中收入穩定，父親公餘之暇喜歡帶我去看籃球比賽。參與比賽的如大公隊（代表當時最暢銷報紙「大公報」）或美國海軍隊等實力堅強的球隊，想來必定精彩。祇是我那時太小，看到一半就睡著了。回家的時候，往往夜深，坐在三輪車上酣睡，恍惚中經過法租界，車外風聲呼呼，醒來已在家裏是第二天早上。那時不懂事，跟父親說「別人在家裏睡覺，我們辛辛苦苦的去看了籃球。」父親聽了對著我的童言發笑。我忘不了法租界街旁的法國梧桐樹。他們在風雨中看來是如此浪漫。2013年我去巴黎在街邊也看到法國梧桐樹，這才找到了法蘭西帝國主義殖民標誌的根源。

舊夢如煙

我們有時也去看電影。那年頭戲院很講究，座位都鋪著深紅色的絲絨布。開演之前，觀眾可以租用耳機。有一回，姊姊租了一副，我借來聽聽，裏面是金嗓子周璇唱的流行歌曲，那真是黃鶯出谷，乳燕返巢般的清脆好聽。播放的電影一般是西部片或歌舞片。其中以伊漱蕙蓮絲的游泳影片最受歡迎。西部片都是美國早期移民和紅番交戰的影片，紅番往往是以壞人形象出現。每到情節緊張的時候，觀眾會鼓掌尖叫，希望英雄趕快到場解圍。國產片則以白光主演的「六二六間諜網」中的「假惺惺」傳唱一時。有一些抗戰影片如「一江春水向東流」、「天亮前後」也賺取了許多人的眼淚。電影放映之前或中場休息時，有很多小販在賣牛肉乾、糖果、冰棒和五香蠶豆等零食，是我的最愛，也是我去看電影的主要原因。

那時上海流行舞台劇及紹興戲。紹興戲以「祥林嫂」最當紅，姐姐每天都哼著紹興戲，就像後來臺灣的許多女孩子唱黃梅調似的。舞台劇以共舞台為最出名，上演「蜀山劍俠傳」、「西遊記」、「大明英烈傳」等連本好戲。有時也上演「天河配」等應節戲目。有一回，適逢七夕，共舞台上演「牛郎織女天河配」，舞台上布置成天河，流水淙淙，天河旁佈滿了蓮花，一顆顆蓮子用小電燈泡做成。織女和她的女伴穿着肚兜在出浴，觀眾都站起來看個清楚。這時飾演牛郎的男演員在舞台上出現，偷窺織女出浴。飾演天牛的演員做出很多滑稽動作來引起觀眾

發笑。舞台劇一般以機關佈景取悅觀眾。偶而也有京劇名角如梅蘭芳等四大名旦，來滬演出如「霸王別姬」、「貴妃醉酒」等著名劇目，那就一票難求了。

週末假日，我們常去中山公園或復興公園。中山公園有動物園，較受小朋友歡迎；復興公園則人潮洶湧，坐在那裡是人看人。看夠了之後，就去用餐，上海地區南北館子都有，各省菜餚齊備。無論是吃香喝辣，任君選擇。秋天的時候，爸爸會帶我們去看菊花展覽。各種各樣的菊花，形態高雅，香氣撲鼻，令人流連忘返。我那時是頑童一個，整天跪在地上打玻璃珠，打得褲子膝蓋上破了又補。又喜歡玩一種甩出去會爆炸的小爆竹叫「攢炮」的玩具。有時會和同伴將攢炮整列排在有軌電車的鐵軌上，這樣電車經過時就霹哩啪拉的響個不停，引起電車司機笑罵「小赤佬」。

離滬赴榕

俗話說「好景不常」，到了 1948 年，國民政府內戰失利。局勢開始緊張。到了後來，徐蚌會戰失敗，上海又爆發金融風暴，物價一日數漲，鈔票迅速貶值，市面上買東西常常要提著一口袋鈔票，而祇能買到很少的東西。而且要排隊，有時候一天排不完，得背後用粉筆寫上號碼第二天繼續排隊。我記得剛到上海的時候，使用的貨幣是法幣（註 1）和關金（海關金單位兌換券的簡稱）（註 2），後來法幣和關金貶值，開始用金圓券（註 3）。之後，金圓券又貶值。

驚動了蔣經國去上海「打虎」，逮捕了六十多個屯積居奇的商人，包括滬上名人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這個時候杜月笙出面，薑是老的辣，四兩撥千斤。他要求調查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經營的揚子公司。結果鬧到老蔣總統和夫人出面為孔令侃解圍，使得蔣經國的「打虎行動」無疾而終。因此廣大民眾失去對政府的信賴，從而造成經濟崩潰。面對此種情勢，家裡大人愁眉不展，開始商量今後的去向。最後決定先去福州住一陣子，以觀時局變化而定行止。

福州是個山明水秀的好地方，我們在那兒住了半年。後來，郊外再次響起了炮聲，逼迫得我們祇有遷移到臺灣。我們在福州馬尾上了船。經過一晝夜的航行，第二天清晨，遠遠的在海平面上出現了椰子樹，此時朝日初升，海面上霞光燦爛，海風輕拂宛如天使和聲輕唱，似乎為我們這些有幸逃出大難的幸運者，送上祝福。

移居鯤島

從基隆港登陸之後，我們前往臺北，住進北投附近的旅館。那時臺灣光復不久，受到日本的影響很大，旅館裡到處是塌塌米和紙門，透過窗戶聽到外面踢托踢托的木屐聲，常常會聽到日本話。初抵臺灣時使用「舊臺幣」為貨幣，後來改為「新臺幣」。沿用至今。後來我們坐火車南下，前往嘉義市。到了嘉義市，發現遠不如臺北熱鬧。市中心噴水池邊行人寥落，馬路上走著牛車。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一對年輕情侶，男的戴著

草笠，腳上穿著木屐，嘴裏嚼著檳榔，一邊唱著：「我愛我的妹妹啊……」。那時，我一句臺語也不懂，心裏覺得從繁華的十里洋場上海一下子到嘉義，落差太大，仿佛從繁華的都市來到了鄉村小鎮。

我家初到嘉義時，住在中山堂旁邊的一棟木造的日式房子，房子倒是不小，獨門獨戶，也有前後院。我那時入學「嘉義市林森國民小學」。上了些什麼課都記不得了，祇記得每天下午的「勞動服務」課。大家在南臺灣的烈日下，揮汗除草。有一位本省口音很重的訓導主任，常常在升旗典禮時講話，往往說：「五俗（十）年前……」那時班上本省籍同學，都不會講國語，遇到打架，都向老師告狀一邊指著打架的同學說：「老師，你打你。」或「老師，我打我。」我看著那些同學直搖頭，跟他們說上海的繁華真像是「和夏蟲語冰」，沒人能懂的。

我 2016 年 5 月又回了一次嘉義。我是坐高鐵回去的，平穩迅速。在一個叫太保的地方下車。有人駕車來接我們。進入市區，祇見市面繁榮，交通繁忙。雖然還是比不上上海，但是也相當熱鬧了。當然現在有些本省朋友們國語說得比我標準得多。撫今思昔，令人感嘆世事變化之大。我回嘉義是掃墓去的，父親長眠在嘉義，一晃四十年。想起從前在上海、在嘉義，往事歷歷，令人慨嘆。我家兄弟姐妹們都在嘉義長大，所以都會說閩南語，我本來說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後來學了閩南語，竟把上海話「忘記它啦」

歸途

我在南臺灣的蕉風椰雨中成長。然後離家北上去唸大學。服預備軍官役一年。於1967年2月離開臺灣，到美國留學。來美後上研究所。在唸研究所的時候，常常到圖書館翻閱有關大陸特別是上海的消息。畢業後，先在威斯康辛大學任教一年，後來轉至明尼蘇達州立大學，在那兒待了三年。因為不耐北國苦寒，所以來到南方喬治亞州。先是在亞特蘭大，後來轉至梅崗市，一晃將近三十年過去了。

五年前，有一個機會參加一個旅行團，前往中國大陸。行程包括北京、西安、桂林和上海。當暢遊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時，心中忐忑不安。啊！上海！一別六十三年，別來無恙？我們終於在桂林登機前往上海時，心中充滿了興奮和期待。美麗和上海呀！別來無恙？這麼多年來妳見證了多少的悲歡離合，人世滄桑？

經過了兩個多小時的飛行，當飛機飛臨上海市郊時，天色已經入夜。從機艙窗口俯視上海市郊的公路上往來車輛的燈光，我心中感慨無窮。當年，我們搭乘小火輪「元培

號」離開上海。而今，六十三年後，我們搭乘波音噴射客機返回，離開的路徑和回來的路徑連起來正好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圓圈。這個圓圈穿透了我的一生。物換星移，變化不可謂不大。祇是我的童年和純真呢？我的父母和親人呢？

飛機降落在浦東機場，下了飛機，走進新航廈，祇見設備新穎而現代化，上海總是走在時代的尖端。坐上了遊覽車，導遊叫嚷著說，他已經離開上海十天了，不知家中成了什麼樣子？我聽了沉默半響，終於用不知那兒來的力氣叫著說：「我離開上海六十三年了，不知上海成了什麼樣子？」這下子大家都安靜下來了。坐在我旁邊的一個波蘭女孩難以置信的向我問道「是真的嗎？」我點頭說道：「您知道六十三年有多長嗎？那是一個人從出生到退休的時間，我終於回來了。」我們進了一個五星級的旅館，電梯帶我上了二十二樓，進入房間，透過大落地窗我看到上海市區閃耀的霓虹燈夜景。還有從小在上海就天天看慣了的白雲悠然飄過浦東上空，我躺在床上，喃喃自語：「上海我終於回來了」。

【註釋】

(註1) 法幣：<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t/法定貨幣>

(註2) 關金：海關金單位兌換券，簡稱「關金券」<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t/海關金單位兌換券>

(註3) 金圓券：請參考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t/金圓券>

我的非洲奇遇記

丘引

早年家貧，從小打工資助家庭，沒有機會上正規學校
2003 年移民美國，從高中開始重新接受教育，後就讀中喬治亞州立大學數學系
2022 年畢業於喬治亞州立大學歷史系
2023 年成為喬治亞州立大學老年研究所學生
從二十幾歲開始每年自助旅行外國三個月，圓童年夢想之一
曾擔任女工、報社主筆、專欄作家、及電視台八點檔連續劇編劇
已經出版 24 本書，《後青春：優雅的老》獲得臺灣衛福部 2014 年優良好書獎
目前正著手寫第 25 本書

個人特質：從小什麼都嚇驚

在小學，最期待的事情之一莫過於是每學期一次的遠足。而到了六十幾歲，在研究所當學生，居然還有遠足（field trip），說有多樂就有多樂。愛上西蒙教授上學期教的《社會健康與疾病》（Social Health and Illness），我們在課堂上有很多討論與爭辯，她很擅長帶領學生思辨。上學期的課程牽涉到的是健康與疾病，我們的遠足是去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那是兩個班合併的遠足；另一個課是《研討會》（Seminar），我也修那個課，那是摩根教授的課。因此，義不容辭，我當然要去遠足。這學期我修了西蒙教授的《死亡學》（Death, Dying, and Loss）課，本來以為課堂會是心有戚戚焉，戚戚苦苦戚戚，但相反的是每堂課討論，我們是從上課開懷大笑到下課。可見得西蒙教授的課是如

何叫好又叫座。而這學期的遠足，真是異想天開，居然是亞特蘭大最古老悠久，維多利亞公園式的奧克蘭公墓（Oakland Cemetery）。想不到吧！我們還有導遊呢！照例的，遠足當然得吃飯，我們就在奧克蘭公墓後門的海產餐館用餐，我點的是鱷魚。

我的上海同學也點鱷魚，那是時價。西蒙教授問我，為什麼我會點鱷魚？我說，沒吃過鱷魚，當然要嚐鮮。我說，在我幾十年的自助旅行中，不論我到哪兒，我一定要嘗試沒吃過的東西，我說那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旅行的原因。

西蒙教授是猶太人，她的好奇心極強，隨即問我：「說個旅行故事來給我們聽聽吧！」於是，我說有一年，但因旅行太多了，從二十幾歲我每年固定在不同的國家自助旅行三個月，已經不記得究竟是哪一年了。

我的記憶中是，那一年，我從南非飛到納米比亞。下飛機時，我正想擺脫機上那個南非白人的邀約，說他預約了五星級的飯店，邀我同去。剛好，我碰到一對來接機的臺灣人，他們要接朋友的女兒，一個長髮女郎。但是，整架飛機上他們只看到一個長髮的東方女人，那就是我。所以，他們以為要接的人是我，而剛好那個女孩沒來，因此，我就順道被接去他們家過夜，還吃了一頓美味可口的臺灣菜。

我的納米比亞的旅行從離開這家人開始。我搭了公車到一個偏遠的小鎮，才發現，在納米比亞要靠搭大眾交通自助旅行的困難度太高了。因此，我開始物色租車旅行的同伴。

在一棵樹下，我看見三個年輕人在寫明信片，兩女一男，我就上前打招呼。他們是比利時來的自助旅行背包客，和我一樣。男的在航空公司工作，搭免費飛機。他的女朋友是這對姐妹花的姊姊，是設計師，妹妹是小學老師。他們租了一部小車，他們像是面試我一樣，問我從哪個國家來？我的自助旅行歷史，以及我是否會開車？有沒有帶國際駕照？會不會搭帳篷？交涉能力強不強？面試過關後，我就開始和他們結伴一個月的自助旅行。每個人出 500 南非圓作為公積金。我和那個妹妹共同睡一個帳篷。我們每天採買食物，都是一起吃，一起行動。

納米比亞位於西南非，我的生日就在大西洋畔與海豹共同度過。海豹的聲音像羊咩咩，異味濃。

納米比亞過去是德國的殖民地，首都溫荷克（Windhoek）留下的是德國風味的建築。對我吸引力更強的是當地的原住民。若非與比利時三個夥伴結伴租車，我是無法走到原住民的地區去的。這是在自助旅行時開車的好處。

我們越過納米比亞邊界，馬上進入波札那。我們的目的是穿過波札那，到辛巴威。而這三個國家的邊界，在幾個小時之內就可以跨越過，如果順利的話。

波札那的海關放行了我的比利時夥伴，但我的臺灣護照被攔了下來，說我沒有簽證。這麼多年自助旅行的磨練，我的膽量不小。我是睜眼說瞎話，說我只是借路而已，並沒有要進去波札那旅行，幹嘛需要簽證。波札那的警察面對我這個潑婦，難以招架，不得不找他的老闆出來和我廝殺。我對他的老闆說，過境就像是談一場戀愛，談戀愛不一定要結婚，當然不必辦婚禮。這就是為什麼我不需要簽證，但他得放我過去，因為我只是和他談戀愛。海關老闆看我說的好像也有理，就要我去一旁繳交 50 南非圓，約等於 2.6 美元。

就這樣，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就抵達辛巴威的邊界。但辛巴威的海關狠狠的說（中華民國）臺灣和他們的關係很差。可能是我們以前在聯合國有否決權時，否決過辛巴威。

因此，海關藉此報復我一番。好說歹說，就是不肯讓我進去。我的比利時夥伴們問我要不要爬山偷渡過去，我萬萬不肯。天下那麼多國家可以旅行，我幹嘛非去辛巴威不可！「你們去吧！我自己回去波札那」，我對他們說。

結果他們不肯，說他們不可以拋棄我。我們得同出同進，生死與共。

於是，我們回頭到波札那，這下子戀愛修成正果，與波札那結婚去了。

波札那野生動物國家公園的冒險

我們在波札那的知名丘比國家公園 (The Chobe National Park) 紮營過夜，那是野生動物國家公園。晚上約九點多，一隻大象居然大搖大擺的散步到我們的帳篷來，大家嚇一跳，所有的人都躲到洗手間去。

第二天，我的夥伴們安排我在丘比國家公園狩獵旅行，他們三人則開車進入辛巴威維多利亞看瀑布去。我們沒想到的是，波札那的物價是何等的昂貴。第三天，我們的公積金花光了，他們三人口袋也沒錢，我們就開始想辦法。那個男生修改了繳費日期，等於我們交錢了。第四天，大家傻眼了，怎麼改啊？我自告奮勇的塗改一番，好像考試時寫錯答案必須修改一樣。丘比國家公園是很棒的自然動物公園，我們實在捨不得離去，但第五天時我們想破頭，也擠不出辦法來。

最後，我們使出殺手鐮，明天早上趁工作人員還沒來上班時，我們就起早摸黑偷偷離去。

我們被懲罰得很快。車子剛開出丘比國家公園大門不遠處，天氣仍然暗暗的，負責駕駛的人沒看清非洲的道路是柏油路只鋪開車的地方，換句話說，兩旁是很深的洞穴。我們的車左邊輪胎陷入洞穴了。怎麼辦？

他們是來自於比較文明的國度，看到這種情況就慌得不知所措。而早起的波札那人很多，我就吆喝他們是否可以一起來把車子扛出來？當地人很可愛，想法和我這個不怎麼文明的人物合，十幾個男人啣呵啣呵地喊，在寧靜的波札那可是很壯觀的。車子當然也拉出來了。

比利時人看得啞口無言。我們向波札那人致謝後馬上匆匆離去，好像後有追兵，要追討我們積欠的幾個晚上露營費一樣。

當天我們的目的地是南非約翰尼斯堡。他們三人得去南非才能領到錢。可是，兩地距離是 1,123 公里，等於臺灣的臺北到高雄三趟路。路很遠，時間很少，我們加完油，馬上疾馳而去。但是，兩個波札那的海關早在路邊用雷達攔住了我們，說我們超速了。

我們全都下車了。負責駕駛的比利時男生馬上要掏出駕照，我暗示他別這樣，讓我來交涉看看。

我先對警察致謝，謝謝他們攔下我們，保護了我們的生命安全。緊接著，我說，貴國盛產鑽石，物價昂貴，我們的錢都在貴國花光了。我們沒錢吃早餐，我們得趕路去約翰尼斯堡領錢啊！真是對不起！

兩個警察很識實務，兩手一揮，說 Go！我們千謝萬謝，又如萬馬奔騰開車離去。三個比利時人很好奇，究竟我做了什麼，為什麼警察放我們一馬呢？

意外朋友的款待

我們來到波札那的首都哈伯羅內（Gaborone）時已經晚上八點多了。他們正在傷腦筋，今天怎麼樣趕也趕不到約翰尼斯堡，而我們正飢腸轆轆呢！

「你們介意在公共電話亭的地方停車一下嗎？我打幾個電話看看能不能找到免費吃和住的地方。」他們疑惑的問我，「你有認識的人嗎？」我說沒有。

反正，我翻了黃色電話簿，找到中國駐波札那大使館的電話。我一通電話打過去，接電話的女士聽到我來自臺灣，立刻很友善。「我來這兒旅行，沒錢了，你們的地方可以借我住一個晚上嗎？」她馬上答應。「我還有三個比利時夥伴，也可以一起來過夜嗎？」我問。對方說，「不行。外國人不可以在大使館過夜。」

「那你有臺灣人的電話號碼嗎？我可以聯絡看看！」我誠懇的說。

她給了我一個救命的電話號碼。我打過去，對方可能很久沒有聽到國語了，很開心的說要在十字路口等我們。

我們很快見面了。他帶我們去家裡，安頓我們休息，說要煮晚餐給我們吃。

太能幹的人了，半小時光景，一整桌的菜上桌。三個比利時夥伴張大嘴巴，問我怎麼付錢？我說免費，儘管吃。而那人其實不是臺灣人。他是臺灣人的員工，中國去的。

我們吃完晚餐時，他的老闆從南非回來了，對於這樣的意外訪客，他欣然接受，我們還相談甚歡。

次日，那個人帶我們去見臺灣的農耕隊留下來的移民。我們又受到很熱烈的款待，豐盛的午餐和旅行。畢竟，那時的非洲很少有臺灣人去。我算是奇葩。

總之，後來兩個女生得回到約翰尼斯堡搭飛機回國，而男生因為是免費搭機，得有空位才能搭。因此，他的女朋友就問我，她的男朋友可不可以跟著我借吃借住？

我又帶著他去臺灣人的家借住了。那趟旅行，對於我的三個比利時夥伴是想也不必想的奇遇之旅，對我，何嘗不是呢！要沒有他們，也沒有我發揮的餘地！

西蒙教授聽的好像醉了。我的同學們也是。



哥斯大黎加生態旅遊記

何婉麗

於 Emory University 教授中國宗教與語文課程，直至榮譽退休
傾注 30 年以上的心力，關懷與研究臺灣與歐美環保思潮與實踐

去過哥斯大黎加嗎？去年（2023 年）十一月去哥斯大黎加旅遊，十分鐘情。可能是因為這個國家非常重視生態保育，它本以農立國的國家，現在依賴的主要是生態旅遊產業。對身為生態環保家庭的一員來說，感覺特別新奇有趣。

生態與經濟奇蹟

哥斯大黎加的西班牙語名稱「Costa Rica」意為豐饒海岸。哥斯大黎加北部接壤尼加拉瓜，東南與巴拿馬為鄰，東臨加勒比海。雖然國土面積不大（比臺灣大 1.5 倍，人口是臺灣的 1/4），但這麼小的一個國家在世界市場上卻表現出色，鳳梨外銷量居全球首位、香蕉排名第三，此外，阿拉比卡咖啡豆品質極佳，占國家外銷量的 25%。

哥斯大黎加的森林覆蓋率約為 54%，非常之高，這得益於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環保，停止砍伐樹林，轉而發展觀光業以彌補居民收入。目前，哥斯大黎加仍是中美洲最綠的地區之一，也是少數綠面積不斷擴大的國家。1948 年，哥斯大黎加成為全球首個裁撤軍隊的國家，僅保留警察與自衛隊來維持治安。我們在旅行期間也很少看到警察，唯一看到警察的一次，團員們還急著與他們合照。

目前哥斯大黎加是中美洲地區經濟發展較好且相對安全的國家，擁有較高的生活水準，《富比士》雜誌將其列為 2020 年最適合退休居住的國家之一。因其穩定和安全，哥斯大黎加也被稱為中美洲的「小瑞士」（阿根廷則被稱為南美洲的小瑞士）。

這次旅行有太多美好的記憶，讓我記錄下幾個最難忘的精彩片段吧！

純粹生活的哲學

首先是可愛的當地人。如果跟哥斯大黎加當地人交談時，你會發現他們常使用一個語詞：「Pura Vida！」各種情況下都適用這句話，無論是問候、表達快樂、感謝、歉意，安慰人更是要說。這句話幾乎是哥斯大黎加的代名詞，直譯為「pure life」，很是灑脫。Pura Vida，意思是不過就是人生，何必計較太多？Everything is ok！etc..後來，有不如意的事發生，我也開始常在心裡告訴自己說：Pura Vida！

還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20 多年以前來過哥斯大黎加的團員 Mike 說：教堂非常重要，因為當時都沒有門牌號碼，那郵差怎麼送信呢？原來他們送信是以教堂為中心，所有地址都是以教堂為基準點，定出方位與距離多少里而算出送信地方。後來當地人，也有以大樹、雕像、劇院、博物館、體育場、名人故居等為明顯坐標來描述地址（可參考

<https://read01.com/kGRRKk.html>）。不過聽說現在情況有所改變，但這樣的故事仍然很有趣。

火山與雨林的挑戰

其次是迷人的健行。對喜歡健行的人來說，到此一遊有福了，有各類健行路線可供選擇。哥斯大黎加 Arenal Volcano 阿雷納爾活火山是最活躍的火山。我們去了中部 Arenal 火山叢林。從山下的綠色保護區開始，欣賞稀有動物後，開始往上爬，在 La Fortuna 拉福圖納，可以觀賞到最佳的全景景觀。然後繼續徒步攀登熔岩地，我們在雨中挑戰火山制高點，沿途穿越熱帶雨林。步道狹窄，崎嶇難行，挑戰每個人的體力和耐力，終於成功登頂。我們攀登的火山是 Arenal 的一部分，途中可以看到 1968 年火山噴發的地點，當時火山突然爆發，摧毀了 Tabacón 小鎮，造成 90 人死亡。幸運的是，自 2010 年以來，Arenal 火山一直處於休眠狀態，所以我們還可以在此健行。



圖一：金黃溫泉奇景

金黃色的溫泉岩壁在硫磺的浸染下，散發出獨特的光芒，宛如大地的奇幻畫作，2023 年。

一路上我們看到了許多黑岩石，還可以看到火山湖。下山時，沿途見到多處野溪溫泉，這些溫泉都是由 Arenal Volcano 火山提供熱能。由於火山的影響，這裡到處都是溫泉，一條小河溪水就可以成為泡溫泉的地方。尤其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天然礦物溫泉 Natural mineral hot spring，金黃色的岩壁就是硫磺造成的（圖一）。

除了火山健行（Volcano Hiking），還可以選擇 Motana De Fuego 叢林健行（Jungle Hiking）。在這裡，彷彿走入叢林世界，一路上聽著各樣鳥類不停的叫聲。然而，我更喜歡的是 Arenal 火山山腳下的 El Silenciu 森林公園，進入這片巨大的熱帶闊葉林樹木中，如入原始森林。森林裡除了各種各樣的鳥類，還有猴子、樹獼和長嘴浣熊等珍貴的野生動物。

最難忘的莫過於在 Monteverde cloud forest（雲雨林）的爬山涉水，這裡有八個氣勢滂沱的瀑布，美麗非凡，頗有洗滌塵俗之感。雲雨林中的十座吊橋，設計各具特色，景色宜人。這裡的氣候變化多端，時而雲霧迷漫，時而傾盆大雨，再度考驗大家的體力和耐力。途中不僅要涉水，還要在碎石子路和泥濘路上行走，高高低低的道路，有時還十分陡峭滑溜，不過，即使行路艱難，卻也不改其趣呢！

其實，哥斯大黎加擁有三十八個國家公園及保護區。這些國家公園及保護區占地全國總面積的 13%。它們大多是未經開發的熱帶雨林，不但能保護生態保育和野生動植物，同時提供給遊客觀光。每一座公園幾乎都有上千公頃的面積，廣闊無邊，讓人流連忘返，走也走不完。

珍稀物種的家園

據說在哥斯大黎加生活最棒的三件事就是：看火山、泡溫泉、觀樹獼。樹獼（sloth）是哥斯大黎加國家自然景觀象徵，也是吸引遊客到這個中美洲國家觀光的一大因素（圖二）。但根據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瀕危物種紅色名錄（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兩趾樹獼與三趾樹獼的數量都在下降。所謂



圖二：樹獼之國

樹獼作為國家自然景觀的官方象徵，緩慢而悠然象徵著當地人的 Pura Vida！2023 年。

二趾樹獼與三趾樹獼，即前臂有的有 2 或 3 趾。我們這次有幸看到了這兩種樹獼。聽說來哥斯大黎加旅遊的人，很多都瘋狂地喜歡上樹獼，我也不例外。這可能是因為牠很特別，被認為是世界上行動最緩慢的動物，而且其嘴巴的狀態使牠看起來好像總是在微笑。哥斯大黎加鬱鬱蔥蔥的森林是樹獼的主要棲息地之一。牠們終年棲居高高的 Cecropia 樹上（號角樹，別名蟻棲樹），在樹上久坐不動或極緩移行。樹獼主要以樹葉為食，吃上一點點就需要好幾個小時來消化。吃飽了，就用爪鉤住樹枝，倒掛身軀睡懶覺。一週下來一次大解，耐受饑餓的能力可達一個月。真是太可愛了！我的一位醫生好友讀過關於樹獼的介紹，她補充說：「因為葉子裡有麻醉劑，所以牠們行動緩慢，每次下樹大解都是冒著生命危險（moon apology）。上帝的創造真是太奇妙了，按照進化模式，樹獼是不可能生存的，而樹獼已經有至少三千萬年的歷史了，比人類出現早多了。」世上萬物千奇百怪，神的恩典奇妙無比。這算是我在哥斯大黎加最喜愛的動物了！

哥斯大黎加除了樹獼，還擁有許多珍貴鳥類。這個國家有著驚人的生物多樣性。雖然陸地面積僅占世界的 0.03%，物種卻占了 5%。鳥類一共有 850 種，美國有 1,107 種，不過哥斯大黎加的總面積比美國的西維吉尼亞州稍小（相當於愛爾蘭）。這個國家不愧為野生動物的天堂。

哥斯大黎加的鳥類介紹可參看這個鏈接 <https://www.costaricafocus.com/most-beautiful-birds-of-costa-rica/>。其中，Tucan 巨嘴鳥（或稱大嘴鳥）最引人注目。聽說在春天的時候，連路邊都可以見到。牠是哥斯大黎加的代表鳥類（圖三），色彩鮮豔，雖非國鳥，但牠的圖像隨處可見，可見人們對巨嘴鳥的喜愛了。然而，我印象更深刻的卻是我住的旅館（Putu Leona hotel club）後面那一大片樹林裡，竟然看到了著名且瀕臨滅絕的大猩紅金剛鸚鵡（Lapa Roja）。這些鳥兒有著紅紅長長的尾巴，五六隻一起翱翔時，真是美到令人屏息！我想，牠們的美麗可能不亞於 Monteverde 著名的 Quetzal 五彩鳥（馬雅文化裡的神鳥）！



圖三：熱帶森林的巨嘴鳥

巨嘴鳥是美洲熱帶森林中繽紛的象徵，鮮豔的羽毛與喧鬧的叫聲成為叢林樂章，2023 年。

這兒的生態雨林區公園擁有豐富的植物與動物，我們還去過 Mistico 的 Arenal Hanging Briges Park，那兒有 6 座吊橋公園。這兒屬於熱

帶雨林氣候，植物和山嶺處處鬱鬱蔥蔥。在這熱帶雨林裡，我們看到了一棵巨型 Broccoli tree (圖四)，高大且頂部外形像巨型西蘭花，遠觀其葉子散散點點覆蓋成一大片；乍看之下，這棵樹竟然像極了妹夫于彭所畫的國畫，因此這成為我最喜歡的樹了。除此之外，我們還看到一棵從所未見極其壯觀的五花果大樹，已有 300 年歷史，內部住著蜂窩。

在其他樹上，我們也看到不同種類的猴子，比如 white-faced monkey (白臉卷尾猴/白臉僧帽猴)，spider monkey 黑掌蛛猴 (相當細長的四肢和尾巴宛如蜘蛛)、Howler Monkey 長毛吼猴 (響亮的嚎叫聲，五英里外茂密的熱帶雨林中都能聽到) 等等。導遊還分別指出哪些猴子是只吃葉子的，或只吃果子，或者吃肉的 (蝸牛) 猴子。我覺得白臉帶黑帽的 white-faced monkey 特別可愛。



圖四：Broccoli 樹的英姿

高聳的 Broccoli 樹，猶如綠色的巨人，守護著這片生機盎然的土地，2023 年。



圖五：拯救青蛙的呼聲

哥斯大黎加以「SAVE THE FROGS」的生態旅遊著稱，這些色彩斑斕的青蛙都是這片土地的自然代言人，2023 年。

在樹下，則發現各種色彩斑斕的青蛙 (圖五)，若要細數這些美不勝收的熱帶蛙類，那也可稱哥斯達大加為「蛙的天堂」了。最奇特的要數「陽傘螞蟻」(圖六)，法文名叫 La fourmi parasol，又稱「切葉蟻」。這些列隊而行的大隊螞蟻急速前進著，每隻背上都扛著一片小綠葉子，牠們抬葉片的樣子，還真的很像撐著陽傘的螞蟻。原來這些螞蟻把小葉切碎搬回巢，把葉片嚼碎，混合唾液的葉泥，變成肥料，用來培植一種菇，這些菇才是螞蟻的真正食糧！真是聰明極了！



圖六：陽傘螞蟻的勞動之歌
棕紅色的「陽傘螞蟻」，又稱「切葉蟻」，這些勤奮的小搬運工，詮釋合作與毅力的精神，2023 年。

獨特難忘的體驗

這次旅行還讓我嘗試了兩件一生沒有做過的事。首先是林蔭小徑騎馬，沿途經過一些溪流，既上行也下行。路上近距離看到牛群，樹上還有美麗的大蜥蜴，只希望能永遠記住這些景象。我高高地騎在馬上，緩步而行，悠閒欣賞路邊風光，爽意覺得這是人生「perfect moment」了。我因此也學會了怎麼樣讓馬兒往左、往右、快跑、慢行、停下以及上下坡。而且我的馬兒非常聽話，配合得很好。太喜歡牠了。這次騎馬經驗是我這次旅行中最開心的經驗之一，因為家父以前被稱為「馬上先生」。他總是時常一縱而躍，騎上馬去辦事。今日我終於嚐到馬上滋味了！

其次是最令人難忘的 Zip Lining。就是坐在高空鋼索上滑行，穿過熱帶雨林，你可以想像那有多麼美麗嗎？女兒聽我說想試 zip lining，她告訴我：Zip lining is really fun！這讓我更加躍躍欲試。哥斯大黎加是第一個發明高空滑索運動的國家，所以哥斯大黎加這項活動舉世聞名。很多外國人專程來此體驗。團員 Samantha 說，她遇到三個 70 歲以上的美國人，三次來哥斯大黎加就是為了玩高空滑索。我們一團 12 人，只有 4 個人敢玩。我坐第一條滑索時，雖然害怕，但一剎那間又彷彿幻化為樹獭，在高空與樹梢上滑行，覺得開心；後來的 11 條滑索就沒有那麼害怕了。全程有 12 條高空鋼索，約 2.5 公里。完成以後，很多朋友都不相信我竟然如此勇敢呢！

哥斯大黎加的生態旅遊，從低頭到仰頭都有可觀之處。這兒四季如春，鮮花盛開（在這植物花卉的家鄉裡，多種類又不同色彩的薑花尤為驚艷），美景不斷，有時錯覺恍若置身世外桃源。真是一路美不勝收，令人心生歡喜！這樣充滿種種奇花異草、各樣珍奇動植物以及豐饒的自然環境，您會不會也想一生中去一次哥斯大黎加，來一場生態旅遊呢？



CAPASUS 美國東南區中華學人協會
CHINESE-AMERIC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IN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思源 | 感恩 | 2024-08-15

